

福建师范大学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姓名）潘江滨 学号 2004027 专业 宗教学 所呈交的论文（福州基督教教堂史迹考察与研究）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本人了解福建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的学位论文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学校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潘江滨，指导教师签名 林松水

签名日期 2007.6.7

摘要

教堂作为基督教教会的传教据点和战斗堡垒，他们的创建过程与发展脉络既是一部教会发展史，也是一部文化交流史。本文以福州地区的基督教教堂为主要考察对象，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和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以时间为横轴，地理为纵轴，对榕城基督教各派堂点的创建过程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着重分析了各派堂点的分布态势及其推动因素。同时，以美以美会在闽清的发展为个案，来探讨教会和传教据点向乡村地区扩张和辐射所表现出来的异同性；以福州花巷基督堂为个案，论述新时期下教会及其教堂的新发展，以及传教据点与周边社会的关系。本文写作旨在透过福州教堂分析其背后各种历史因素的作用，并为新时期基督教会及其教堂的建设与管理提供借鉴。

关键词：教堂 福州 分布态势 周边社会

Abstract

Christian churches are churches and fortresses of the missionary positio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ose churches is not only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but also cultural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Focusing on the main Christian churches in Fuzhou City , using history,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method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churches in Rong and analyzes the distribution trend and promoting factors of various fac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thesis takes the exampl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in Minqing to discus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expansion of churches and missionary positionst to the rural areas; the example of Fuzhou Huaxiang Christian church is to present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hurches in a new era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missionary position and surrounding community. In a word, this paper seeks to analyze various historical factors promoting churches in Fuzhou and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Christian churches in a new era.

Key Words: church Fuzhou Distribution trend Surrounding community

中文文摘

首先,就本文题目有两点应予以说明:一,“福州”指现在行政区划上的福州市区,在教会和传教据点如何向下在乡镇地区扩张和辐射上则选择闽清县为个案;二,“基督教”取其广义,包括明天启四年年末(1624年)随艾儒略(Jules Aleni)入榕的天主教以及鸦片战争后传入福州的基督教新教。

本文以福州地区的基督教教堂为主要考察对象,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不仅考察了每个教堂的历史及其现状,而且分析了所有堂点在创建时间和地理位置上的分布态势,同时对教堂如何适应新时代并发挥功效尝试做了探讨。文章的基本构架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首先简要回顾了中国基督教史区域研究学术史,由此引出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上继续开拓区域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次,通过对未来继续进行沿海沿江基督教史区域研究的分析,以及对众学者福州基督教史研究的总结,阐述了本文选题的缘起和意义;最后,简要介绍了本文的材料来源以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概述了福州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基督教在榕传播情况,主要作用是为一篇文章提供一个背景分析。首先,是对福州自然地理的考察及其战略意义的分析。福建的地貌特点是“八山一水一分田”,自古交通不便,闽江水系的地理特征使其成为福建重要的交通运输通道。福州地处闽江出海口,四面环山,闽江贯穿市区,市区内水道密布,闽江对于福州同样是重要的交通通道和商品流通渠道。以基督教教会扩张的眼光来看,福州作为福建省府,东南沿海,有南洋华侨和闽语流行的优势,地处闽江出海口,有交通和商品集散流通的优势。如此,可见福州对于基督教教会扩张的重要战略意义。其次,是天主教和新教传入福州史略。天主教传入福州历史按教会发展特征分期阐述,主要有开教创业时期、兴衰反复交替的发展时期以及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新时期三个阶段。新教则是按各教派分别阐述,主要有以美部会、美以美会、圣公会为主的三大公会和以真耶稣会、基督徒聚会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为主的其它小宗派。

第三章是对福州天主教教堂的史迹考察与研究,是本文的重要章节之一。首先,是对福州天主教教堂的历史考察,主要是对福州市区的天主教教堂做了一个信息统计,并概述了大部分教堂的历史。其次,分析了福州天主教教堂分布态势及其促成

因素。在时间轴上的分布态势方面，福州天主教教堂的创建呈现了集中于某一时间段的特征，并且在整个时间轴上有一个明显的起落。笔者认为，推动这种发展态势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天主教在华传教方针、策略的变化，以及中国官方对天主教态度及其政策的变化。在地理分布发展态势上，福州天主教教堂主要呈现了沿江分布发展的特征。笔者认为，推动其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天主教和福州船民的历史联系。

第四章是对福州新教教堂的史迹考察与研究，是上一章的延续。首先是对福州新教教堂的历史考察，对福州新教所有教堂做了信息统计，并分教派对各教派的堂点进行统计分析，概述了各教派主要堂点的历史。其次，分析了福州新教教堂分布态势及其促成因素。在时间轴上的分布态势方面，福州新教教堂的创建呈现了从上升到顶点再大幅度回落的曲线特征，笔者认为，这主要还是官方对基督教态度及其政策之变化的作用；在地理分布发展态势上，福州新教（主要是美部会、美以美会和圣公会这三大公会）教堂呈现了从城外到城内再到郊区，以及各教派划分传教范围各自发展的特征，笔者认为，起作用的因素主要有福州官绅、乡民的抵制，官方对教会添置房地产的政策规定及其变化，以及不同差会间发展策略的差异等等。

第五章以美以美会在闽清的发展为个案，分析教会和传教据点向下扩张和辐射所表现出来的异同点。首先，概述了闽清的自然地理特征及美以美会在闽清的发展情况，认为教会在闽清的发展同样受到了地理交通状况以及官方态度、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其次，是闽清教堂史略，对闽清美以美会堂点信息做了统计，并介绍了一些主要教堂的历史。笔者认为，在基督教堂点的建设上，闽清教徒所贡献的力量和起的作用相对比较明显。最后，分析了闽清教堂分布态势及其促成因素。在时间轴上的分布态势方面，闽清教堂的创建同样有一个阶段性的起落特征；而在地理分布发展态势上，呈现了教堂以六都和城关为基点辐射扩散，大多倚河流而建，以及在各教堂点与点之间不成文地划分范围各自发展、组织教徒的局面。

第六章以福州花巷基督堂为个案研究，分析新时期下福州基督教教会及其教堂的新发展，以及做作为教会传教据点的教堂与当代周边社会的关系。首先阐述了福州花巷基督堂今时概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教牧人员和事工部门；第二，日常活动安排；第三，教堂的舌喉——教会刊物和教堂网络论坛。从中得出，花巷基督堂会在新时期下能够与时俱进，改进自身组织结构，并扩展了新的宣道传教平台。其次，以花巷堂为个案分析今时基督教教堂与周边社会的关系。笔者认为，一方面，新时期下的教堂及其堂会根据周边环境和时代背景的变化而进行了一定的调

适；另一方面，保持一定程度与时俱进的教堂及其堂会也对其周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结论部分：首先，在正文的基础上对本文写作做了简要总结；其次，对由本文写作而引发的一些新思考做了讨论；最后，对未来教堂及其堂会的发展与功用做了展望。

第1章 绪论

1.1 中国基督教史区域研究概述

基督教亦称为基督宗教,主要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1]对于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在中国学者进行的基督教研究中所占比重较大,亦是其较为关心的研究主题和焦点。由于中国基督教历史所涵盖的时空范围太大,牵涉的社会内容很深,又包含着各类的学科知识,加上资料挖掘上的困难和各种复杂的社会原因,中国基督教历史的梳理、论述难度颇大,想把中国基督教史作为学术考察的整体对象是很难的。迄今为止,特别详尽、全面的通史类研究著作仅有少量问世。^[2]战后,西方学者的中国区域史研究异军突起,而中国学者也开始注意到这种研究方法上的转变,并且在90年代中后期以后形成区域史研究的火热。

区域史研究要从法国的“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谈起,年鉴学派主张“重点放在一定时空点上的特定社会,探讨该社会之所以和它的近邻有别的思想样式”,所以“自然地强调区域性而非全国性的研究分析”。^[3]也就是说,它肯定国家历史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强调区域性而非全国性的研究分析,以检验某一特定区域的全部历史,由此避免将某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套用到另一历史过程中,触犯以偏概全的毛病。在西方的区域研究中,施坚雅曾以河流流域及盆地,划分中国的“自然大地理”,并以区域概念解释中国历史,认为中国历史的结构是由九大区域组

^[1] 新教在中国习称为“基督教”或“耶稣教”、“更正教”。本文所谓之“基督教”乃取其广义,包括明天启四年年末(1624年)随艾儒略入榕的天主教以及鸦片战争后传入福州的新教。

^[2] 20世纪以来在中国出版的有关中国基督教史论性著作主要有樊国梁《燕京开教略》(教世堂,1905)、杨程《中国的基督教》(《文社月刊》1-7,1926)、圣教杂志社编《天主教传入中国概况》(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8)、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河北献县天主堂,1931)、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贾立信、冯雪冰《基督教史纲》(第四卷——基督教在中华的历史)(上海,广学会,1935)、姚宝猷《基督教在华传教之功罪》(《现代史学》,1935)、徐宗泽编《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圣教杂志社,1938)、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0)和《中华基督教史课本》(上海,广学会,1940)、恭思道《基督教在中国之概论》(上海,中华圣公会,1941)、方豪《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牛若望《天主教在中国》(香港,真理学会,1948)周忆孚《基督教与中国》(香港,辅侨出版社,1965)、候天民《基督教在中国的成长》(台湾正中书局,1966)、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张孝箴《福音流传中国史略》(二卷,台湾辅仁大学,1970-1971)、陈健夫《基督教在华早期传播史》(浸信会出版部,1972)、郝镇华译穆尔《一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周燮藩《中国的基督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等等。此外未在中国出版的有如K.C.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New York, 1932等,上述论著都具有通史研究的性质,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尚未有一部著作可以视为颇为完备的中国基督教通史著作。

^[3] 艾恺(Guy Alitto):《论目前在西方的中国地方研究的趋向》,载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3.第12期:第440页。

织而成的，各区域不断互动发展，^[1]其模式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一门影响甚大，中国历史的区域研究亦跟随兴起。最早将区域研究方法应用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Th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re at Harvard University）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费正清的理论模式强调“西方中心”观点，注重来华传教士的贡献，其主编的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及其推出的 *Ellsworth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Cambridge: East Asian Reach Centre,1974),都以传教士为中心的研究方式，探讨了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及其影响，代表了这种研究模式的特点。之后，西方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模式又有新的转变，主要表现为柯保安（Paul Cohen）提出的“中国中心论”（China Centered Approach），此观点认为学者必须以中国的处境来研究中国近代史问题，^[2]也就是说，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应从中国历史角度来观察中国基督教的发展。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学者在吸收这些中国历史区域研究理论与构架后，也意识到区域研究和个案研究的重要性。在八、九十年代后的一些相关论著上，^[3]中国学者开始注意把教会发展与它所传播的区域社会背景紧密联系起来，结合该传教区的自然环境、人文地理、社会习俗、原有思想文化发展、宗族结构、政治、经济、交通乃至社会心理等多个因素加以细致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比较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并且，在研究区域方面，国内一些学者主张拓展“宏观研究”，探讨以往较少提及的地区，如西南、西北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教会研究，^[4]教会史区域研究呈现从沿海沿江省份向内陆地区转移的特点。

综合而言，在中国基督教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的研究上，无论在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区域研究方法和理论构架都已经成为主流。并且，在研究的区域上，有一个从沿海沿江省份地区向内陆地区特别是西南、西北及少数民族地区转移的特点。可以预见，这种区域研究方法仍然是将来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一个主流方

^[1] William Skinner. "Christianity in China: One Scholar's Perspective of the State of the Research in China Mission and China Christian History,1964-1986"载于《中国近代史研究通讯》，第四期，1987年：第114页。

^[2] 柯保安：《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1—176页。

^[3] 相关著作主要有：陈支平、李少明《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阮仁洋、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钱宁主编《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林金水主编《台湾基督教史》（九州出版社，2003）等等，另有其它相关论文著述此不一一赘述。

^[4] 如前注提及之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钱宁主编《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等等。

向。了解这一研究的学术史概况对于涉足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研究的人，在如何选定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上将大有帮助。本文下面将在了解这一研究概况的基础上，对选定题目的缘起和意义做一说明。

1.2 选题说明

如前文所述，中国基督教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基督教史在研究区域上呈现一种从沿海沿江省份地区向内陆地区特别是西南、西北及少数民族地区转移的趋向。但是，这并非说明对于沿海沿江地区的基督教史研究已经完备了。相反，沿海沿江地区的基督教史研究仍将是未来的主流，只是这种研究将得更加深入和多样化。

首先，从所知的学术著述可以看出，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主要有教案之研究、反教与护教之研究、基督教本色化与“三自”爱国运动之研究、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及教会教育研究、传教士之研究等几块，^[1]虽然研究成果辈出，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其中之不足。比如，对教案历史事件的研究多但对教案相关的法律问题以及教会经济问题研究少，对教会教育的研究多但对教会其它事业研究少，对外国传教士的研究多但对本土教徒的研究少等等。其中，涉及本文命题的教堂史迹的研究更是凤毛麟爪。

其次，由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拓展模式的关系，沿海沿江地区的基督教史研究相比内陆地区特别是西北、西南及少数民族地区的，仍是比较重要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上。众所周知，清季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会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宣教特权，陆续进入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建立传教据点，此外方根据方言和交通路线等考虑，逐步向内地发展，开发支点，并籍以形成教区。由此可见，沿海省份中的福建，特别是临海靠江的福州，五口通商首批开放港口的福州，差会教派云集的福州，在研究上仍然有着巨大的挖掘潜力。

明天启四年年末（1624年），艾儒略做为“开教福建之第一人”开始了天主教在福州传播的历史；^[2]清道光二十六年（1847年1月2日），美部会传教士杨顺

^[1] 参见任继愈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宗教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第270—310页。

^[2] 费赖之认为艾儒略入闽时间是明天启五年（1625年）（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第134页。）而据叶向高：《蓬编》（卷十七，第12页下）记载，叶向高天启四年七月十八日（1624年8月31日）离开京城，九月初旬过淮安，十一月二十日（1624年12月29日）抵三山，十二月初十日（1625年1月18日）抵舍。艾随叶抵榕，故应是同一时间。（林金水《艾儒略与明末福州社会》，《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二期。）此外，费赖之称艾儒略为“开教福建之第一人”，有点要解释的是，据一些学者考古发现，泉州在南宋末年就有基督教活动。（吴幼雄《泉州宗教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p78）

(Stephen Johnson) 授命到来, 亦揭开了新教在福州的传播史。^[1] 独特的地理位置, 丰富的社会文化, 悠久的开教历史, 复杂的教派活动, 使得福州在近四百年来都成为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一个焦点, 同时也使得福州的基督教史研究颇受学者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学者关注的问题多在于基督教入华史、教会教育、教会人物史等方面, 对建筑鲜有涉及。

西方学者对于福州基督教史研究的主要著述如下: 首先当然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所推出的 Ellsworth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Cambridge: East Asian Reach Centre, 1974), 该著作探讨了西方传教士努力拓展闽东教会事业的经过, 充分表现了以传教士为中心的研究模式, 并且在“撞击——回应”思想的指导下, 对 1847—1880 年新教传入福州地区引起的反应进行深入探索, 亦算是开了哈佛学派之风气。而在 1986 年 12 月召开的一次 17—18 世纪福建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两篇论文《明末福建耶稣会: 不同层次的反应》、《有关福建耶稣会士活动的历史资料》, 亦是围绕着艾儒略等传教士在福建活动而撰写的。在教会教育方面则要提到美国学者华惠德 (L. Wallace) 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该书是作者根据本人在华南女子学院任教的亲身经历而撰写的校史。在研究方向上比较有突破性的则是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唐日安的博士学位论文《虔诚、爱国、进步: 1857—1927 年中国新教徒在福州社会及建设现代中国中的角色》, 该文突破了以往学者注重外国传教士的活动的局限, 转而关注到中国教徒群体的研究。这种研究对象上的突破是值得鼓励的。^[2]

相比之下, 国内学者主要是福建学者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明清福建天主教史, 有林金水教授的《艾儒略与明末福州社会》等文章, 该方面著述主要以传教士为中心进行研究; 再一是近代基督教教会教育, 由于近代福州教会学校众多, 该方面文章也最兴盛, 有谢必震教授的《两所福建教会大学历史文献资料述略》、黄新宪教授的《从华南女子大学到女子文理学院——对旧中国一所著名教会女子大学的考察》、朱锋的《王世静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等等; 另一是福建教案, 在这方面陈增辉教授、徐恭生教授以及谢必震教授都有所建树。此外, 比较新颖的有关于基督教与福建民俗、乡族势力的冲突方面的著述, 如陈支平教授、李少明先

^[1] 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Cambridge, Mass. 1974: P5

^[2] 分别是 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Cambridge, Mass. 1974; E. Zurecher, *The Jesuit Mission in Fujian in Late Ming: Levels of Response*; A. Dudink, *The Historical Sources of the 17th Century China Mission, in Particular Fujian*; L. E.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New York, 1956*; 唐日安博士论文尚未刊载。

生的《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以及范正义的《基督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以福建为研究中心》。^[1]

综上所述,福州做为一个在基督教史研究上有吸引力也有潜力的地区,其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却也不可谓之详尽。教堂,教会的传教据点,传教力量的辐射中心。从1625年,从1947年,多少的基督教教堂史迹,多大的传教据点对周边本地社会的影响。而我们可以看到的相关研究却几乎是一片空白。在能找到的有某些相关联系的著述,首先要提到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张金红的硕士毕业论文《福州地区基督教建筑研究》,该文立意新颖,从历史学和建筑学方面对福州地区的基督教建筑进行归类分析,并由此讨论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不过该文侧重于建筑风格的分析,且研究对象有大部锁在教会大学建筑上面,并没有从历史地理角度来分析各传教堂点的分布。而董黎所作《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以及 Jeffrey W.Cody 的论著: *Building in China: Henry.K.Murphy's "Adaptive Architecture,1914—1935"*,(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1); *Striking a harmonious chord: foreign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style buildings,1911—1949*.都仅限于对教会大学建筑的研究。再有扯上福州地区教堂的,无非是《福州古厝》、《福州老照片》、《福州旧影》以及如《福建宗教》之类杂志上的图片配文的说明介绍。^[2]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笔者选取了福州基督教教堂史迹做为主要的考察对象,通过对福州教堂的历史和地理位置考察、传教据点区域分布情况及其辐射发展的历史研究,目的在于勾勒出基督教在福州的发展历程,并更深一步挖掘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基督教的传教策略及其变化、中方政府的政策及其变化等等影响基督教传教史的因素。并且,通过个案的研究,阐述传教据点与当地社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互相影响的一个互动关系。

1.3 材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有关基督教教堂史迹的研究极少,这大概是因为与该课题相关的文字资料少且

^[1] 林金水.《艾儒略与明末福建社会》.《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2期;谢必震.《两所福建教会大学历史文献资料述略》.吴梓明主编《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黄新宪.《从华南女子大学到女子文理学院——对旧中国一所著名教会女子大学的考察》.《教育科学》.1990年第3期;陈文平、李少明.《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范正义.《基督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以福建为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未刊载硕士论文。

^[2] 张金红.《福州地区基督教建筑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未刊载硕士论文;董黎.《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

Jeffrey W.Cody: *Building in China: Henry.K.Murphy's "Adaptive Architecture,1914—1935"*,(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1); *Striking a harmonious chord: foreign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style buildings,1911—1949*.

散,不易收集,很多材料的收集需要田野调查来完成。现将本文资料来源大概说明如下:

1.3.1 中文资料方面

第一类是地方志和地方文史资料,如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福州市志》、《福州市地名志》、《鼓楼区志》、《台江区志》、《仓山区志》、《闽清县志》、《福州市宗教志》等,另有旧志如《闽都记》、《福州府志(清·乾隆)》等。这些地方志主要提供了福州自然地理情况、社会习俗、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一些信息。文史资料方面主要有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编的《福州基督教文史资料选辑》和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文史资料选编——基督教天主教编》,里面提供了一些堂所的创建和历史变迁的信息。^[1]

第二类是教会方面的一些中文记录和中文报刊杂志。主要有差会年议会记录,如《福州美以美会第四十三次年议会记录(下编)》、《福州美以美会第四十四次年议会记录》、《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五次总议会议录》、《闽中协会二十五年度年会记录》等;年鉴,如《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中华基督教会闽中协会年鉴》等;教会月刊,如《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月刊》、《福声》等;教会历史编纂,如《中华基督教历史》、《闽清县基督教志》等。^[2]

第三类是国内学者的一些专著和学术论文。主要有:(一)关于学术史回顾的著述,如任继愈主编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宗教学)》、林金水、张先清的《福建基督教史的研究回顾与展望》等等;(二)对于史料的汇编,如田涛主编的《清朝条约全集(影印本)》、王铁崖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等等;(三)史学著述,如林文慧所撰《清季福建教案之研究》、陈支平主编的《福建宗教史》等等。^[3]

1.3.2 西文资料方面

第一类为教会报刊和年议会记录,如《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中国

^[1]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所编《福州市志》、《福州市地名志》、《鼓楼区志》、《台江区志》、《仓山区志》、《闽清县志》以及旧志如《闽都记》、《福州府志(清·乾隆)》等,本人查阅的均为在线版,地址 <http://www.fzdgw.com/>;福州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福州基督教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7年3月;福州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福州基督教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1987年8月;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基督教天主教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2] 此类资料主要见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各类差会年议会记录、教会报刊杂志都有不同程度的缺失;《闽清县基督教志》由闽清县基督教两会编撰,2000年11月内部刊行,笔者得书于田野调查中。

^[3] 任继愈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宗教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9;林金水、张先清:《福建基督教史的研究回顾与展望》,载于《基督教宗教研究》(第二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田涛主编《清朝条约全集》(影印本),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6;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上海,三联书店,1957.9;林文慧:《清季福建教案之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陈支平主编《福建宗教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11。

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等;第二类是一些传教士的回忆录和著作,如麦利和的《生活在中国人中间》(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ses:with Characteristic Sketches and Incidents of Missionary Operations and Prospects in China, 1861);第三类是西方学者的一些论著,如卡尔逊的《福州教会》(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等。¹¹

除了上述的中西文文字材料外,笔者还通过田野调查获得了一些素材,如教会人士访谈记录、教堂照片、教会活动记载等,笔者将运用历史学、人类学以及文化传播学等方法对这些材料进行综合运用,希望能够为本文的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当然,一些资料的缺失或者不足也是笔者所遗憾的,如传教士绘制的一些教堂简历地图以及各堂所各自保存的一些教堂历史记载,这些方面笔者将通过自己绘制地图和田野调查来弥补。在收集材料、田野调查和写作的过程中,多蒙师友照顾,但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遗憾甚多,错漏不实之处亦在所难免,尚祈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¹¹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869-1941; Chinese Repository, 1832-1851;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with Characteristic Sketches and Incidents of Missionary Operations and Prospects in China. New York, 1861; 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4.

第2章 福州自然地理环境与基督教的传播

福建位处东南一隅，背山靠海，境内多山而有闽江等水系贯穿其中。福州是闽省首府，位处闽江下游，建设在闽江出海处的平原上，城区水道纵横连贯并与出海港口相通。自有传教士入华传教，福州与闽省便在其传教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2.1 福州自然地理考察及其战略意义

2.1.1 自然地理考察

福州，地处福建省东部的闽江口地区，闽江下游，东临台湾海峡，南部与莆田市，西部与三明市，北部与宁德市分别接壤。其位置在北纬 $25^{\circ} 15' \sim 26^{\circ} 39'$ ，东经 $118^{\circ} 08' \sim 120^{\circ} 31'$ 之间。清乾隆《福州府志》称福州，“西阻重山，东带沧溟，南望交广，北睨淮、浙，亦东南一都会也。”^[1]从地形上来看，福州四面环山，地貌属于典型的河口盆地，城区所在地位于盆地的中央。盆地四周被群山峻岭所环抱，其海拔多在 600—1000 米之间，东有鼓山，西有旗山，南有五虎山，北有莲花峰。不仅是福州，整个福建，山多，少高，山险，深谷，水急，自古便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形容“闽地负山滨海，平衍膏腴之壤甚少，而崎岖硗确之地多。”^[2]这种地理状况使得福建的交通自古便是一个大问题，古人甚至感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闽道更难于蜀道”。同时，福建境内河流水系发达，水运河运成了比陆运更为便捷可行的途径。

闽江是福建最大的内河，在福建众多内河水系中最富有代表性。它发源于闽赣、闽浙边界的武夷山、仙霞岭等山脉，全长 577 公里，^[3]干支流流经 32 个县市。其流域在南平以上有建溪、富屯溪和沙溪三大支流，流域面积 42 322 平方公里，河长 333 公里；在南平以下再纳尤溪、古田溪、梅溪、大樟溪等支流，最后流经福州、长乐出海。（见图 2-1 闽江流域主要水系图）其总流域面积达 60 992 平方公里，约占福建省面积的一半，被福建人民称为“母亲河”。闽江流域的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呈阶梯状降低，河流流经地区由于构造和岩性的不同，以及外力作用的差异，河网呈格子

^[1] 乾隆《福州府志》，福州：海风出版社，1988 年。

^[2]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一，福建一，广雅书局光绪二十六年刊本：第十三册。

^[3] 《福建省志·交通志》（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方志出版社，1998 年）中记载的是闽江主流全长 559 公里。

状，河谷盆地似串珠状，形成内陆地区的河谷盆地既与峡谷相间排列，又与山地丘陵相交错。而沿海地区则是低山、丘陵、平原，福州平原面积达 489 平方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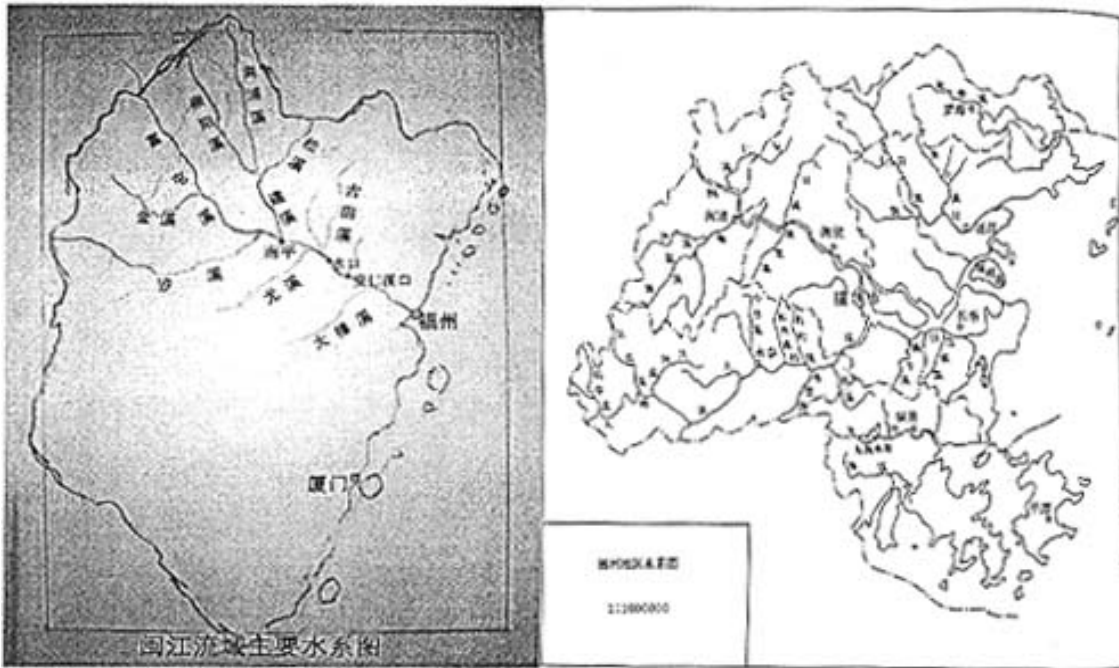


图 2-1 闽江流域主要水系图

图 2-2 福州地区水系图

由于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形特点，闽江就成为十分重要的交通运输通道。早在先秦时代闽江就有水上航运活动，时中原移民南下福建，就多取水路沿江而下，自北向南开发了福建。北方移民所迁行的路线，多自江西、浙江西部入闽，然后经闽江流域向东，向南北两侧扩散，顺闽江河谷分布。同时，闽江做为福建内河航运要道，还是沟通福建内陆各地与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往来的最主要的交通运输线之一，其流域成为内陆商品的流通集散地。就福州而言，福州四面环山，闽江贯穿市区，自水口镇流入福州境内，自西向东流经闽清、闽侯、市区、长乐，分别从长门水道和梅花水道注入东海。闽江流经福州境内长达 150 公里，流域达 6.09 万平方公里。其余支流有大目溪、梅溪、新店溪、营前溪等。（见图 2-2 福州地区水系图）在福州市区内，水道密布，有晋安河、白马河、光明港、安泰河等 30 多条，市区内的港汊都与闽江沟通。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福州的交通状况，同时也是福州交通的主要通径之一。

2.1.2 战略意义分析

十六世纪新航路开辟后，传教士来华大多通过海路而来，福建地处东南沿海，

是传教士由南向北进入中国活动的一个主要区域。时闽商纵横于海上，多在南洋发展，闽语在南洋流行，许多传教士未入中国之前，便先在南洋岛屿接触了华人，有了华人教徒，并学习了闽语，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福建相比其它一些省份有传教的优势。福州作为福建之省府，傍江靠海，当是重中之重。特别是在传教对象上依照“从上到下”的耶稣会士，在制定福建传教发展策略时，必是要把福州放在首位。天启四年（1624年）艾儒略随大学士叶向高入闽，便是先到了福州。^[1]而早在艾儒略之前，1577年，西班牙传教士拉达和马林，从菲律宾群岛来到中国，他们先抵达泉州，后至福州拜见了当时的福建总督，并请求能够留下来居住传教，最后失望离去，这也说明了福州在梯航东来的传教士心中的地位。^[2]

再从之前的自然地理考察来看的话，闽省交通困难，闽江水系是福建十分重要的交通运输通道，福州位处闽江下游，地处闽江入海口位置，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从商业角度考虑的话，无论是茶叶等其它原材料商品的输出，或者是布匹等其它加工商品的输入，福州都是最重要的一站。以茶叶的输出为例，西方各国进口的中国红茶主要产自福建崇安县的武夷山，在福州口岸未开以及闽江水系探险未明之前，从这里开发出去的两条商路，一条由崇安的星村到广州，全程 2885 里，需时 50—60 天；一条从崇安到上海新茶路，全程 1860 里，也是需要 24 天的路程。这对茶叶出口贸易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不能适应世界茶叶市场急剧增长的需要。十九世纪，英商船陆续潜入福州，开始寻求新的茶叶贸易港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福州成为《南京条约》中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9 世纪 30 年代，传教士们就参与了 3 次对福州及闽江流域的探险活动，当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乘载“阿美士德”号看到福州陆地时，他忍不住感叹“现在我们已可到达那个供给欧洲人消费最大宗的茶叶出产地了”。^[3]

从在福建传教路线及其策略的制定来考虑的话，以福州为根基，以闽江为主干动脉，向闽江中上游周边地区渗透和发展，是基于自然地理现状的一个必然选择。首先，当时传教士来福州有三种基本路线，一陆路，二是海路，还有一种就是从内陆水路。来榕的伦敦会士 Edwin Joshua Dukes 在他的著作《Everyday Life in China; or,

^[1] 据叶向高：《蓬编》（卷十七，第 12 页下）记载，叶向高天启四年七月十八日（1624 年 8 月 31 日）离开京城，九月初旬过淮安，十一月二十日（1624 年 12 月 29 日）抵三山。十二月初十日（1625 年 1 月 18 日）抵舍。艾儒略随叶抵榕，故应是同一时间。转引自林金水：《艾儒略与明末福州社会》，刊于《海交史研究》，1992 年第二期。

^[2] （西班牙）门多萨撰，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 7 月版：第 156—232 页。

^[3] G.J.Gordon: “Memorandum of an excursion to the tea hills”, Chinese Repository, Vol.4, No2, (1835), p.72—82.
Edwin Stevens: “Expedition to the Bohea (Wooc) hills”, Chinese Repository, Vol.4, No2, (1835), p.93. 此三次探险活动目的主要是为搜集茶叶的情报，时间分别是 1832 年、1834 年 11 月以及 1835 年 5 月。

Scenes Along River And Road in FUH-KIEN》记载了从厦门到福州的陆路以及内陆水路两种路线，从福建的自然地理状况以及当时的交通来看，在这两种路线的比较中，无疑是走水路是占了上风的。^[1]其次，从来福州传教的各教派的发展史实来看，以福州为根基，以闽江为动脉向闽江中上游周边地区渗透发展的策略也得到了历史的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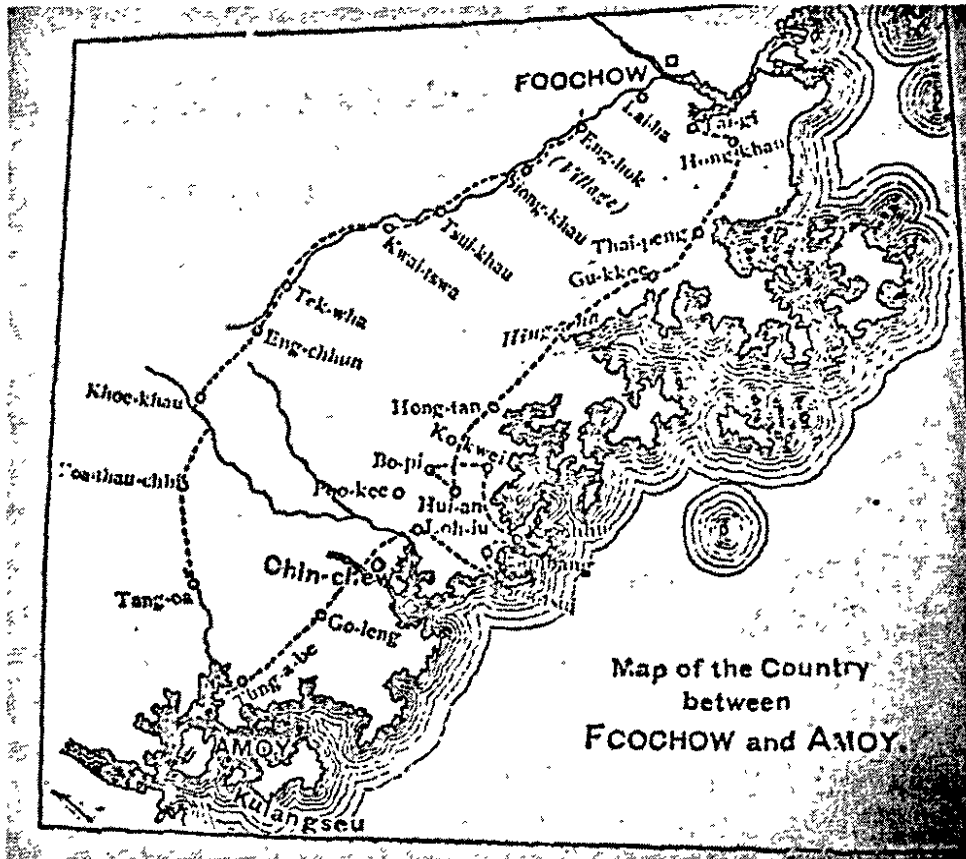


图 2-3 从厦门到福州的行走路线图^[2]

在鸦片战争响起之后，中国战败，被迫与侵略者签订不平等条约。1842年的《南京条约》规定福州做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对外开放，1844年8月的《望厦条约》使外国人拥有了在五个通商口岸自行建造教堂、医院的特权，而之后的《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也给予了基督教传教事业各种庇护规定。传教士们欢呼“一个崭新的时代现在已经来临”，^[3]宣布要“为对华战争的结束，为

^[1] Edwin Joshua Dukes: *Everyday Life in China; or, Scenes Along River And Road in FUH-KIEN*.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Edition: pp38-62. 另参见图 2-3 澳门到福州行走路线图。

^[2] Edwin Joshua Dukes: *Everyday Life in China; or, Scenes Along River And Road in FUH-KIEN*.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Edition: pp124.

^[3] 拉图莱特《中美关系史》(Latourette: *The Histor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第 120 页，转引自陈支平、林国平等主编《福建宗教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第 403 页。

和约所获致的传教的方便,为中国皈依基督的光明前景而同心感恩称颂上帝。”^[1]在这些条约下,福州这块有着悠久天主教活动历史的城市,一扇掩着的门,终于被打开了。

2.2 天主教传入福州史略

按照时空的变迁,天主教在福州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开创时期,以艾儒略入闽开教为主线,讲述福州天主教随艾儒略入闽发芽开花的历史;第二个阶段是兴衰反复交替的发展时期,以几个转折点为分水岭,讲述福州天主教在清朝、民国时期的反复沉浮;第三个阶段是在改革与探索中曲折前进的时期,以文革浩劫为分水岭,讲述福州天主教如何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旧貌换新颜。

2.2.1 艾儒略开教时期: 1624—1644 年

明天启四年十一月二十日(1624年12月29日),意大利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偕同告老还乡的相国叶向高(福建福清人)由杭州乘船,顺闽江南下到达福州,揭开了福州天主教发展的序幕。这个时期又以1937年的“福建教案”^[2]为分水岭,分为上下两个阶段。

“福建教案”前的1625年到1637年,可以视为艾儒略入闽传教的黄金阶段。福州是福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八闽人才荟萃,时儒风盛行。艾儒略奉行利玛窦(Mathew Ricci)制定的“适应”策略的路线,翼借用中国儒家思想和传统思想,力求使基督教信仰与之相适应,并在传教过程中注重发挥中国教徒和士大夫的作用。艾氏抵榕之次年春天,便在福州书院以“天命之谓性”为题,^[3]提出天主教的观念,与众多福建士人讨论天学,一鸣惊人,被誉为“西来孔子”。^[4]其“教理皆优,加之阁老叶向高为之吹拂,儒略不久遂传教城中,第一次与士大夫辩论后,受洗者25人,中有秀才数人。”^[5]而据《口铎日抄》记载,第一个受洗入教的是林一雋。^[6]之后,“儒略见城中官吏优遇,乃留居福州四月,游行外府八月。如是者数年,成绩甚佳。”^[7]到明崇祯八年(1635年),福州城内教徒已达数百人,传教范围扩展到福州府属各

^[1] 洛维特《伦敦布道会的历史》(Loret: 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第二卷,第447—448页,转引自陈支平、林国平等主编《福建宗教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第403页。

^[2] 崇祯十年(1637年),荷兰殖民者侵占澎湖,激起福建士民对外来势力的强烈不满,终于爆发从宁德缉拿通夷犯开始,翌年波及八闽的针对天主教的“反邪教”浪潮。

^[3] E. Zorcher: The Jesuit Mission in Fujian in late Ming Times: levels of Response: P12-13.

^[4] 《圣教信证》,《艾儒略传》。

^[5]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第134—135页。

^[6] 李九标:《口铎日抄》,卷一:第11页。

^[7]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第135页。

县。

崇祯十年(1637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起发生在福宁州(宁德)的逮捕夷人事件^[11]成了“福建教案”的导火线。被捕的三名“通外”夷人在告示中被怀疑是耶稣会士,虽然宁德并非艾儒略的工作范围,但福州府仍然张布“示禁传教”通告,“示仰地方军民人等知悉:凡有天主教夷人在于地方倡教煽惑者,即速举首驱逐出境,不许潜留,如保内有士民私习其教者,令其悔改自新;如再不悛,定处左道惑众之律,十家连坐并究,决不轻贷。”^[12]并且点名驱逐艾儒略,“如近日杨玛诺、艾儒略辈,以天主教首,簧鼓人心。非觉发之早,驱逐之速,渐不可知矣。虽已押出境,仍恐邪党来消,去向复人,更为厉阶。尔家甲人等,以后严加防察,如有天主教艾儒略,杨玛诺等并无为教首来省城者,许即禀官严拿究治。如容隐不举,事发一体连坐。”^[13]在官府告示之后,福州一些士人掀起了一股“破邪教”浪潮。而艾儒略并没有因此离开福建,而是暂时躲匿在乡下,依靠当年传教中结交的士人何乔远、苏茂相、黄鸣乔、林欲楫、曾樱、蒋德璟^[14]等人的帮助,传教工作终能继续维持。

2.2.2 兴衰反复交替的发展时期: 1644—1949年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兵入关,明亡。清顺治六年(1649年)清兵入闽,福州被收,艾儒略卒于闽北,福州天主教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篇章。在从清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三百来年的时间里,福州天主教几度沉浮,随着政策和时局的变化,主要经历了两次兴盛和两次衰退,下面将以此二起二落做分水岭对这个时期福州天主教的历史进行一个简单阐述。

2.2.2.1 明清鼎革之初的机会: 1644—1665年

这个时期福州天主教有两次发展契机:一次是在驻福州的南明小朝廷时期,一次是在清兵攻占福州后。顺治二年(1645年)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隆武正位之初,即廷访毕神父(毕方济)来朝,欲重用之。毕神父不受,惟劝隆武奉教。隆武虽未能毅然信从,却出谕表章圣教,劝臣民皈依。”^[15]由于把持朝政的郑芝龙(郑成功之父)、黄道周(漳浦人)均为天主教徒,毕方济(Fransois Sambiasi)通过此

^[11] 施邦曜:《福建巡海道告示》,收于《圣朝破邪集》卷二:第30—35页。

^[12] 施邦曜:《福建巡海道告示》,收于《圣朝破邪集》卷二:第30—35页。

^[13] 吴起龙:《福州府告示》,收于《圣朝破邪集》卷二:第38页。

^[14] 李嗣玄:《思及艾先生行述》:第5—6页。

^[15]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五。收于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132—133页。

二人也得以进一步亲近了统治福州的这个“小朝廷”之上层人物，甚至使得隆武帝谕令改建“艾儒略与叶相国长孙前所建之堂”，并“大书敕建天主堂五字，又悬匾于堂上，工告成。曰‘上帝临汝’，立碑记其事。”^[11]“福建自隆武灭后，民人叛服不常”，由是兵乱迭起，福州几经战火，教务受到很大的阻碍，甚至“然圣堂被毁，什物被抢，教友死者，十居八九，两司铎（翟西满和穆尼）遂避乱于武夷山。”^[12]郑成功部队退避海上后，福州一带渐得安宁，加上时任闽浙巡抚的佟国器是天主教徒，对教会发展施以援手，福州天主教由是再复兴盛。

2.2.2.2 百年禁教中的蛰伏：1665^[13]—1842年

明崇祯三年（1630年）以后，西班牙多明我会、方济各会教士先后从菲律宾来到福建传教，他们的传教理念大大异于之前的耶稣会士。大约在17世纪70年代的时候，方济各会士万济国写的一本《辩祭》将福建拉入了礼仪之争。这场中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战的结果是，一些闽省官员对于传教士强硬派的做法甚感不满，屡次上疏反对天主教，如时任福建巡抚的张伯行于1709年草拟了请废天主教堂疏：“每教堂俱系西洋人分主，焚香开讲，收徒聚众，日增月益，不可禁止，诚恐其意有不可测。臣以菲才谬膺，皇上特达之知，授以严疆重任，夙夜祗慎，惟恐无以上报，主知此事，尤臣在闽所目睹而不得不言者。故敢竭尽愚诚，伏望皇上，特降明诏，各省西洋人氏，俱令回归本籍，其余教徒，尽行逐散，将天主堂改作义学，为诸生肄业之所，以厚风俗，以防意外。”^[14]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罗马教廷将福建教区单独授予多明我会，而耶稣会士在之后陆续撤出福州。由于多明我会反对中国传统礼仪，福州天主教徒中知识分子人数日渐减少。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康熙给教皇特使批示：“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再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西洋去。”^[15]天主教失去了在中国传教的政治条件。康熙之后，福州天主教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长达百余年的禁教，教会活动完

^[11]《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五。收于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132—133页。

^[12]《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五。收于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146页。

^[13]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4月：第172—179页。1664年9月15日，杨光先上请诛邪教状，掀起“康熙历狱”。1665年，耶稣会士二十五人，方济各会一人，多明我会四人由各省拘送京师东堂，再押往广州。时在榕传教士未能幸免，是为分水岭。

^[14]《正道堂全书》，同治五年，第一百四十三册。转引自林金水《中西礼仪之争在福建》，《教育评论》，1995年第3期。

^[15]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4月：第253页。

全转入地下，陷于低潮。

2.2.2.3 不平等条约下的兴盛：1842—1927年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到《黄埔条约》，再到《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又有续添之条，如天主耶稣圣教，原系为善之道，爱人如己嗣后。凡有传教奉教者，应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者，中国官，不得虐待禁阻”^[1] 福州成了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拉大臣(法国大臣拉格内)因请代奏朝廷，求驰教禁……从此，准西洋教士，在五口通商之地传教，随便建堂礼拜，并设立医院、育婴堂等事，惟不准入内地传教”^[2]，福州再次对传教士打开了大门，“又将从前抄没之天主堂、学堂、坟墓、教士房屋等件，一概赔还，交法国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3] 借助着这些不平等条约，福州天主教又进入了它的一个兴盛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福州天主教会多处购置田地，建设堂所，同时慈善事业、出版事业、教育事业等各项事业也多有发展，教徒人数也大幅增加。

2.2.2.4 “非基”和战乱下的萧条：1927—1949年

五四运动后，中国开始探索独立富强的道路，受西方教会领导的中国教会受到了很大冲击，以中国新知识分子为核心的社会各界对教会进行了一番又一番的挑战。从民国十一年到民国十六年（1922—1927年），被冠以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时期。而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福州城发生了“仁慈堂教案”，在事件中学生冲入澳尾巷仁慈堂和附近的天主堂捣毁设施，此案引发了福州各界的“非基督教运动”大游行。^[4] 在“非基”浪潮下，一些教会人士开始反思，并相应开始了基督教“本色化运动”。日本侵华后，战火纷飞，福州两度沦陷，教会教徒抗日者有之，随难民出走者有之，沉默者亦有之，福州天主教教务陷入萧条状态。抗战胜利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中国天主教建立“圣统治”，改“代牧区”为教区，福州教区升格为福建省之总主教区。

^[1]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五。收于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228页。

^[2]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五。收于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228-229页。

^[3]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五。收于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234页。

^[4] 参见邓碧玉《忆福州南门斗中路仁慈堂》、陈一黼《关于仁慈堂案一鳞半爪》，载于福建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五卷—基督教天主教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2.2.3 旧貌换新颜——曲折中探索前进：1949 年以来

解放初期，出于对新政权的不安，福州天主教部分传教士和教徒进行了一些阻挠革命和解放进程的活动。之后，随着大批传教士纷纷回国，福州天主教开展了与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中国教会的自立革新运动，并在 1953 年实现了福州地区天主教神职人员和工作人员完全本地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福州天主教活动被迫停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落实，文革时被占用的教堂、教会房屋以及被查抄的教会财务依政策给予了清退赔偿，一些教堂等聚会场所逐步恢复活动，并依据 1992 年省政府颁布的《福建省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管理暂行规定》管理工作趋于规范化，福州天主教开始朝着独立自主发展教务的方向发展。

2.3 新教传入福州史略

新教是在基督教会全球扩张的大背景下伴随着西方侵略的炮火来到我国的。《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传教士蜂拥而至，相继在闽地开辟传教区域，其中福州就因其独特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基督教在闽传播的中心之一。在发展过程中福州逐渐形成了以三大公会为主，其他小宗派为辅的传教局面。^[1]三大公会是由英、美等国传入的，差会总部在国外，教务、财务多由外国人掌控。而其它小宗派如真耶稣会和基督徒聚会处是由国人自己创建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虽是国外创建，却是由国人传入福州，所以这些小宗派体现了比较大的自主性。

2.3.1 美部会^[2]

最先进入福州的差会是美部会，1847 年 1 月 2 日杨顺（Stephen Johnson）乘鸦片船抵福州，并于中洲岛江南桥畔赁屋传教，^[3]是为新教传入福州之始。继杨顺之后到 1880 年美部会共有 28 位传教士来榕，^[4]他们最初活动局限于中洲岛，后来才先后在福州南台的保福山和城内的于山落脚。传教初期极为艰难，美部会在福州传教 10 年方有 1 人信教，外国传教士也因为水土不服、疾病等因素人数锐减。^[5]1856

^[1]三大公会指美部会、美以美会和圣公会，俗称“三公会”。此外，还有基督教聚会处、基督教福临安息日会、真耶稣会等，他们多于 20 世纪初传入或成立于福州，规模较小。可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福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福州地方志》（简编·下编）（油印本），1979 年 8 月：第 110-112 页。

^[2]美部会（ABCFM）是美国国外布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的简称，属美国公理宗。

^[3] 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Cambridge, Mass. 1974: P5.

^[4] 参见林金水、谢必震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P395-401；《1847-1880 年福州传教士名单》。

^[5] 美部会在榕教士由 1850 年有 15 人到 1856 年余 5 人。见翁怀友《福州公理会传道史》，《中华基督教史》P191。

年后华人传道开始出现,受洗人数不断增加。1867年后开始向长乐、永泰和闽北的邵武扩展传教区域。1884—1910年在闽美部会传教士出现一个高潮,达50余人,开辟了闽北、闽中教区。到1923年,福州公理会(美会后称公理会)于各处堂所计71处,而在城台区自备资脯便有四堂。^[1]而到解放后文革前,仍然举行活动的就剩观巷刘公纪念堂和铺前顶天主堂两堂。文革中,所有活动停止,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方得复苏。

2.3.2 美以美会^[2]

进入福州的第二个差会组织是美以美会,1847年美以美会派传教士怀德夫妇(Mr. And Mrs. Moses C. White)、柯林(Judson Dwight Collions)来到福州,^[3]连同后继来榕的早期美以美会传教士共计32人。^[4]最初,他们寄居于中洲美部会的教士寓所,后租房另住。开始传教事业进展缓慢,至1856年茶亭真神堂和仓山天安堂相继建成后,方有1857年7月14日第一个信徒陈安受洗入教。^[5]到1860年,真神堂和天安堂两处已有教徒54人,各项教会活动的举办也日趋正常。该会多用华人为劝士和传道,早期被按立为牧师的林振珍、许播美、许扬美、谢锡恩等七人被称为美以美会的“七个金灯台”、“七执事”。^[6]使用华人牧师传教对教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虽然美以美会入榕时间较美部会迟,但却逐渐发展成为在榕差会中最大和最成功的一个。”^[7]1877年以后,福州年议会、兴化年议会和延平年议会相继成立,布道范围日广。美以美会在福州传教过程中共创建了12座教堂,解放后仍有天安堂、真神堂等6处教堂开放活动。文革中教会活动被停止,教堂被占用,文革结束后各堂所陆续恢复活动。

2.3.3 圣公会^[8]

1850年5月传教士温敦(William Welton)、札成(Robert David Jackson)抵达福

^[1] 此四堂分别是观巷刘公纪念堂、铺前顶天主堂、霞浦街救灵堂、洪山桥水生堂。参见 Foochow Mission, A.B.C.F.M.(1847-1906)(美部会), A Century of Missions in China: P253.

^[2] 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属北美卫斯理宗。

^[3] 力士强:《美以美会历史》,载于金陵神学院:《中华基督教历史》(金陵神学志特刊20卷):第202页。

^[4] 参见林金水、谢必震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P395-401:《1847—1880年福州传教士名单》。

^[5] R.S.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with Characteristic Sketches and Incidents of Missionary Operations and Prospects in China,1861:P200-206.

^[6] 转引自朱峰:《在信仰与实践之间——福建基督教史钩沉》,汇美传意,2002年:第92页。

^[7] 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1847—1880. Cambridge, Mass.1974:P10.

^[8] 圣公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又称安立甘会、英布道会,属安立甘宗。它的教义、教规上仍保持天主教会传统,保留主教制并承认其继承使徒的性质。

州，揭开了又一大差会在榕传教的序幕。一开始他们租住于乌石山庙宇，后因地方士绅的反对，被迫移居别处。传教之初，同样是入榕十年未得一教徒受洗入教，至1861年3月方有林守谦、林九如二人入教。^[1] 1862年会长胡约翰来福州后传教事业才逐渐发展起来。1864年在南后街萃贤堂毁后重建，至1867年该会在城中另有安泰桥宣道堂和北门道源堂两座，圣公会在福州城中的工作得到巩固发展。此后，教务向外县扩展，至1883年布道区遍及14个县，教堂110座。1906年脱离港粤教区成立圣公会福建教区，1910年又改组省议会为正式教区议会。至解放后，该会仍有苍霞洲基督堂、施埔真学堂等多处堂所开放活动，之后该会教务与堂所走上与在榕其它教派相同的命运。

2.3.4 其它教派

在榕发展的其它教派主要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真耶稣会和基督徒聚会处，这些教派由于是国人传入或者国人创立，相对而言本土化和自主性比较强。同时，它们传入或者创建的时间也相对较迟。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在1911年由厦门人郭子颖牧师传至福州仓前山的，之前则是由华侨郑提摩太在1904年从国外传到厦门鼓浪屿。该会在福州总共创建了两处教堂，分别是大墙根福音堂和南公园堂。文革中同样遭受波折，1979年恢复宗教活动后在花巷堂恢复聚会。

真耶稣会在1923年由张巴拿由长沙传入福州，之前则是由河北人魏保罗在1917年时创立。1928年在福州集资建成福州第一座真耶稣教堂。此后，该教以福州为中心向省外和海外传播。

基督徒聚会处也是国人自创的教会，发源地在福州。创始人是福州人王载、王连俊、倪柝声，倪柝声后来成为该教派的领导人物。至1949年，该教派在福州共有5座教堂。

^[1] 参见叶见元：《中华圣公会福建会史》（一），载于《福声》，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一日：第十三期。

第3章 福州天主教教堂史迹考察与研究

“街头教堂是传教士的堡垒，在那里，猛烈的炮火射入敌人的阵营。”^[1]这句话很形象地描述出基督教刚传入中国时的情景以及教堂对于教会传教的重要性。基督教之传入中国，天主教奇装异服地顶着排力而来，新教则是尾随着炮火进入。在这种情况下，国人对洋人及其宗教的态度自是不能坦然。所以，教堂的建立，不仅可以满足传教的需要，促进传教事业的发展，还是一个教会在该地是否立足的标准。同时，从教堂的创建、搬迁、重修、兴衰的历史，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背景以及教会的发展状况。

3.1 福州天主教教堂历史考察

叶向高携艾儒略入闽开教后，其长孙高州君和其它教徒捐资创建了福州第一座天主教堂，即所谓的“福堂”和“三山堂”。该处教堂地址在“南门内宫巷”^[2]，创建时间不详。据载，该堂当初有“立碑记其事”，但如今已不得见，世人所能见者只有顺治十二年（1655年）的《建福州天主堂碑记》。^[3]明末福州市区另有两处天主堂，分别是敬一堂和景教堂。在经历明末“福建教案”、明清之际的战火以及清朝的百年禁教后，福州天主堂俱已湮没。直至鸦片战争后传教士们凭借着不平等条约才又再次在福州购地置产，并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在福州南门兜澳尾巷建造了福州近代第一座天主教堂。此后的清代和民国期间，随着福州天主教务的发展，教会又在福州多处购地建堂。解放后，各教堂或被占用或在文革中停止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些堂所重新开放，另一些被占用的堂所未归还者做赔偿处理。现今福州市区仍然开放使用的教堂共计5所，其余天主堂或者只能见其遗迹，或者已湮没至只存于文书史料中甚至绝迹于字面。^[4]

福州市天主教堂一览表

教堂名称	兴建时间	所在地址	现状
三山堂/福堂	不详	南门内宫巷	清乾隆年间被改成关帝庙使用

^[1] 转引自董黎：《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2]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3月：第190页。

^[3] 该碑记藏梵蒂冈图书馆，已影印辑入《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二册）：第963页至980页。

^[4] 见“福州市天主教堂一览表”

教一堂	不详	不详	已湮没
景教堂	不详	不详	已湮没
澳尾巷堂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	台江区南门外澳尾巷	现为福州市儿童医院使用
泛船浦总堂	清同治七年(1868年)	仓山区新民街54号	已开放
仓前天主堂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	仓山区仓前山乐群路10号	文化大革命停
马尾天主堂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马尾区上岐山	已开放
西门天主堂	民国四年(1905年)	鼓楼区鼓西路164号	已开放
崇爱堂	民国十二年(1923年)	万春井	1955停
崇真堂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	台江区中选路33号	租给台江区医院使用
救世堂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对湖爱国路	1952年被师大占用,现为军区使用
苍霞堂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苍霞敬义井8号	已开放
上渡天主堂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	仓山区上渡竹榄里李厝山	已开放
湾边天主堂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	郊区建新镇湾边村	1988年重建并恢复活动
达道堂	不详	达道路	毁于火灾

(表中所列教堂及其信息以《福州市宗教志》和相关史料为参考)

以下笔者将就其中比较重要的以及现在仍在使用的堂所做一具体介绍:

三山堂:即福州天主堂,又称“福堂”。该堂乃叶向高长孙高州君及其他教徒捐资创建,创建时间不详,地址在福州“南门内官巷”^[1]。该堂建筑风格比较中国化,据166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水师提督巴连卫林(Balthasar Bort)参观该堂的描述,“教堂的外表是中国寺庙风格,内部装饰也是中国化,祭坛与香炉雕刻着龙和其它头首,完全是异端的情调。只有有限的几张绘画与图片,如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报喜天使加百利,才可以看出基督教的特征。”^[2]以当时耶稣会的传教策略以及艾儒略的传教风格,对于该堂建筑风格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应该不难理解。同时代福建境内其它天主教堂风格与此类似,有些天主堂是从寺庙改来,建筑风格没有做任何修改,只是改了名称。三山堂与当时福州其它教堂不仅是信徒宗教活动的场所,

^[1]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3月:第190页。

^[2]John E.Wills: Some Dutch sources on the Jesuit China mission,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986: P268; 又见 Paul Demaerel: Couplet and the Dutch, *Philippe Couplet, S.J., 1623-1693*: P98. 转引自林金水《艾儒略与明末福州社会》,载于《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二期。

也是他们结社聚会的地方，同时每座教堂还是一所刻书社。在三山堂刻印的书有：杨廷筠《天释明辨》、艾儒略《性学编述》（1646年）、《五十余言》（1645年）、《三山论学记》、龙华民《圣若撒法始末》（1645年）。¹¹¹

三山堂共计修建过两次，本文前面略有提及。第一次在顺治二年（1645年），时隆武帝建号于闽，某日前往该处教堂观之，嫌其湫隘，遂谕令改建“艾儒略与叶相国长孙前所建之堂”，并“大书敕建天主堂五字，又悬匾于堂上，工告成。曰‘上帝临汝’，立碑记其事。”¹¹²之后，三山堂烧毁于明清之际的战乱中。顺治十二年（1665年），都察院都御使兼闽浙巡抚、天主教徒佟国器赠俸银两资助在福州传教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何大化重建三山堂，并亲撰《福州重建圣堂碑记》，对天主教大加褒扬。¹¹³清乾隆年间，禁止传教，该堂“圣教窘难时，改作庙宇，然碑犹存。”¹¹⁴同治二年（1863年），发还旧时没收的教产，福建省通商总局照会法国领事，协议以泛船浦民田抵换宫巷教堂。

澳尾巷天主堂：又称“澳尾巷玫瑰圣母堂”，坐落于福州市台江区南门外澳尾巷，由西班牙多明我会建造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其奉玫瑰圣母为主保，故有其名，传教范围划在洋头口以北至安泰桥以南地段，教友多为圣堂附近和洗马桥、洋头口、南门兜、河上、斗池、大风乡、小凤山等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等，是福州现存最古老的一座天主堂。其建筑风格为中西合璧，哥特式的四层塔楼，建筑面积507.8平方米。外观宏伟挺拔，有一对大钟楼，每日早6时、午12时、晚6时各鸣钟一次，钟声嘹亮，十里之外亦能闻之。堂内祭台顶端是仿古殿宇建筑，可容纳千余人。时教会中重大庆典多在该堂举行，其中有神父江清华晋铎金庆纪念、多明我会在闽传教300周年纪念、主教赵炳华祝圣大典、罗马教廷第二任驻华代表总主教蔡宁来闽视察举行大礼弥撒等。

最初，该堂为天主教福建代牧区驻榕办事处。光绪九年（1883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间为天主教福建北境代牧区主教座堂兼福州多明我会会堂，历任主教堂的主教有李宏治、苏玛索、宋金玲。民国元年（1911年），西班牙籍主教宋金玲将

¹¹¹ A.C.Dudiuk: The historical sources of the 17th century China mission, in particular Fujian during the late Ming; Table IV. 转引自林金水《艾儒略与明末福州社会》，载于《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二期。

¹¹²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五。收于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132—133页。

¹¹³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五。收于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152—154页。

¹¹⁴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五。收于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152页。

主教座堂迁往泛船浦，该堂改为多明我会福州会长堂，历任会长有连马令、陈嘉莫、艾仁忠、吕良士、明元堂。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多明我会迁往中选路崇真堂，此堂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改作澳尾巷铎区本堂，有外籍神父胡良明、卢星辉。新中国成立后，有中国籍神父叶拱峰等。1966年文革期间被关闭，为福州市电镀厂占用，建筑受到破坏。1981年福州市天主教会收回产权，但未开放做宗教活动使用，而是组给福州电镀厂使用。^[11]1987年起，福州市电镀厂搬迁，该堂转租给福州市儿童医院使用。1987年，澳尾巷天主堂被列为台江区文物保护单位。^[12]如今该堂早已废弃不用，走近教堂要从茶亭街口福州市儿童医院大门进入，教堂大门紧锁，只有门边墙角立着的一块文物保护碑记仍在向走近的人提醒它的过往历史。

泛船浦天主堂：又称“福州圣多明我主教座堂”，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泛船浦^[13]菖蒲墩（今福州市仓山区新民街54号）。清同治二年（1863年），发还旧时没收的教产，福建省通商总局照会法国领事，协议以泛船浦民田抵换宫巷的三山堂。同治三年（1864年），福州府以南台泛船浦、菖蒲墩4亩多民田，抵偿被改为关帝庙的原宫巷三山堂。同年，来华的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李宏治（T. M. Gentili）在仓山菖蒲墩泛舟向水上渔民传教，三四年间发展了教徒千余人。同治七年（1868年），李宏治在该处建造了此堂。^[14]该堂奉圣多明我为主保，原传教范围划在福州市南台岛以东，即仓山区的东半部。

该堂初始建筑为木构双层建筑，底层做教堂使用，楼上做神父居室。^[15]宣统三年（1911年）后被改作福州教区主教座堂使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由宋金玲（Francois Aguirre）主教募集10万银元重建，在旧堂边上建造新的教堂，又将旧堂拆除，改建双层24开间的新教堂。翌年落成，此即现存的泛船浦天主堂。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又在新教堂北侧建造花地玛圣母亭和圣家公所各一座。重建后的教堂为钢筋水泥砖木结构，单塔楼，仿哥特式建筑。堂身呈十字型，长60.2米，宽19.52米，建筑面积为1371.4平方米，可容两千余人。教堂共建三层，主堂北面

^[11] 《台江区志》（台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6）认为该堂产权是到1987年方由人民政府归还教会。

^[12] 台江区文化局（1987）第23号《关于做好保护台江区文物点的紧急通知》。

^[13] 仓前山，雄踞南台岛的北面，与台江隔江相望，三面临江，景色秀丽，环境幽静。明代就开辟“番船浦”，以便外国船只往来寄碇停泊，后音转为今名“泛船浦”。

^[14] 《福州市志》（第八册）（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2001）认为建堂时间是同治三年（1864年），《仓山区志》（仓山区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11）则认为李宏治到该处传教时间为同治三年（1864年），三四年间收教徒千余人，始于同治七年（1868年）建堂。

^[15] 《福州市志》（第八册）（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2001）认为原建筑为木构单层建筑。

高高耸立着一座钟塔楼，塔楼上竖立一十字架，塔尖距地面 31.2 米，塔楼上装有报时大钟，敲响钟声可传十里处。（见图 3-1 泛船浦天主堂北面）堂内顶部做拱形穹窿，缀以星辰，两侧和祭坛上部窗门装有彩色花玻璃，前沿三间玻璃绘有八幅彩色圣像。（见图 3-2 泛船浦天主堂内景）整座教堂气势雄伟，时称江南第一大堂，也是现存福州天主教堂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图 3-1 泛船浦天主堂北面



图 3-2 泛船浦天主堂内景



图 3-3 泛船浦天主堂旁边的神父楼

“文化大革命”期间，该堂被福州市蓄电池厂占用，1982年落实宗教政策，教堂归还教会。1985年，教堂经修葺后于圣诞节正式复堂。1986年省、市天主教爱国会和教务委员会移驻该堂。该堂于1988年列为仓山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福州天主教总教区的总堂。2006年10月，因为市区改建工程的需要，泛船浦教堂神父楼（见图3-3泛船浦天主堂旁的神父楼）需进行迁移工程，而教堂附近的环境现今也起了很大的变化，一栋崭新的住宅高楼正在建设，而原本福建很多信徒居民都被拆迁到了别处。（见图3-4改建中的泛船浦天主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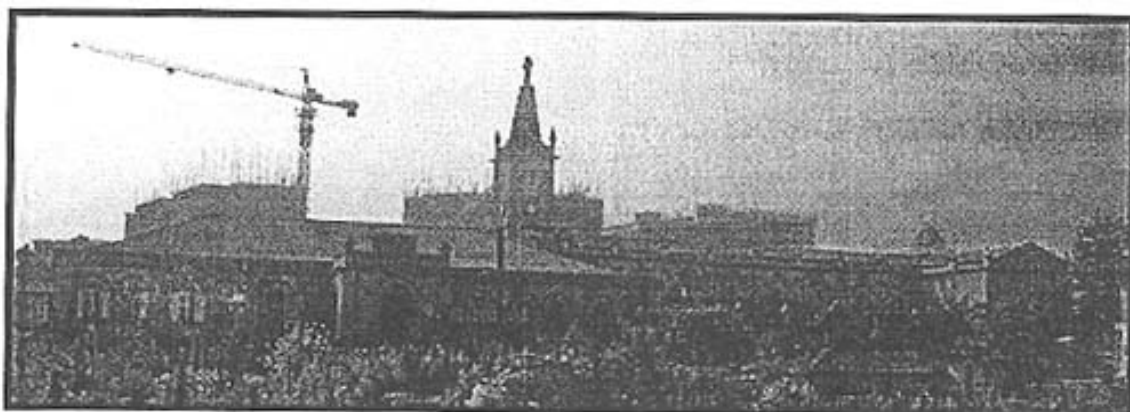


图3-4 改建中的泛船浦天主堂

仓前天主堂：坐落于仓山区仓前山乐群路（今乐群路10号），为二层西式洋楼，原属于某洋行。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福建北境代牧区买下该洋行作为临时主教公署，并在公署西南面建仓前堂。民国元年，主教公署迁往泛船浦总堂后，此楼房先后租给法国领事馆、齐鲁医学院和中国救济总署。民国36年，福州教区将婴德小修院迁入其内，并将主楼底层打通辟为祈祷厅，奉德肋撒圣女为主保，供修生和仓前一带教友过宗教生活。该祈祷厅面积约150平方米，可容200余人。1950年，应仓前教友的要求，福州教区批准成立仓前、上渡本铎区，派当时的婴德小修院院长林泉兼任本堂司铎，划定传教范围东起仓前桥头西至龙潭角。“文化大革命”期间，该堂被附近居民占用。1981年产权落实归还教会，仍由住户继续租用。

马尾天主堂：又称“营盘顶耶稣圣心堂”，位于马尾区上岐山。清同治五年（1866年），马尾设立福州船政局，其英、法洋匠房之左侧均建有各自的小教堂，并在上岐山建造有一座双层石砌楼房。光绪八年（1882年），法国籍员工合同期满回国，他们将石屋赠给福州天主教会。光绪十一年（1885年），福州天主教会以石屋为基

基础，创建马尾天主堂，接纳当地天主教徒。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船政法籍监督杜业尔在三岐山兴建新堂，建筑为砖木结构，单层西式建筑，面积约有二百多平方米，可容三四百人。该堂主保为耶稣圣心，传教范围起先限于马尾，后来扩展至洋屿、闽安镇。“文化大革命”期间，该堂作马尾造船厂职工宿舍使用。1981年产权退还教会，由造船厂继续租用8年。1989年，该堂收回教会使用。1996年，该堂进行重建。现存天主堂占地1800平方米，主堂为哥特式建筑，高8.5米。（见图3-5 马尾天主堂）



图3-5 马尾天主教堂

西门天主堂：旧称“定远桥天主堂”，位于福州城内鼓西路（今鼓楼区鼓西路164号），前身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一位漳州籍教友捐献给教会的一座临街平房。民国四年（1905年），由堂口集资、教区津贴，在原址起建木构单层教堂。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添建西式双层神父楼一座。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教堂被洪水淹没后重建，新堂面积约二百平方米，可容教友三四百人。该堂奉若瑟圣人为主保，传教范围在福州城西北片。“文化大革命”期间，该堂被鼓楼区教师进修学校占用，单层教堂被拆改为双层平房。1979年底该堂神父楼归还教会。1983年进修校搬迁，教堂恢复完整。1990年，该堂自筹资金扩建神父楼底层祈祷厅。1998年初，老本堂何敦乾神父多方筹措资金，乘鼓西路旧城改造之机，再次重建西门堂。1998年10月，新堂落成。新堂建筑有四层，面积6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1247平方米。（见图3-6 西门天主堂正面和图3-7 西门天主堂内景）



图 3-6 西门天主堂正面



图 3-7 西门天主堂内景

崇真堂：又称“台江区中选天主堂”，位于今台江区中选路32号。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福州多明我会出资5万银元，将坐落于台江中选路的日侨博爱医院旧址买下，改作会堂，作为多明我在福州的会长堂。30年代初，中华公教进行会福州分会成立，该堂又作为中华公教进行会福州分会办事处，曾创办《导南半月刊》。之后，随着教友人数增加，原本改造的圣堂已不够使用。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多明我会利用原址空地另建一座新堂，名曰“崇真堂”。新建的崇真堂为十字型建筑，面积356.5平方米，可容六七百人。该堂奉味增德圣人为主保，传教范围在台江中选、排尾一带，教友多为码头附近、鸭姆洲当地的水上居民。“文化大革命”期间，该堂被台江区医院占用。1981年产权退还教会，由台江区医院继续租用。

苍霞洲天主堂：又称“苍霞洲耶稣圣心堂”，位于福州台江敬义巷（今敬义巷8号）。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外籍主教苏玛索在台江敬义巷购得一座茶行仓库，将其改建为教堂，面积约800平方米，能容纳千余名教徒。该堂奉耶稣圣心为主保，传教范围主要是在苍霞洲、义洲、帮洲、三保、彬社一带，教徒大多数是船民，少数为手工业者和农民。“文化大革命”期间，该堂被福州汽车配件七厂占用。1981年，由市交通局将产权退还教会。1986年，该堂修葺一新，于耶稣复活节当日正式恢复开放。（见图3-8 苍霞洲天主堂旧堂）2004年，因旧堂破损严重，继而转入重建，新堂建筑面积达2400平方米，框架结构，采用欧式建筑风格，造价约150万元，大部分资金是在建筑过程中教友捐献。（见图3-9 苍霞天主堂新堂）



图 3-8 苍霞洲天主堂旧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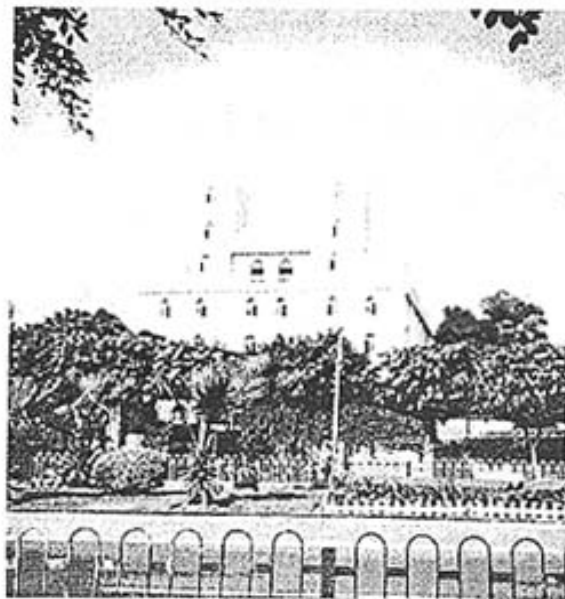


图 3-9 苍霞洲天主堂新堂

上渡天主堂：位于上渡竹榄里李厝山北面，为民国 36 年（1947 年）当地教徒唐春禄等 11 人集资兴建，是民国时期福州地区惟一由当地教友独资兴建的天主堂。该堂为单层木构建筑，堂内面积 355 平方米，可容五六百人。全堂总面积为 817.3 平方米。上渡堂建成后，奉法蒂玛圣女为主保，由仓前婴德小修院兼管，传教范围划在上渡、尤溪洲、洋洽一带。“文化大革命”初期，该堂被上渡街道占用，后来转给福州市第五塑料厂。1981 年产权归还教会。1994 年 10 月教堂退还教会使用。

湾边天主堂：位于郊区建新镇湾边村（现区划归仓山区），建新镇湾边村的大部分渔民在清末民初入教，起初在闽侯县的南屿教堂做礼拜，后为适应游渔生活，自动集结船只在湾边附近江面上举行祈祷礼拜。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1]由南屿天主堂神甫李吾网主持创建湾边天主堂。该堂为单层砖木结构，面积 80 余平方米，可容百余人。该堂奉露德圣母为主保，传教范围面向本村，教徒大部分是湾边村渔民，所属该堂的教区其它村落的教徒只有寥寥数人。“文化大革命”期间，该堂受到严重损坏。1988 年，由福州教区拨款重建，恢复宗教活动。

3.2 福州天主教教堂分布态势及其促成因素分析

教堂分布态势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时间上，各个教堂创建时间有迟有早，而且在各个时间段上有多有少；另一种则是地理位置上的，主要是各个教堂的地理分布状况和地理分布趋向，以及各个地区教堂分布的多少对比、疏密对比。福州天主教教堂在时间轴分布上以及地理位置分布上，都呈现了一定的特点。下面笔者将对福州天主教教堂分布态势上的这些特点以及促成因素做一分析。

3.2.1 福州天主教教堂创建时间分布态势及其促进因素分析

如前面第二章介绍福州天主教历史所述，天主教在福州的历史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时期：从明天启四年（1624 年）至明朝覆亡前（1644 年），是艾儒略至福州开教时期；从清兵入关（1644 年）至建国前（1949 年），是福州天主教兴衰反复交替的发展时期；从 1949 年以来，是福州天主教旧貌换新颜的重新发展时期。在各个时期中福州天主教教堂的创建数目对比如下表：

^[1] 《福州市志》第八册（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2001）认为该堂创建时间为 1953 年。

福州天主教教堂各时期创建数目统计表

时期		教堂创建数	备注
开教时期		3	天主教于明末在福州共有三处教堂，分别是三山堂、敬一堂和景教堂。
兴衰反 复交替 发展时 期	明清鼎革时期	0	南明隆武和清初佟国器两度修缮三山堂
	清朝禁教时期	0	三山堂改作关帝庙
	鸦片战争后至 解放前	11	澳尾巷堂（1848年）、泛船浦堂（1868年）、仓前天主堂（1893年）、马尾天主堂（1903年）、西门天主堂（1905年）、崇爱堂（1923年）、崇真堂（1932年）、救世堂（1933年）、仓霞堂（1933年）、上渡天主堂（1947年）、湾边天主堂（1947年）、达道堂（不详）
建国后		0	文革中，所有教堂或关闭或被占用；文革后，退还教产，现开放使用的共计6处。

如统计表所示，福州天主教教堂的创建呈现了集中于某一时间段的特征，并且在整个时间段上有一个明显的起落。除了明末开教时期创建的三座教堂，天主教在福州 380 多年的历史中所创建的教堂，都集中在了鸦片战争后到解放前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之后，福州天主教教堂的创建再次陷入冰点的低潮期。笔者认为，推动这种时间上分布态势形成的主要因素有：

3.2.1.1 天主教在华传教方针及策略的变化

福州开教时期，艾儒略奉行利玛窦制定的“适应”策略的路线，翼借用中国儒家思想和传统思想，力求使基督教信仰与之相适应，并在传教过程中注重发挥中国教徒和士大夫的作用。林金水教授在《艾儒略与福建士大夫的交游——东西方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对话，兼论天学与儒学的相容与排斥》总结出艾儒略“适应”策略的几种形式，其一：天学和儒学之间存在着可容性，即双方内在之间有等同或相近之处；其二：天学与儒学之间存在着可比性，即东西方思想可以借助演绎和推理沟通起来；其三：天学与儒学之间既没有可容性也没有可比性，此时便借用儒家思想的某些命题或它的语言外壳对它加以匡正和修补，使基督教信仰与儒学思想强行

联系起来。^[11]艾儒略这种传教策略在福州士大夫中获得了一定的成功，由此成功在福州站住了脚跟，并和诸多士人建立了良好的感情。这些士人在福州天主教的开创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叶向高长孙高州君连同其它教徒捐资创建了三山堂。

之后，随着西方各国来华传教士的增多，出于利益的不同以及对对中国国情理解的差异，传教士中在对华传教策略上的争论逐渐激烈了起来，最终引发了所谓的“中国礼仪之争”。而在17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万济国写的一本《辩祭》将福建也拉入了礼仪之争。天主教在华传教策略的转变及其引起的礼仪之争，最终惹怒了清朝统治者，并由此开始了历时四朝的禁教。福州天主教会也由此转入低谷，开教时期所创的三座教堂，也由此湮没。

3.2.1.2 中国官方对天主教态度及其政策的变化

明清之际，由于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传教策略的成功，虽然有过类似“南京教案”、“历狱”及“福建教案”等事件的摩擦，但总体上官方对于早期天主教会的态度是宽容的，在政策上也没有对天主教有什么特别的限制。包括福州天主教在内的中国天主教的传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之后，礼仪之争使得康熙怒批：“览此告示，只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12]若说康熙尚未天主教留了一丝活路，^[13]自雍正朝后禁教真正开始，“近在福建，有若干欧西人侵扰我百姓，蔑视我法律，福建官长来奏申报，朕当制止乱行；此为我国家之事，朕当负责执行者也；朕为太子时可以不闻不问；今则不能不统治也。尔等谓你等之法律不是伪的，朕亦相信，不然朕将命尽毁尔等之圣堂及完全驱逐尔等。”^[14]乾隆朝延续了雍正一样的政策，并且更加严厉，“内地民人有称神甫者，即与受其官职无异，本应重治其罪，姑念愚民被惑，且利其财物，审明后应拟发往伊犁，给额鲁特为奴。”^[15]嘉靖一朝，天主教更是由“邪说”变成了“邪教”，天主教徒成了“匪”。

^[11] 林金水：《艾儒略与福建士大夫的交游——东西文化的接触与对话，兼论天学与儒学的相容与排斥》，载于朱维干主编《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

^[12] 陈垣辑录《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书》（影印本二），转引自于本源：《清王朝的宗教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203—204页。

^[13] 当时康熙将中国的天主教划分成两种，一不禁一禁，如果天主教遵守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便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不背行。

^[14] 《世宗实录》卷十四。转引自徐宗泽：《中国天主教史概论》，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p255—257。

^[15] 《高宗实录》卷1219：第5—6页，转引自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成都，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191页。

禁教政策在雍、乾、嘉三朝愈演愈烈，这种状况直至道光朝的鸦片战争后才发生了改变。

鸦片战争后，虽然清政府不情愿，对天主教的想法也没什么改变，但是慑于西方列强的炮火，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禁教政策开始解禁，并被迫签下了一系列有利于传教的条约。同时，由于战败的打击，清政府对西洋人连同传教士至少在表面上有了一定的转变。在众多条约中，类似“合众国民人在五口贸易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11] 或者“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12] 这样的规定，极大促进了新的天主教在各个口岸直至内地的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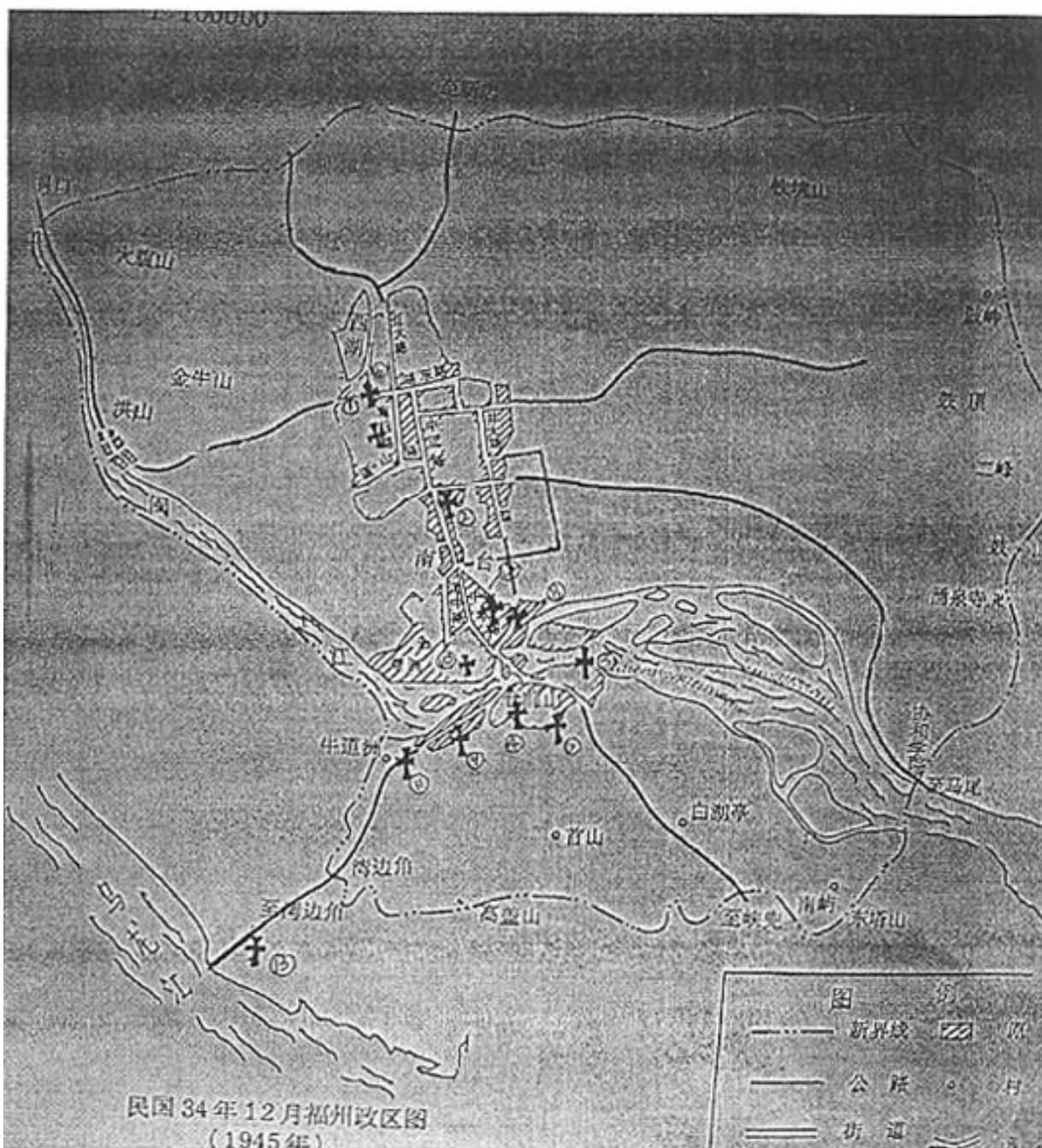
清朝灭亡之后，民国的宗教政策愈加有利于天主教的发展。由于基督教对反清革命的支持，同时进行革命的资产阶级多少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民国政府成立后公开申明宗教信仰自由。之后，至解放前，虽然官方态度有起有落，但大体上的宗教政策并没有什么变化，天主教的发展也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而解放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革中，宗教政策未能落实，天主教的发展再次陷入低谷，教堂也纷纷关闭挪作他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政策的重新落实。

^[11] 《望厦条约》，摘自褚德新、梁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第89—90页。

^[12] 《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款，摘自褚德新、梁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第95—105页。

3.2.2 福州天主教教堂地理分布态势及其促进因素分析

图 3-10 福州天主教教堂所在位置示意图



图片说明：明末敬一堂和景教堂位置不详，故图中并未标示。示意图中黑色十字架标示的即是教堂的大体位置，十字架标志旁边的序号代表不同的教堂。以下是各序号所代表的教堂：1. 三山堂/福堂：南门内官巷；2. 澳尾巷堂：台江区南门外澳尾巷；3. 泛船浦：仓山区新民街 54

号；4. 仓前天主堂：仓山区仓前山乐群路10号；5. 马尾天主堂：马尾区上岐山；6. 西门天主堂：鼓楼区鼓西路164号；7. 崇爱堂：仓山区万春弄；8. 崇真堂：台江区中选路；9. 救世堂：仓山区对湖爱国路；10. 苍霞堂：台江区苍霞敬义弄8号；11. 上渡天主堂：仓山区上渡竹榄里李厝山；12. 达道堂：台江区达道路；13. 湾边天主堂：郊区建新镇湾边村。

从上面的“福州天主教堂所在位置示意图”可以看出，天主教在福州的13个^[1]教堂中，除了明末的三山堂、清末解禁后创立的第一个教堂——澳尾巷教堂，以及民国后创建的第一个教堂——西门堂，其它10座教堂的位置都在江边或者离江不远的地方，呈现了沿江分布发展的态势。笔者认为，除了些许交通上的考虑外，促进这种态势形成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福州船民。

船民是沿海和内河的水上居民，俗称蛋民、蜑民和蟹民，主要分布在广西、广东和福建一带。船民比起路上人群，谋生条件更为艰苦。船民们遇到的生活挑战，大多是船民个人之力无法解决的。但是由于船民自身的流动性与分散性的特点，船民常年在水上从事运输工作，船即是家，居无定所，很难形成一个整体来应付遇到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船民对于神祇的需求便产生了，神祇信仰可以给予船民一定的精神支柱，并可以把不同地方的船民联结成一个整体。天主教的出现，也同样迎合了这种需求。

但船民并没有因为这种需求关系从而在船民与天主教的关系中成为主动的一方。其实，天主教传教士远在明末清初时期就已经注意到了船民阶级。当时在福建传教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走致力于下层人民的传教路线，船民是对象之一。清朝禁教后，福州天主教活动转入地下，传教活动并没有绝息，传教士们匿居于教徒之中，“因有许多河港，可以以船为家，隐匿其中。”^[2]传教士因此和船民建立亲密的联系。鸦片战争后，天主教解禁，并获取了由不平等条约而来的一些权力，如“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伺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3]船民本系社会低微之人，常受欺凌，入天主教后可取得洋势力的帮助，以教友的身份作为护身符，因此船民大批入教，“迨

^[1] 如示意图说明所述，明末时的敬一堂和聚教堂具体位置不详，此处暂不把这两处教堂计算在内。

^[2]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44页。

^[3] 《南京条约》，摘自褚德新、梁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8：第71页。

至满清末叶，另一批‘番人’在南台菖蒲墩设立天主教堂，当地一些蛋民皆加入为教友，借作护身符，冀免无赖之徒逞雄欺压。”^[1]

由是船民们大批加入天主教，据统计，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福州仓山区共有天主教65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船民。^[2]同时，由于船民相对较容易被引入教，鸦片战争后的天主教把传教重点放在船民身上。如此，众多教堂沿江分布，实不足为奇。

^[1]王振忠：《波渺渺，水悠悠》，载于《读书》，1995年第12期，第136页。

^[2]数据参考自《仓山区志》（仓山区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11）。

第4章 福州新教教堂史迹考察与研究

4.1 福州市新教教堂历史考察

新教在福州的发展形成了以三大公会为主，其它小宗派为辅的局面。^[1]从美部会在下渡小岭租赁一店铺改建成福州第一个礼拜堂开始，到1949年建国之前，新教在福州共有教堂48座。建国初期，维系活动的教堂剩下18座，而1958年“大跃进”后，维持正常宗教活动的仅剩5座^[2]。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教牧人员下放，所有的教堂都停止了活动。1979年落实宗教政策后，教会活动逐渐恢复，教堂也逐批恢复活动，至1994年底恢复活动的有24座。^[3]

福州市区教堂数目统计表（该统计表以《福州宗教志》为参考）

公 会	1949年8月教堂数	1966年6月教堂数	1979年恢复活动后教堂数
美部会	16	1	
美以美会	12	2	
圣公会	11	2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2	1	
真耶稣教会	2	1	
基督徒聚会处	5	1	
合 计	48	8	24

1958—1959年“大跃进”期间仍坚持主日崇拜的教堂

公 会	堂 名	地 点
美部会	救主堂	铺前顶
美以美会	天安堂	天安路
	尚友堂	花巷

^[1] 三大公会：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和圣公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其它小宗派主要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真耶稣会以及基督徒聚会处。

^[2] 见表“1958—1959年‘大跃进’期间仍坚持主日崇拜的教堂”。

^[3] 见表“福州市区教堂数目统计表”。

圣公会	苍霞洲基督堂	苍霞洲
	真学堂	施埔

(该统计表以《福州市宗教志》(姚午生主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为参考)

4.1.1 美部会教堂历史考察

美部会传入福州初期,由于和约的限制以及福州地方士绅的抵制,其活动被限制在中洲一带,只能在中洲建立寓所,并在下渡小岭租赁一店铺改造成礼拜堂使用。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美部会终在南台浦如山(Punasang,即保福山,今之吉祥山)买到一块私人墓地并籍此建立了两座洋楼。咸丰三年(1853年),美部会将中洲寓所及小岭堂转让,迁往保福山并以此作为宣道活动中心。咸丰十一年(1861年),美部会买下于山下太平街兴贤铺、金粟山等六处地产,随之在附近建教堂,办学校,设医院,终于是成功进据福州城内。至解放前,美部会在福州教堂共计有16座,^[1]在三大差会中居首位。

美部会福州市区教堂一览表^[2]

教堂名称	兴建时间	所在地址	附注
救主堂	清咸丰八年(1858年)	台江区八一七中路772号	1990年改名铺前堂重新开放
水部堂	同治八年(1869年)	鼓楼区水部街	
窗下堂	同治九年九月(1870年)	窗下	
刘公纪念堂	光绪七年(1881年)	鼓楼区观巷9号	1881年为中华基督教闽中协会总堂,1992年改名观巷堂重新开放。
霞浦堂	光绪九年(1883年)	霞浦街,今延平路13-14号	台江五金厂使用
西门堂	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年)	鼓楼区西门	
福世堂	光绪二十年(1894年)	鼓楼区杨桥巷	
开元堂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鼓楼区开元楼	

^[1] 见表“美部会福州市区教堂一览表”,此统计没有加上初期在下渡小岭租赁店铺改造成的礼拜堂,该礼拜堂后转让给美以美会。

^[2] 该统计表之所列教堂以《福州市宗教志》为参考,教堂年代主要以《闽中会刊》等资料为参考,其中有差异者,以《闽中会刊》所登记时间为准。

洪山堂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鼓楼区洪山桥	1984年重新开放
三保堂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台江区三保直街46号	
尚德堂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 (1898年)	晋安区塔头街	1984年重新开放
后屿堂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晋安区鼓山镇后屿鼓一村	
马尾堂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马尾	1978年重新开放, 新堂1991年完工。
后洋堂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后洋里, 今台江区仓霞合春埕14号	改洲边小学校舍使用
晨世堂	不详	鼓楼区澳桥下	
后洲堂	不详	后洲, 今迎晖里1号	福州第十七中学校舍

美部会福州教堂的历史发展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初期限制于城外, 中期进据城内, 后期由城区向郊区发展。以下笔者将遴选各时期代表教堂做一历史简介。

铺前天主堂: 坐落于吉祥山铺前顶(今台江区八一七中路772号)。清咸丰八年(1858年)由美国美部会传教士杨顺和弼履仁夫妇(Mr. And Mrs. Lyman B. Peet)所创建, 是美部会在福州创建的第一座教堂。曾四度遭受火灾, 之后重新修建为砖木结构哥特式建筑, 大小约可容纳1500人。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举行过基督教传入福州100周年纪念会。1959年, 该堂主日崇拜活动移至小礼堂, 大礼堂让出办革新纸品厂。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停止所有宗教活动。1977年该堂成为福州无线电元件八厂厂部。1984年, 福州市人民政府批准由教会收回房产, 但因工厂未能及时搬迁, 直至1989年才正式由福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收回。经一年修缮, 于1990年1月7日正式恢复宗教活动。

观巷刘公纪念堂^[1]: 原名太平街教堂, 当时因为原址是在城区白塔边的太平街, 故名。创建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 原来只是一间民房, 后因信徒增加, 倡议另建新堂, 适逢时任中国海关税务司的刘谦安为纪念其父刘孟澁牧师而捐献了一笔巨款, 教会于是在城区觅地建堂, 最后选定了城区法海路的观巷(今鼓楼区观巷9号)购地建

^[1] 材料参考邹天欢:《刘公纪念堂简介》,《福州基督教资料选辑》(第一辑),基督教三自爱国劳动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1987年3月:第64-69页。

筑教堂。民国五年（1916年），新堂落成，为砖木结构、三面有楼、四方形的大教堂，堂所面积1888平方米，约可容纳1800多人。该堂落成之后，为了纪念刘孟湜牧师及其对教会所做的贡献，所以特地命名为“刘孟湜牧师纪念堂”，简称为“刘公纪念堂”，在该堂的门口刻有石碑，铭目“刘孟湜牧师纪念堂”。刘公纪念堂建成之后，一直是中华基督教会闽中协会的总堂，^[1] 举凡重要会议及节日大型音乐会均在此召开。该堂不但是中华基督教会闽中协会的总堂，而且也是福州各教派在城区大型的聚会场所。每年由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圣公会以及卫理公会等三公会联合举行的全市性的庆祝圣诞节及复活节联合音乐崇拜在城区演出，多系在该堂举行。解放后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该堂照样进行宗教活动。文革期间，教会被破坏，教堂被福建省人民医院占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宗教政策落实，该堂房地产归还教会。1992年改名观巷堂重新开放。

洪山堂：又称“永生堂”，原是美部会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洪山桥（今洪山桥街136号）创办的私塾学校，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改为“永生堂”。该堂占地面积7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平方米，单层12间，土木结构。“文化大革命”中，教堂被占作别用。1979年后，逐步恢复宗教活动，1987年4月列为开放教堂，1992年教堂改建。

4.1.2 美以美会教堂历史考察

美以美会传教士初到福州时，也试图到城内和台南建立传教场所，由于官绅及民众的反对，一样失败了。所以初期美以美会只能在闽江南岸的仓山发展，1855年他们在南台仓前街找到了一所面积仅有750英尺见方的小屋做为临时布道所，这也是开辟天安堂的先声。^[2] 之后新条约允许传教士在各通商口岸租借土地，建立教堂，自由传教，美以美会便积极向城内发展。经美国布道会同意后，选定福州茶亭兴建真神堂。咸丰六年（1856年），真神堂和天安堂相继落成，巩固和促进了美以美会在福州的发展。之后，美以美会又相继在福州各处建立了教堂做为传教据点，所建教堂共计有11座。^[3] 其中，东街堂早已停办，浦下堂牧师死后合并于城门堂。此外，在西门保定巷设有一个布道所，该布道所于解放初期停办，未统计在内。

^[1] 当时在福建的中华基督教会，计分为：闽中协会、闽北协会和闽南大会三个大会。到了1956年才合并成立为“中华基督教会福建大会”。

^[2] 参见严子祺：《福州基督教一些堂所的情况》，出自《文史资料选编》（第五卷—基督教天主教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21页。

^[3] 见下表“美以美会福州教堂一览表”。

美以美会福州教堂一览表^[1]

堂名	创建时间	地点	附注
真神堂	1856年	茶亭	
天安堂	1856年	天安里	
尚友堂	1857年	花巷	
义序堂(宣道堂)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盖山镇竹榄村	1984年7月开放
尚仁堂	不详	三保	
正道堂	民国七年(1918年)	炉雷	
福民堂	民国十年(1921年)	上渡	
小岭堂	不详	小岭	
城门堂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	城城镇城门村	开放中
浦下堂	不详	浦下	合并于城门堂
东街堂	不详	东街	早已停办

美以美会进入福州时间较美部会晚，但它却成功地发展成为福州最大的差会，其教堂也创办得较为成功。其中，旧城区外的真神堂和天安堂，旧城区内的尚友堂以及郊区的城门堂，都是该会教堂的发展典型。

真神堂：该堂位于南台茶亭（今八一七中路508号）。清咸丰六年（1856年），美以美会传教士麦利和（Robert Samuel Maclay）在福州茶亭购地建堂，取名为“真神堂”。该堂成为美以美会在福州的第一堂，比天安堂的建堂还早两个月。^[2]后来在日本、朝鲜等地的卫理公会，也是福州这里传到那边去的。真神堂虽小，但是历史悠久，是美以美会在东亚的第一堂。该堂立有石碑一块，碑文记载，“真神堂之设，系美国牧师麦君利和于道光廿七年来闽传道，至咸丰六年在闽南台茶亭首构圣堂，名曰真神堂。越年，陈安首先信道，许君播美等次之。……考此堂乃美以美立会于亚东之始也。迄今五十五载，历任牧师十有五人，恐其久不得而知，故致之以为考古者鉴之。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循环司（即教区长）钟德明志。”^[3]碑

^[1] 该统计表以《福州市宗教志》为参考，其中，义序堂、城门堂、东街堂、浦下堂为该志所未提及。

^[2] 真神堂建成时间在1856年8月，天安堂建成在1856年10月。参见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with Characteristic Sketches and Incidents of Missionary Operations and Prospects in China, 1861*, P200-206

^[3] 引自于“真神堂碑刻”，该碑刻为时任美以美会教区长的钟德明立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现保存在于山九仙观中。

文大致阐述了麦利和牧师来福州传教的经过、教堂历任牧师姓名以及信教人数等，特别强调了真神堂做为东亚第一堂的史实。（见图 4-1 真神堂正面旧照、图 4-2 真神堂碑刻）



图 4-1 真神堂正面旧照



图 4-2 真神堂碑刻

美以美会来福州传教十年，信奉者仅有长乐籍商人陈安一人，他是在真神堂建立后的第二年入教的。陈安原住在福州城内总督府附近，为由长乐来榕经商的人。他在真神堂慕道受洗，是该堂也是该会的第一个中国信徒。之后，该堂教务逐渐发展起来。据统计，从 1856 年到 1910 年，该堂历任牧师 15 人，信奉入教者计有 170 多人。^[1]解放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是余祖智任该堂牧师，石朝珠任女传道。这期间，该堂曾筹集款项，一度进行修葺，并建有牧师屋。另外，在真神堂的前面，还办有阅报室，供过往行人阅读。后来由于教徒人数日渐减少，几乎没有什么人到这座教堂参加礼拜，该堂决定暂停宗教活动。“文化大革命”后，因扩建八一七中路，该堂前面部分（即阅览室）被拆建。至于该堂正座，目前是由茶亭保健院租用，后面牧师屋则由街道工厂租用。（见图 4-3 真神堂旧址现貌）

^[1] 严子祺：《福州基督教一些堂所的情况》，出自《文史资料选编》（第五卷一基督教天主教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 月；第 12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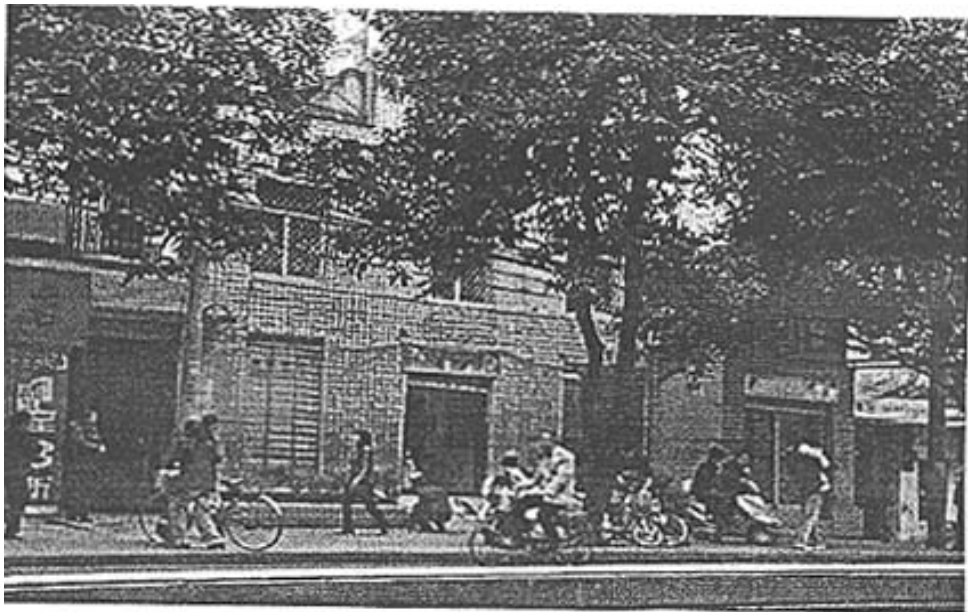


图 4-3 真神堂旧址现貌

天安堂：该堂位于南台岛上，仓山之麓，闽江之滨（今福州仓山区天安里 15 号）。教堂是由美以美会传教士麦利和筹建的，共用款 1500 银元，1856 年 10 月 18 日建成，建筑为砖木结构，可容千余人。^[1]堂名之所以叫“天安堂”，一是沿用该处地名“天安寺”和“天安里”之旧，二是引义自基督教话语“由天而来的平安，才是真的平安”。^[2]同年，美国美以美会成立福州教区，并以该堂为活动中心。光绪三年（1877 年），美以美会的正式年会成立，天安堂的历任牧师、教徒人数以及捐献数字等自此开始登入年会录，并成为福州年议会所在地。

建堂之初，天安堂牧师、传道人员均由外国传教士担任。该会外国传教士来闽之后，先在福州学习福州话（所谓“榕腔”）一年，然后分赴外府县里任职，暑假及年会或特别会议期间均集中在福州，而天安堂就是各布道人员公共崇拜的场所。教徒方面，从 1857 年 10 月 18 日女信徒许松甸受洗入教，1857—1863 年间收有教徒达 100 人，1863—1866 年吸收教徒约有 200 人，1867 年所吸收教徒为 139 人。^[3]此后，每年均有新教徒受洗入教，解放初期信徒有所减少，文革之后又日渐增多。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旧的天安堂改建为新的教堂，重新奠基。1936 年秋季，

^[1]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with Characteristic Sketches and Incidents of Missionary Operations and Prospects in China*, 1861, P206.

^[2] 严子祺：《福州基督教一些堂所的情况》，出自《文史资料选编》（第五卷—基督教天主教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1 月，第 121 页。

^[3] 严子祺：《福州基督教一些堂所的情况》，出自《文史资料选编》（第五卷—基督教天主教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1 月，第 124 页。许松甸是美以美会在福州的第一个女信徒。

该堂举行了庆祝建堂 80 周年的纪念大会。1947 年 11 月，庆祝中国基督教卫理公会的百周年纪念大会也在该堂举行。解放后，该堂照常开放，并进行了社团登记，领有社团登记证。文革期间，教会活动停止，教堂被占用，直至 1980 年重新开放并恢复活动。1998—1999 年，天安堂拆建，按原式改成新堂。新堂总建筑面积 2300 平方米，造价 300 万元。天安堂旁有印书楼和播捷会馆两教会建筑，印书楼印有报刊，是福州教会有报刊之始，曾改名“力公纪念楼”，解放初期又改称为革新楼，现为部分教会工作人员的住宅以及居民住家；播捷会馆其称取纪念许播美、许捷美之意，原作为外地教徒来榕暂住的招待所，现为居民住家。（见图 4-4 天安堂旧图、图 4-5 今日之天安堂、图 4-6 天安堂前的旧楼即是印书楼）



图 4-4 天安堂旧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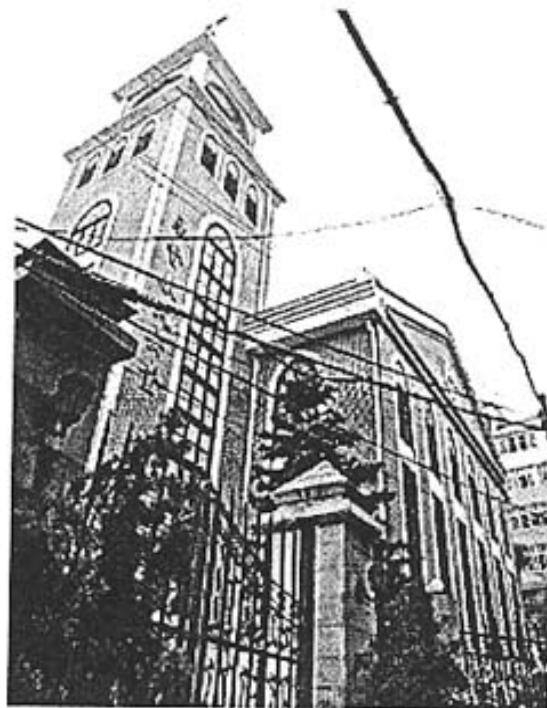


图 4-5 今日之天安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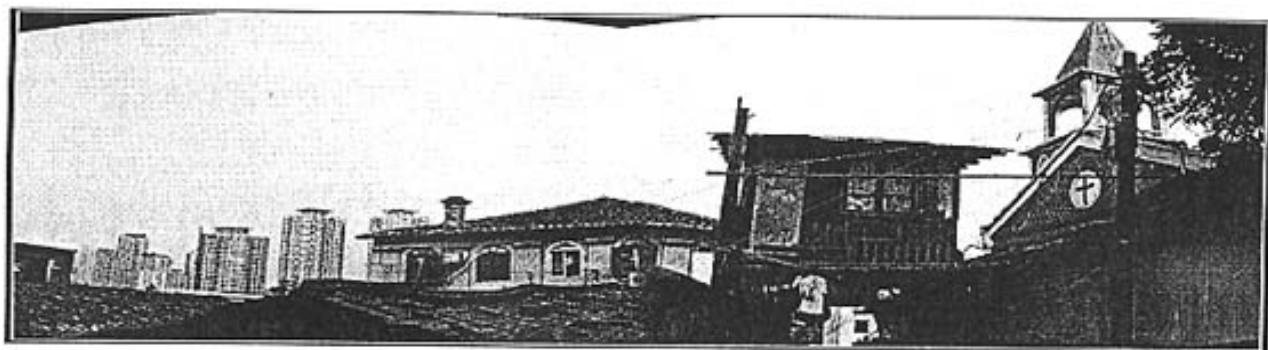


图 4-6 天安堂前的旧楼即是印书楼

花巷堂：即“尚友堂”，该堂坐落于城内东街口附近的八一七北路花巷3号（现改为花巷7号）。该堂建于民国四年（1915年），时美以美会在福州城内尚无教堂，教会通过座谈决定在城区设立教堂和举办学校，以进一步争取社会名流和上层人士参加教会，扩大教会在社会上的影响。教堂旧处为曾任琉球王“兆新”的贵族王府，该处房屋实有左、中、右各三进，共九落，教堂是在中间三落靠南街这一边的房屋。建堂之后，该堂命名为“尚友堂”，英文名称是 Institutional Church，意为“社交会堂”。有时使用“Central Church”的名称，意为“中心会堂”，即是对外社会活动的中心之意。可以说，当时该堂的主要建筑目的就是为了适应社交的需要。文革之后，为了教会内部的团结，不再使用过去的会派名称，教堂改称为“花巷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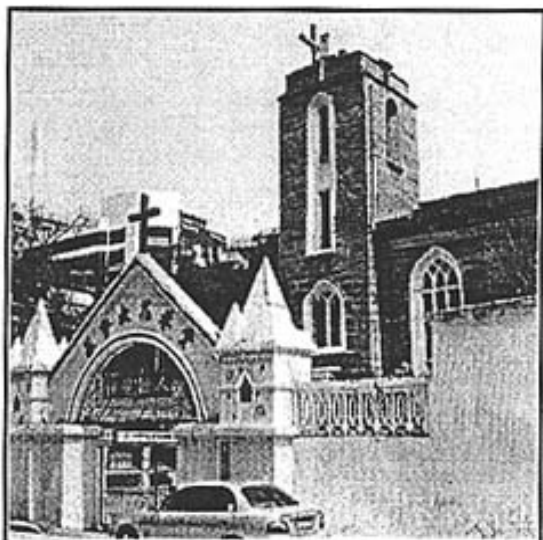


图 4-7 花巷堂旧貌



图 4-8 花巷堂新貌

花巷堂自创建起,其牧师和传道工作主要由华人牧师担任。创建之后,同年9月5日便举行了第一次新教徒受洗入教仪式,受洗者有王彦君、郭次曼等人。^[11]由于该堂场所宽敞,地点又在城区的中心点,因而许多有关的教会会议常在该堂举行。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由许荣藩牧师策划,该堂改建成可容纳千名以上教徒聚会的石墙结构礼拜堂,连其附属堂所,可容纳2000人。文革期间该堂被占用,1979年10月恢复宗教活动,是全省恢复活动的最早教堂之一。^[12]该堂兼有办学,设立男女两部,连同当时所设的基督教青年团契、妇女会、幼徒会、歌唱团,地点都在教堂隔壁。后各项事业陆续停办,其办学用的原花巷2号房屋,现仍由花巷幼儿园继续租用。(见图4-7花巷堂旧貌、图4-8花巷堂新貌)

城门堂:该堂又名“城鳌福音堂”,位于城门镇城门村。始建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当年3月28日教徒第一次聚会时,只有2人,后来人数逐渐增多。教堂初期属于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管辖,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改属中华基督教会。1951年,曾租用村民住房作为宗教活动场所。1962年,在城门村购得一所民房作为聚会场所。“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聚会场所被生产队改作仓库,宗教活动被迫停止。1980年恢复活动,1983年在原堂附近新建一所教堂,占地面积130平方米。1984年7月列为开放教堂(1982年8月先以宗教活动点批准开放),现有教徒千余人,基本上来自全镇的各个村落。

4.1.3 圣公会教堂历史考察

1850年札成和温敦两圣公会传教士来榕,携有香港主教致英国领事的信件,表达他们要在城内居住的愿望。之后,他们在乌石山神光寺租到住所,并征得知县兴廉的同意和签章。但紧接而起的“神光寺教案”和“乌石山教案”,使得圣公会传教士们先是退租到道山观,并最后从城内撤出,转而到仓山发展。圣公会在福州发展期间,共建筑了9所教堂,早期在城内发展时建筑了萃贤堂、宣道堂和道源堂,这些教堂在当时的排教浪潮中相继被毁。^[13]之后发展重心侧重在仓山,目前仅剩3座教堂开放使用。^[14]

^[11] 严子祺:《福州基督教一些堂所的情况》,出自《文史资料选编》(第五卷—基督教天主教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29页。

^[12] 《鼓楼区志》(福州市鼓楼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方志出版社,2001.1)认为花巷堂首次恢复礼拜活动的时间是1980年9月15日。

^[13] 叶见元:《中华圣公会福建会史》(三)、《福声》,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一日,第十五期:“1864年,城内教堂共三所,东街关以美会之福音堂及本会南后街(萃贤堂)与安泰桥下(宣道堂)之两堂。因当年排教之风甚盛,福音堂被毁。本会两堂亦相继被毁。”

^[14] 见表“圣公会福州教堂一览表”。

圣公会福州教堂一览表¹¹

教堂名称	兴建时间	所在地址	附注
石厝堂	咸丰十年（1860年）	仓山乐群路9号	停止活动，印刷厂占用
萃贤堂	同治四年（1865年）	鼓楼黄巷	
基督堂	同治九年（1870年）	台江苍霞洲倚霞桥1号	1895年改名仓霞堂重新开放
真学堂	光绪九年（1883年）	仓山区施埔路34号	1990年改名施埔堂重新开放
圣保罗堂	光绪十六年（1890年）	仓山岭后路	1943年停止活动
明道堂	宣统二年（1910年）	仓山塔亭路20号	1928年重修，现已重新开放
圣三一堂	民国六年（1917年）	仓山公园西路8号	1949年8月停止活动
道源堂	同治三年（1864年）	鼓楼华林坊	
宣道堂		安泰桥下	早期被毁

石厝堂：即“圣约翰堂”，位于福州仓山当年侨民聚居的中心乐群路（今仓山区乐群路9号）。咸丰六年（1856年）筹建，咸丰十年（1860年）落成，是圣公会为当时在福州定居的英国侨民修建的一座美丽典雅的哥特式石头教堂。该教堂请香港土木工程师设计建造，占地600多平方米，是福州教堂中为数不多的全石头建筑，有“国际教堂”之称，专供英国侨民中基督徒用。堂内有两个铜制纪念牌：一为纪念曾数度来闽，后死于海难的主教霍约瑟；另一为纪念“Tep-lake”号英国轮船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台湾海峡遇台风而覆没的全体船员。此外，在教堂大门正中有一纪念坊，是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福州前往参战阵亡的英国侨民。



图4-9 石厝堂屋顶被破坏的钟阁

¹¹该表以《福州市宗教志》为参考，在《福州市宗教志》中，没有录入早期被毁的宣道堂，并错误地把石厝堂和圣约翰堂区分成两个教堂。



图 4-10 石厝教堂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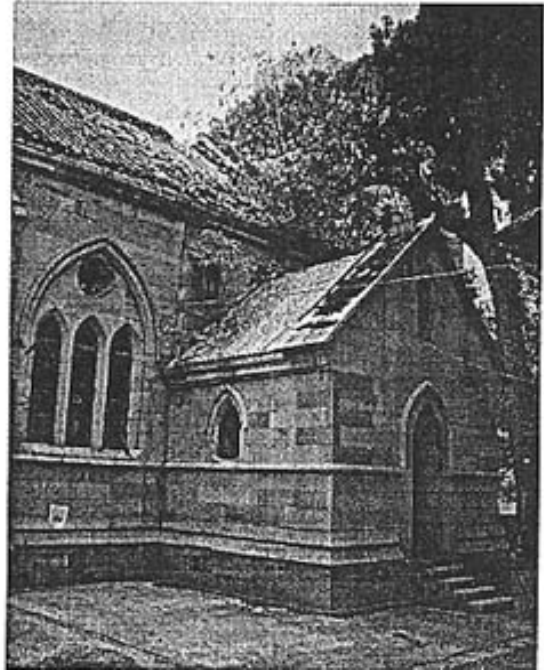


图 4-11 石厝教堂侧面

文革中，石厝教堂遭到破坏，其被破坏的屋顶钟阁至今没有修复。该堂早已停止宗教活动，目前仍然为某部队印刷厂占用。1992年，该教堂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见图 4-10 石厝教堂正面、图 4-11 石厝教堂侧面以及图 4-12 石厝教堂文物保护单位）



图 4-12 石厝教堂文物保护单位

萃贤堂：该堂位于南后街，是圣公会在福州第一座为传教而建立的教堂。同治元年（1862年），该堂先由南后街所购一所民房改建而成。之后，教堂在排教中被焚，并于同治四年（1865年）重新建成。“1862年，胡约翰在南后街黄巷口购民房一所，殆即本教区在闽最先告成之第一座礼拜堂也。当时，绅民仇教之声愈烈。1863年教会遭迫，而斯堂亦付之毒焰中，被毁矣。时胡约翰壮志不衰，复向西商征募5000元，赴香港备材雇匠，至1865年9月建筑落成。”^[1] 根据金亚德（Arthur William Cribb）对该堂的描述，“这是一座砖构的哥特式建筑，从街上进来走过一个小的门廊，便进入内部。屋顶是油漆过的木架结构，由覆盖着黏土的看起来像是花岗岩石的柱子支撑。柱头上方为直达屋顶的椭圆拱形。屋顶与主梁之间的拱形空间为木构梁架。……整个建筑耗资5000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生活在这个口岸的外商捐赠的。教堂被命名为‘CHOI HIENG TONG’，字面翻译为‘所有好人的教堂’（THE HALL OF ALL GOOD MAN），但是，我们更随意地将它翻译为‘所有圣徒的教堂’。在中国，人们认为用人名来命名一幢建筑是对这个人敬的行为。”^[2]

基督堂：即“仓霞堂”，位于台江区苍霞洲交通巷17号，是中华圣公会最大教区——福建教区的主教座堂。该堂创建于同治九年（1870年），最初在苍霞洲广裕楼租房设立布道所，信徒增加后，于光绪八年（1882年）用1800银元买下倚霞桥1号的一个旧茶仓。民国十三年（1924年）11月1日，圣公会福建教区主教恒约翰在此主持奠基仪式，开工建造主教座堂，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11月13日全部建成。教堂为砖木结构，可容纳1000人，中华圣公会重要会议常在此召开。1950年中国基督教界发起“三自”爱国运动签名即由苍霞堂开始，签名者有1万多信徒。1958年，教堂部分场所被台江制药厂占用。1966年8月17日，文革开始后，座堂被关闭，全部被药厂占用。1985年8月11日该堂改名“仓霞堂”重新开放，1994年有信徒1500人，目前仍是福州市重要的一座基督教堂。

真学堂：即“施埔堂”，位于仓山区施埔路34号（今仓山福建师范大学旁的学生街）。该堂建于光绪九年（1883年），曾经是19世纪圣公会在福建的总部。该堂建筑占地面积14亩，由六座大楼及附属楼组成，设计建筑均为英式风格，是西方回廊式建筑，周围有甲乙丙丁戊五大建筑群，基本上由西式双层及单层组成，由一道围墙将之与外隔开。光绪十五年（1889年），圣公会在此开设了真学书院（神学

^[1] 《福州南后街萃贤史略》，载于《福声》第一期，民国二十年四月一日，第一卷。

^[2] Eugene Stock: Study of the Fuh-kien Mission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1882, P40.

院)，培养圣公会牧师。1940年，真学书院与卫理公会的福音斋合并，组成福建协和神学院，新中国成立不久又并入南京金陵神学院。文革期间，教堂关闭，直至1990年改名为“施埔堂”重新开放。1994年，该堂有信徒600人。（见4-13施埔堂旧照、图4-14施埔堂近照）



4-13 施埔堂旧照



图4-14 施埔堂近照

4.1.4 其它小教派

在榕发展的其它教派主要有基督徒聚会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和真耶稣会，它们在福州的发展过程中共计创建了12处堂所。其中，聚会处和真耶稣会各5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2处。^[1] 比较出名的有中洲聚会所、鼓岭聚会所、大根堂等。

基督徒聚会处福州教堂一览表^[2]

教堂名称	兴建时间	所在地址	附注
马厂街聚会所	民国十二年（1923年）	仓山对湖路	现改名马厂街堂重新开放
鼓岭聚会所	民国三十年（1941年）	鼓岭	1981年改名鼓岭堂重新开放
津门路聚会所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	鼓楼津门路	现暂借花巷堂聚会
中洲聚会所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	仓山中洲中东巷	1996年移到中洲岛西侧重建
河西聚会处		鼓楼河西街	

^[1] 见下列三表：基督徒聚会处福州教堂一览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福州教堂一览表和真耶稣会福州教堂一览表。

^[2] 所列教堂以《福州市宗教志》（姚午生主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为参考，其中，剔除宗教志中列有的浪岐前里堂，增加了鼓岭聚会所。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福州教堂一览表

教堂名称	兴建时间	所在地址	附注
大根堂	民国四年（1915年）	鼓楼大墙根	现改名城守前堂重新开放
南公园堂	民国十一年（1922年）	南公园敦仁里9号	

真耶稣会福州教堂一览表^[1]

教堂名称	兴建时间	所在地址	附注
大根堂	民国十七年（1928年）	鼓楼大墙根	现已重新开放
秀山堂	民国十七年（1928年）	秀山	现已重新开放
仓山堂			
马尾堂			
下藤播道所		仓山下藤路	

中洲聚会所：即“中洲基督教堂”，原教堂位于中洲岛东北侧，是福州地方教会的中心聚会处。1948年，福州教会发生大复兴，信徒人数大量增加，于是倪柝声将中洲岛中东巷24号祖产奉献出来改建成福州教会第二个聚会所，面积600平方米，可容纳1000人聚会，规模大于津门路聚会所。1949—1951年间，为中洲聚会所的鼎盛时期，聚会的信徒约有1400多人。1952年倪柝声被捕后，参加聚会的信徒逐渐减少，1956年1月，在肃反运动中又有一批地方教会领袖被捕，聚会处信徒减至100多人。1966年文革中被关闭，会所被船民占用。1980年恢复聚会，但此时聚会所内仍住着三十二户居民，信徒还无法使用。到1990年才搬走聚会所内的居民，收回中洲聚会处。1993年，中洲岛改建为公园，八百多户居民迁出，只保留中洲聚会处，并配合公园修建得更美观。1994年有信徒2000人。2000年—2002年，港商张礼星开发中洲岛，该教堂由东侧移位到西侧重建成为一座雄伟的黄色欧式教堂，号称福州市最美的礼拜堂，矗立在闽江环抱之中。（见图4-15 新建中州堂正面、图4-16 新建中州堂远景）

^[1]所列教堂以《福州市宗教志》（姚午生主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为参考，其中，增加了宗教志中没有的秀山堂、仓山堂、马尾堂以及下藤播道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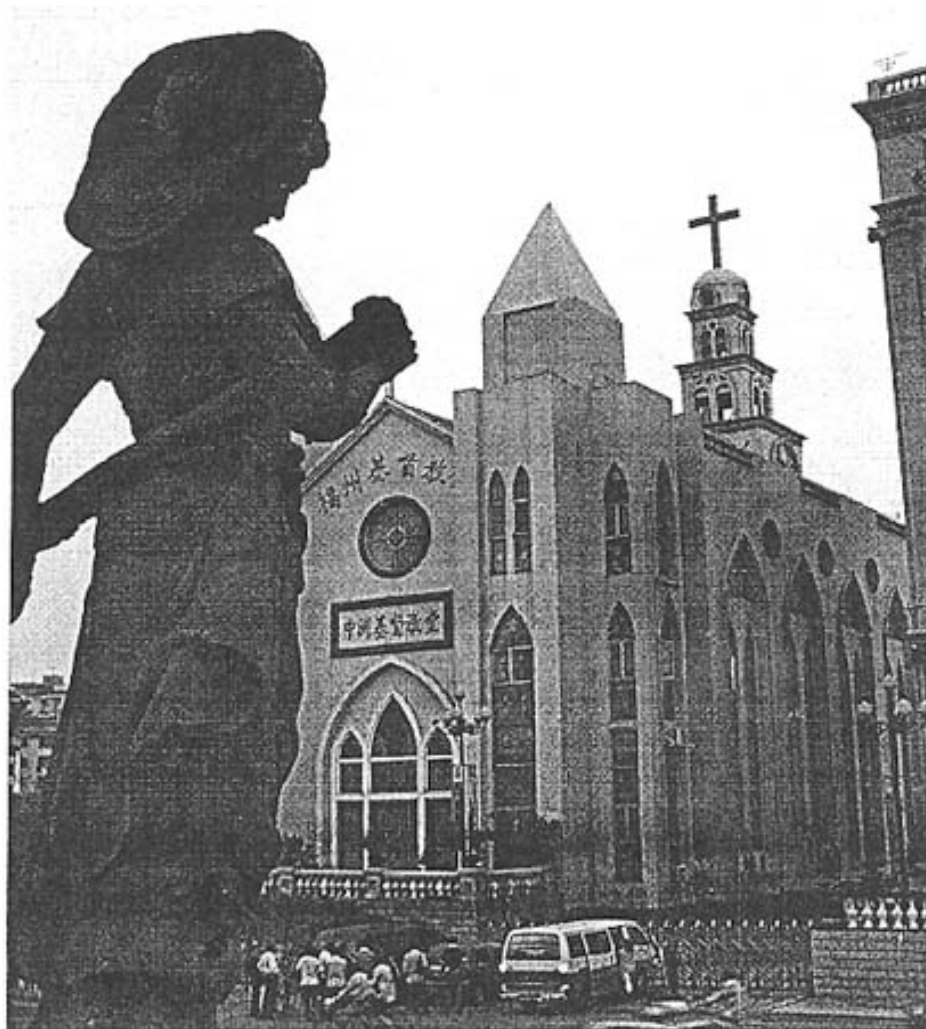


图 4-15 新建中州堂正面



图 4-16 新建中州堂远景

4.2 福州基督新教教堂分布态势及其促成因素分析

与前文福州天主教教堂分析相同，笔者仍将教堂创建就时间分布态势和教堂地理分布态势来分析福州基督新教教堂的分布态势及其促成因素。

4.2.1 福州基督新教教堂建筑时间分布态势及其促成因素

前文所述，福州基督新教包括美部会、美以美会和圣公会三大公会，还包括基督徒聚会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和真耶稣会三个小教派。以1947年杨顺抵达福州为起点，以19世纪60年代各三大差会开始向外扩张、1927年福州“非基”浪潮和1949年解放后为分水岭，笔者将基督新教在福州的发展划分成四个阶段。各教派所属教堂创建时间在各个时期的分布统计如下表：

福州基督新教教堂各时期创建数目统计表

时期	教派	数目	备注
1847年1月-19世纪60年代	美部会	1	救主堂（1858年）
	美以美会	3	真神堂（1856年）、天安堂（1856年）、尚友堂（1857年）
	圣公会	4	石厝堂（1860年）、道源堂（1864年）、萃贤堂（1865年）、宣道堂（不详，此时期内）
	三小教派	0	
19世纪60年代-1927年福州“非基”浪潮	美部会	13	水部堂（1869年）、窗下堂（1870年）、刘公纪念堂（1881年）、霞浦堂（1883年）、西门堂、福世堂（1894年）、开元堂（1895年）、洪山堂（1899年）、三保堂、尚德堂（1898年）、后屿堂（1903年）。
	美以美会	3	义序堂（1895年）、正道堂（1918年）、福民堂（1921年）
	圣公会	5	苍霞基督堂（1870年）、施埔真学堂（1883年）、圣保罗堂（1890年）、明道堂（1910年）、圣三一堂（1917年）
	三小教派	3	安息日会大根堂（1915年）、南公园堂（1922年）、基督徒聚会处马厂街聚会所（1923年）
1927年福州“非	美部会	0	

“非基”浪潮—1949 年解放	美以美会	1	城门堂（1943年）
	圣公会	0	
	三小教派	5	真耶稣会大根堂（1928年）、秀山堂（1928年），基督徒聚会处鼓岭聚会所（1941年）、津门路聚会所（1946年）、中洲聚会所（1948年）
1949年解放至 今	美部会	0	
	美以美会	0	
	圣公会	0	
	三小教派	0	

统计表说明：美部会有晨世堂、后洲堂创建时间不详，美以美会有三保尚仁堂、小岭堂、浦下堂和东街堂创建时间不详，圣公会有安泰桥下之宜道堂创建时间不详，基督徒聚会处有河西聚会处创建时间不详，真耶稣会有仓山堂、马尾堂、下藤薄岛堂创建时间不详。如上创建时间不详之堂所留待考证，暂不列入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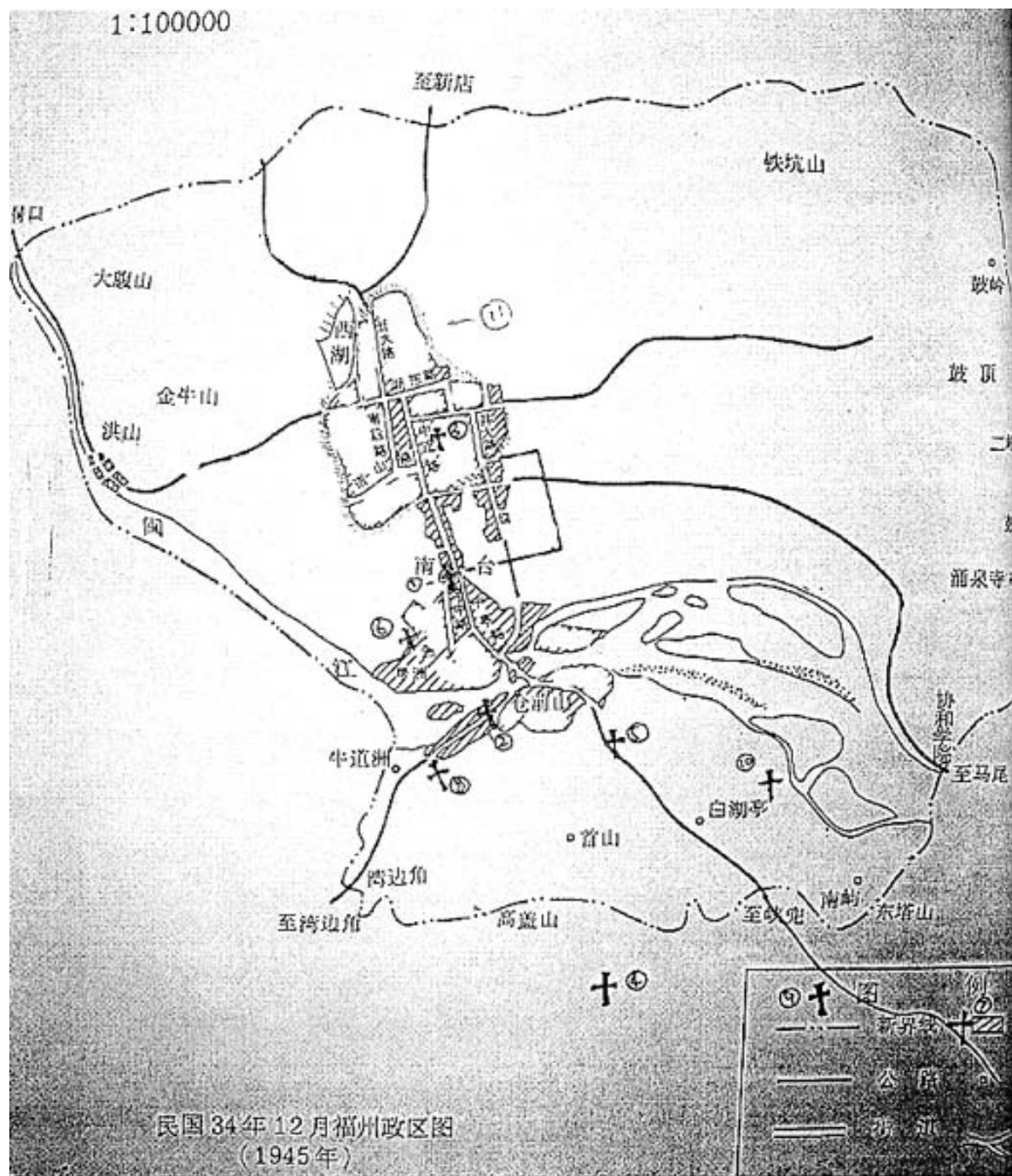
从上面统计表可以发现，从1847年1月至19世纪60年代期间，基督新教各差会在福州艰难创业，共创建了8座教堂；从19世纪60年代至1927年福州“非基”浪潮前，基督新教各差会在福州站稳脚跟，开始新一轮的扩张，此时期各差会共计创建了24座教堂；从1927年的福州“非基”浪潮到解放前，是各差会的守业时期，各差会共计创建了6座教堂，其中5座是新兴起来的华人为主导的小教派创建的；解放后，受文革等错误思潮的冲击，教会经历重大波折，即使是文革结束宗教政策重新落实后，各教派也只是限于重建或者修缮旧教堂。

推动这种分布态势形成的因素，笔者认为主要还是官方对基督教的态度及其政策的变化。因为在第三章福州天主教教堂的分析中已经有所阐述，此不赘述。

4.2.2 福州基督新教教堂地理分布态势及其推动因素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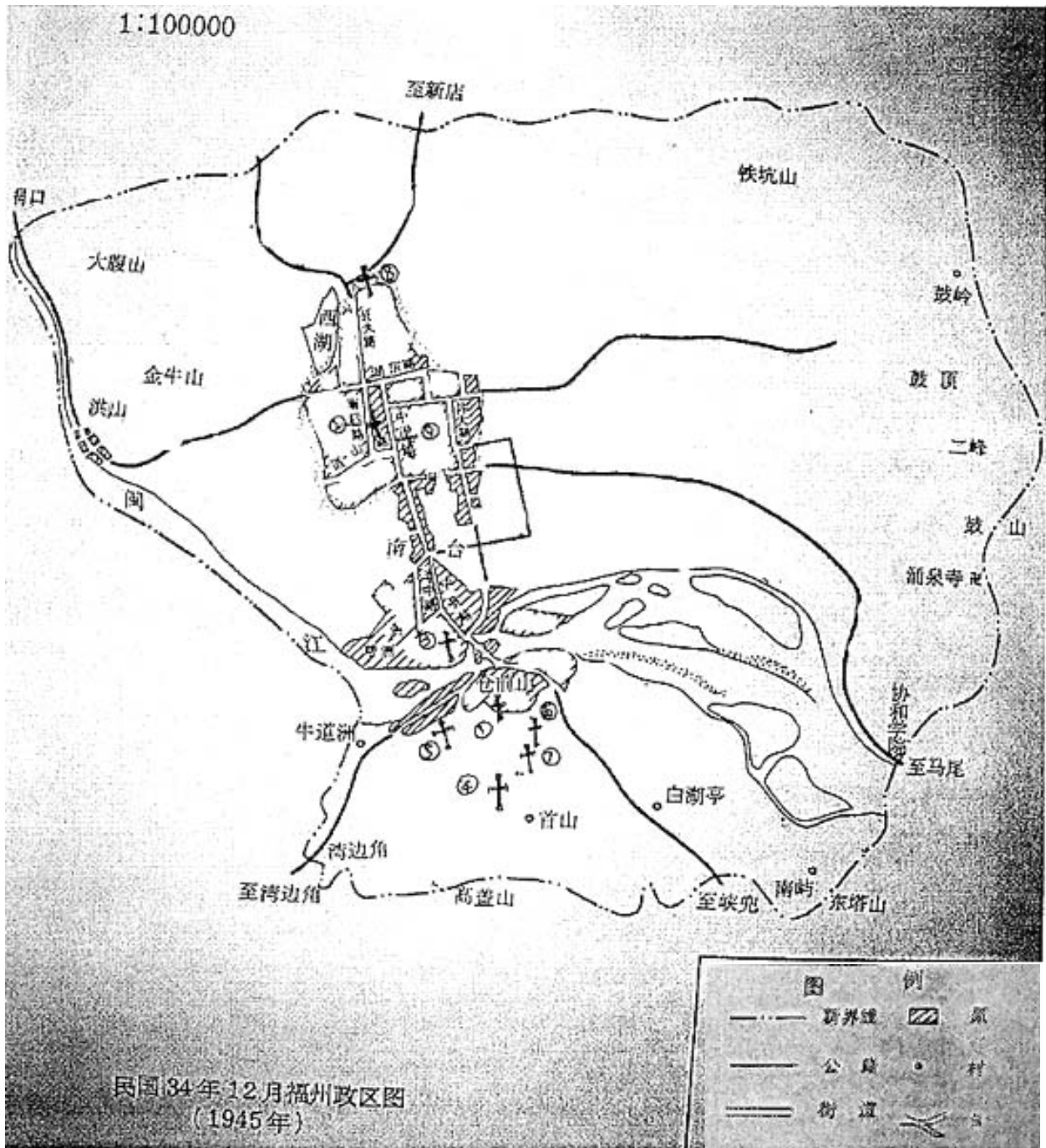
各教派教堂地理位置列图如下：

图 4-18 美以美会福州教堂地理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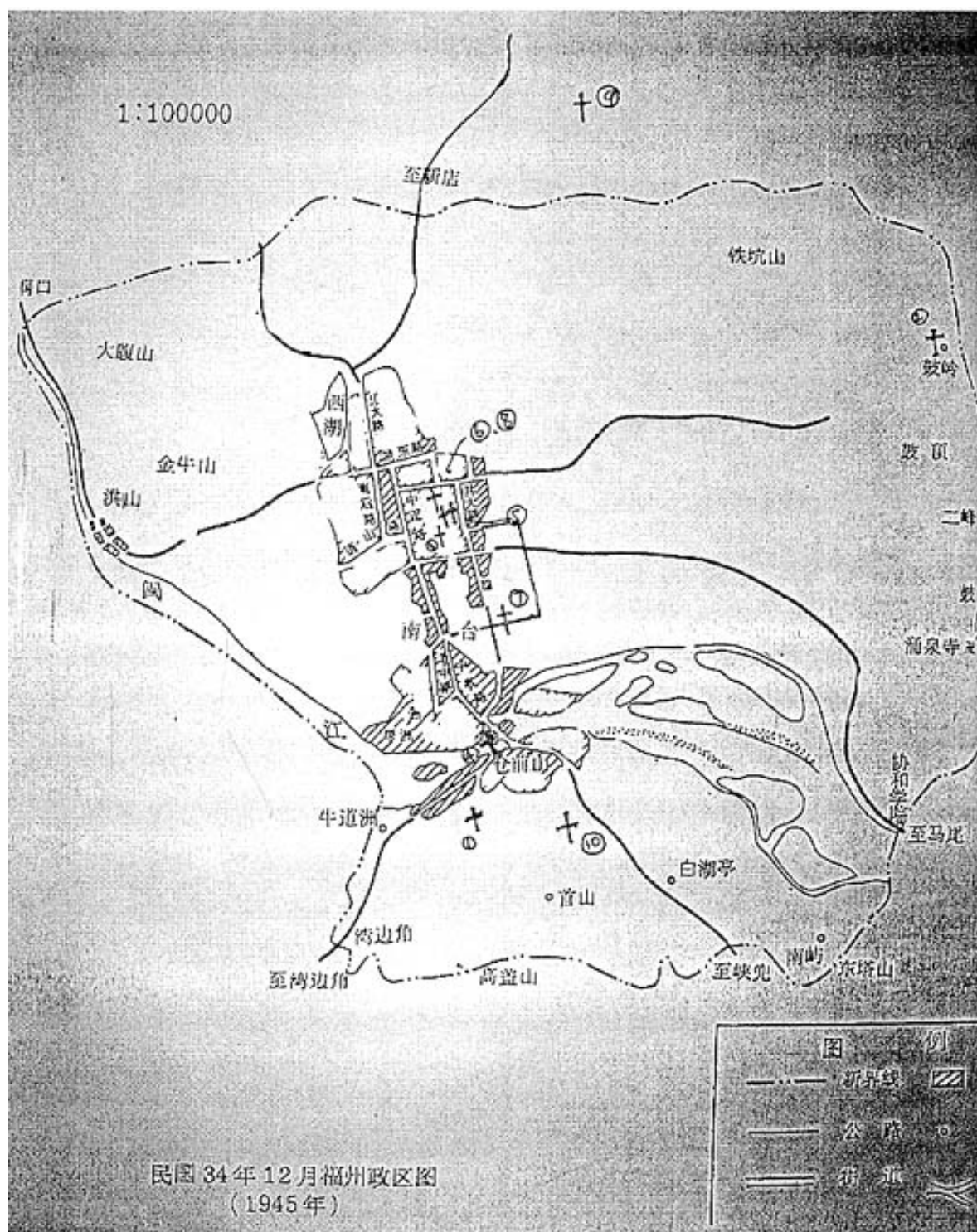
图片说明：十字架标示的即是美以美会各堂点位置，其中，1.真神堂；2.天安堂；3.尚友堂；4.义序堂；5.小岭堂；6.尚仁堂；7.正道堂；8.福民堂；9.城门堂；10.浦下堂；11标示的是清朝福州城区范围。另有早已停办的东街堂地点不详，留待考证，暂不列入分析。

图 4-19 圣公会福州教堂地理位置示意图：



图片说明：十字架标示的即是圣公会各堂点位置，其中：1. 石厝堂；2. 萃贤堂；3. 苍霞基督堂；4. 施埔真学堂；5. 圣保罗堂；6. 明道堂；7. 圣三一教堂；8. 道源堂；9. 宣道堂。

图 4-20 基督徒聚会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真耶稣会在福州教堂在福州教堂位置示意图



图片说明：十字架标示即三小教派教堂位置，其中：1. 马厂街聚会所；2. 鼓岭聚会所；3.

津门聚会所；4. 中洲聚会所；5. 河西聚会所；（此5堂俱为基督徒聚会处教堂）6. 大根堂（后改城前守堂）；7. 南公园堂；（此2处皆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堂）8. 大根堂；9. 秀山堂；10. 下藤路堂。（此3处皆为真耶稣会教堂，另有仓山堂和马尾堂地点不详，暂不列入分析）

从上面的各教派教堂地理位置示意图可以发现，福州基督新教教堂地理位置分布与天主教有所不同，而且，新教各教派间也有所区别。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种分布态势：

4.2.2.1 从城外到城内，再到郊区的发展态势

从上面诸教堂地理位置示意图，结合各堂点创造的时间，可以发现，基督新教（主要是美部会、美以美会和圣公会三大差会）堂点位置的选择，传教区域的发展，经历了初期被限制在城外南台和仓山地区，到努力发展进驻城内，再到19世纪60年代后各教派站稳脚跟开始向郊区扩张发展的过程。笔者认为，推动这种发展态势形成的，主要有如下几个因素：

4.2.2.1.1 福州官绅乡民的抵制

新的传教士追随着西方列强的炮火而来，加上异族文化的差异，很自然地引起了福州当地士绅乡民的抵制。在教堂创建方面，这主要体现在当教会和传教士试图租地或者购地建筑教堂时，由于文化的排斥，对外来力量介入其势力范围的担心，加上风水问题上的冲突和经济问题上的纠纷，福州当地乡民以士绅为首，对传教士的租地、购地和建筑教堂进行了强烈的抵制。而这种抵制，主要体现在一系列关于地产、地权、房屋买卖租售以及教堂建筑的教案上。

福州关于地产、地权、房屋买卖租售以及教堂建筑之教案一览表^{〔1〕}

时间	地点	教会	概况	备注
道光三十年 (1850年)	福州神光寺	圣公会	该会传教士向城内乌石山神光寺僧人租屋二间以供居住、传教之用，福州绅民以神光寺是生童会课之所为由，阻挠教士租住该地。双方各布公告，针锋相对，并在统治阶级内部引发争论。福州官员最终站在阻挠的立场，传教士所租房屋无人收租，且不得修葺。经过协商，传教士迁居别处。	神光寺教案是近代史上因租房引发的最早教案，最终传教士移居道山观，位置也在乌石山上，无疑等于承认传教士可居城内。士绅对此结果并不满意，由此有了之后的乌石山教案。

〔1〕该表资料主要参考了《清末教案》第一、二册和《教务教案档》第一、二辑。

同治二年(1863年)	福州东街	美以美会	民众围观东街堂礼拜,看到堂内居住的传教士许扬美眷属,疑是教会诱拐妇女,愤恨之下将教堂拆毁。事后又往乌石山传教士居住之处以及南后街安泰桥等英美教堂处进行破坏。	福州当局革去闽侯两县知县,惩罚肇事者,并予以教会赔偿 5800 洋银,东街堂由此停办。
同治四年(1865年)	福州南街	美部会	传教士于南街郎观巷口铺置屋一所,官绅以该屋“为通衢重地,一经租给起盖,非特大伤省垣风水,抑且有碍民居” ^[1] 为由,要求传教士另觅他处。经过协商,官方负责帮传教士另觅房屋,并予以补贴 5000 洋银。	另外租住的房屋距争议之地不远,但只准居住,不能建堂。
同治五年(1866年)	福州北门	圣公会	传教士在北门召公铺租下教民房屋,原屋主以“谢守廉申卖民业,脱卖洋人” ^[2] 为由阻挠。最后判定“该屋地基尚属宽大,租给洋人起盖,并无伤害乡闾,均各允愿。” ^[3]	士绅退让,传教士租下该屋。
同治七年(1868年)	福州川石岛	圣公会	教民将川石岛所购之地永租给教会,绅民以“其地高踞,遥瞰海口,北岸炮台即在其下,实占要害”及“华洋杂居,必启争端” ^[4] 为由阻挠传教士拥有土地永租权。最后官府将案发之地收为官业并出资建屋,限期租与教士。	传教士最终只获得土地租用权。
光绪四年(1878年)	福州乌石山	圣公会	绅民以“改筑围墙,愈侵愈大,山顶	案后中方胜利收回道山观

^[1] 福建交涉美国已未结档.同治八年五月初一:总署收福建巡抚抚文。转引自林文慧.《清季福建教案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4月版:第8页。

^[2] 《教务教案档》.第二辑(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第1269页。

^[3] 《教务教案档》.第二辑(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第1269页。

^[4] 李莉.《近代福建外国教会契约文书之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未刊发硕士论文,2003年5月。

年)		最高之处，亦环在内，省垣风水，大有关系” ^[1] 为由，群起反对传教士大肆侵土建堂。教会新该洋楼遭到绅民焚烧，事件以官员革职、滋事者治罪、赔偿教会损失为结局。	租赁教会的土地，教会迁往南台岛下渡电线局之地。之后，乌石山一带永禁私卖私租。
----	--	--	--

图表显示，近代传入福州的三大差会都或者在地产地权，或者在房屋租赁买卖，或者在教堂建筑上与当地士绅发生冲突，导致教案发生。在这些教案中，争议之地主要是在福州城内（川石岛教案除外），而最终除了圣公会在福州城北门胜利租下房屋外，其它的都以传教士迁居或者对权力的退让为结局。士绅乡民在抵制传教士租屋、购地、建房上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差会的传教策略。三大差会在传入福州之始便都试图进驻城内，但由于它们在初始阶段力量非常薄弱，教徒稀少，也没有条约规定上的帮助，面对福州士绅乡民的阻挠，使得它们只能采取以城外仓山和南台为基地，再图城内的发展策略。

4.2.2.1.2 官方对教会添置房地产的政策规定及其变化

清政府禁教的解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样是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在不平等条约上制定和补充的发展过程。随着不平等条约的不断制定和补充，有利于基督教传教的规定越来越多，有力推动了基督教会的发展以及教堂的创建。总体而言，清政府对教会添置房地产的基本政策分为弛禁时期（1844—1859年）和宽容传教时期（1860—1911年前后）。

弛禁时期，清政府对教会添置房地产的政策规定主要表现在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的相关条例上。其内容有：

“一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殓葬之处，必须由中国地方官会同领事等官体察民情择定地基。听合众国人与内民公平议定租息，内民不得抬价措勒远人，勿许强利硬占，务要各出情愿，以昭公允。倘坟墓或被中国民人毁掘，中国地方官严拿照例治罪。”^[2]

[2]

“凡佛兰西人按照第二款至五口地方居住，无论人数多寡听其租赁房屋及行棧貯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

^[1] 《教务教案档》第三辑（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第1668页。

^[2] 《中美五口贸易章程》（《望厦条约》），第十七款，引自田涛主编《清朝条约全集》（影印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95页。

房、坟地各项，地方官会同领事官酌议定佛兰西人宜居住宜建造之地。凡地租房租多寡之处彼此在事人务须按照地方价值定议。中国官阻止内地民人高抬租值，佛兰西领事官亦谨防本国人强压迫受租值，在五口地方凡佛兰西人房屋间地段宽广不必议立限制，俾佛兰西人相宜获益，倘由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11]

该时期清政府与其它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相关规定与此大致相同。这些条例规定了外国教会可以在通商五口租赁土地以建筑教堂，或租赁房屋以为教堂，中国地方政府应保护外国教会在中国的教堂。不过，在这些条例中，都是关于教会在通商五口租地租房的，并未有涉及教会购买土地或者接受捐献房地产的事宜。所以，按照陈规，教会在福州等通商五口购买土地或者接受捐献房地产仍属禁止之列。

宽容传教时期，主要变化在于清政府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与列强签订的中外《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相应变化的内容主要有：

“如无碍民居，不关方向，照例税契用印外，地方官不得阻止。”^[12]

“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13]

第一条主要继承了前一时期的政策，并适当放宽了外国教会在各地租房租地的限制。第二条则一下子突破了外国教会不能在各地购买地产的限制，为教会的教堂建筑提供了极大便利。而后，在教会接受捐产方面，清政府也慢慢放宽，特别是在1881年山东教徒吴夏氏向教会捐献房产和1909年河南教徒张颖贤向教会捐献房产两起案件后^[14]，由于没有该方面的明文规定，清政府有时便默认了此类事情的发生。

在晚清政府覆亡后，民国政府疲于应付内忧外患，对教会事务基本继承晚清政策。在1928年7月12日，民国政府拟定了一份新政策《内地外国教会租用土地房屋暂行章程》，其中第一条“凡外国教会在内地设立教会医院或学校，而为该国与中国条约所许可者得以教会名义租用土地，建造或租买房屋”^[15]，明确了在中国添置房地产的教会是他们的国家已与中国签订许可条约的教会。这条规定等于说明了民国

^[11] 《中法五口通商章程》（《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款.引自田涛主编《清朝条约全集》（影印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04页。

^[12] 《中美天津条约》.第十二条.引自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9月第一版：第91页。

^[13] 《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条.引自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9月第一版：第107-147页。

^[14] 《教务教案档》.第七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第602页。转引自杨大春.《晚清政府基督教政策初探》.金城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144页。

^[15] 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内政年鉴》（D）：第1035页。转引自杨大春.《晚清政府基督教政策初探》.金城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145页。

前期外国教会在中国活动的根本政策依然是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

4.2.2.2 各教派划分传教范围各自发展

从上面各教派教堂位置示意图可以发现，美部会的传教范围主要在南台和福州旧城区一带；美以美会和圣公会的传教重心是在仓山区，由此兼向南台和城内发展。三小教派由于自身特点以及时代背景的差异，没有明显的这种发展分布态势。笔者认为，推动这种发展态势形成的，主要是各差会间传教策略的不同以及各差会共同协商的结果。

美部会初入福州之时，在尝试入城碰壁后，初期的活动被限制在中洲一带。经过努力，他们终于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于南台浦如山（Punasang，即保福山）买到了一块私人墓地，并于此兴建了两座洋楼。之后，他们将中洲南岸的二层房屋卖给外国茶商，下渡的小岭堂让给美以美会，把传道中心迁到了南台保福山。最后，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购买下于山下太平街兴贤铺、金粟山等六处地产后，美部会终于在福州城内落下了脚跟。

美以美会传教士入榕之初也试图到城内和南台建立传教场所，同样由于官绅民众的反对未能成行，只好在闽江南岸的仓山发展，并将其做为宣教活动中心。同治五年（1866年）美以美会在天安堂召开第一届布道年会，将福州宣教区划分为真神堂、天安堂、福音堂、小岭堂四个教区，并以仓山境内的天安堂和小岭堂为原动力，派传教士往福清、兴化、古田、延平（南平）、江西九江以及北京等地传教，建立新教区。光绪三年（1877年），美以美会在天安堂成立福州年议会，辖福州、福清、古田、屏湖、龙田、渔溪、平潭等教区。

圣公会入榕之初一直以福州城内为发展重心，他们在福州城内乌石山神光寺租到住所，在各差会中率先成功进驻城内，令其它差会教士羡慕不已。不过，圣公会也因此成为民教冲突的主要目标。在经历“神光寺教案”、“乌石山教案”等一系列民教冲突后，圣公会将传教中心从福州城内移至仓山施埔等地。光绪九年（1883年）至民国四年（1915年），福州圣公会召开六届福州最高议会，后四届分别在仓山的施埔、真学书院、跑马场、三一学校召开。许多著名的华牧，如许光旭、杨昌栋等都住在仓山。

第5章 教会的扩张与地方传教据点的扩散——以闽清美以美会为个案

对于征服欲望极强的基督教会来说,在某一据点教务的稳定与发展,意味着教会新一轮扩展的开始。鸦片战争(1840年)之后,西方传教士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传教权,天主教会在福州复苏,新教各差会也纷纷在福州立足。经过20年左右的苦心经营,各差会终于在福州创下了一定的基业。从教堂、信徒、华牧到学校、医院、慈善机构等,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传教资源关系网。从清光绪开始,基督教逐步从福州城区向境内扩展,吸收教徒,创设教堂。本章将以美以美会在福州闽清县的发展以及教堂据点的建设,阐述教会及教堂建设在地方乡村地区的发展情况,并尝试讨论同城市地区教会发展及教堂建设的异同。

5.1 美以美会在闽清县的发展概况

闽清东邻闽侯,西毗尤溪、南平市,南接永泰,北连古田。立县千余年来,辖地范围基本不变。境内四周群山连绵,峰峦叠嶂,交通亦不便利。其地位于闽江流域内,境内河流为闽江水系的山区性河流,流域面积在30平方公里以上的共有17条,总长358.55公里,主要河流有闽江、梅溪、芝溪、金沙溪、安仁溪、古田溪、麻坑溪、马兰坑、大雄溪和石潭溪。其中,过境闽江为29.5公里,从雄江乡的大雄村入境,流经雄江、东桥、梅溪、梅城等3乡1镇19村31个自然村;梅溪主流全长78.6公里,发源于省璜乡谷洋溪里莲花山麓,向北流经省璜、塔庄、坂东、白中、白樟、梅溪、梅城等7个乡镇的56个村,沿途纳岭寨溪、濂溪、文定溪、芝溪、金沙溪、下炉溪、昙溪诸支流之水,绕县城出溪口汇入闽江。^[1]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河运是闽清交通的一个重要手段。

19世纪40年代进入福州发展的三大差会在发展过程中各自划下了自己的布道范围,闽清被划到美以美会的布道范围内。美以美会经过近20年的苦心经营,在福州建立了真神堂、天安堂、尚友堂和小岭堂,教务渐趋于稳定发展。1864年,该会集天安堂为议会,分福建教会为四区:一、东区为天安堂,长乐县,延平府;二、

^[1] 闽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闽清县志》.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12月:第27—38页。

西区为牛坑、贵峰、桐口、桃前、闽清、古田；三、南区为小岭堂、福清、兴化；四、北区为茶亭、东街、罗源、连江、闽安镇。^[1]自此，美以美会开始在闽清的传教扩张。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美国传教士薛承恩（Nathan Sites）抵达福州，并学习福州方言。同治三年（1864年），薛承恩来梅布道，“悉六都地广人稠，遂乘鼠



船至鹿角村。时值炎夏，牧师身穿白衣，头戴白冠，装束奇异，乡人不敢接近。有个农民刘学彬延至其家，彬供奉观音，有三子：启棠、观良、观雄，观良年十八，病疯久不得愈，彬告之，牧师与谈救世之道，顿悟迷信之不可靠，即弃佛而归主。乡中绅士刘耀扬闻此消息，恐彬失礼外宾，延请薛牧转宿其家，逗留数日后，薛辞返福州。”^[2]两年

后，薛承恩复至闽清，计划设堂布道及办学等事，在湖头村黄明望家中居住并设立祈祷室和办学教室，当年就有黄福居、黄乃裳受洗入教，隔年又有黄必畅、黄必宏、黄必如、吴松学、黄天灿及黄茂坦等十几人入教，美以美会在闽清的根基就此扎下。

同治六年（1867年），华牧许扬美来闽清传教，“十二月携眷乘舟抵达六都，趁春节男女群集，牧师趁机宣道，时乃裳先生热心协助，许牧给乃裳以劝士圣职并委其为传道，足迹遍梅邑，教徒增至四、五十人。”^[3]同治七年（1868年），闽清自立县城、六都两个循环，从属福州连环，为闽清县基督教活动之开始。光绪十九年（1893年），以薛承恩牧师为首成立闽清县连环，下设八个循环，薛承恩任连环司。民国十年（1921年），闽清连环司改称“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闽清教区”，并在县境内分设南北两个教区，梅南教区长陈鸿沂，梅北教区长许伯卿，全县教徒发展到近两千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南北教区合并，刘亨汤任教区长。此时全县设有牧区32个，建有教堂24座，并创办有学校、医院等慈善事业。1938年至1948年，全县教徒发展到2900多人，教牧人员40多人。建国后，闽清县基督教实行自治、自养、

^[1] 张金红.《福州地区基督教建筑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未刊发论文,2003.5:第6页.

^[2] 闽清县基督教两会编.《闽清基督教志》.2000年11月内部刊行:第2页.

^[3] 闽清县基督教两会编.《闽清基督教志》.2000年11月内部刊行:第3页.

自传的“三自”方针，外籍教士先后离县回国，至1951年3月全县宗教团体登记时，剩有牧区20个，教牧人员27人，教徒1113人。^[1]1954年底，闽清县成立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刘亨汤被选举为主席。1957年后，由于左倾错误思潮的影响，全县教堂大多数关闭。文革期间，基督教活动被迫停止。1980年10月后，闽清县基督教三自爱国会恢复，詹焕珍任主席，闽清教会走上复苏之路。

闽清基督教教会历任负责人名单表^[2]

机构名称	职务称谓	姓名	籍贯	任职年月	备注
闽清连环	连环司	薛承恩	美国	1893-1894	
闽清连环	连环司	刘观雄	闽清	1894-1895	代理
闽清连环	连环司	蒋德良	福清	1895-1897	
闽清连环	连环司	陈文畴	古田	1898-1904	
闽清连环	连环司	华雅各	美国	1905-1906	兼任
闽清连环	连环司	丁大梁	古田	1906-1907	
闽清连环	连环司	余修意	福清	1908-1913	
闽清连环	连环司	许则翰	福州	1914-1919	
闽清连环	连环司	许伯卿	闽清	1920-1921	
梅北教区	教区长	许伯卿	闽清	1921-1925	
梅北教区	教区长	陈榕官	闽清	1926-1932	
梅南教区	教区长	陈鸿沂	福州	1921-1926	
梅南教区	教区长	谢善治	闽清	1927-1932	
闽清教区	教区主任	刘亨汤	闽清	1933-1937	
闽清教区	教区主任	刘乃培	闽清	1938-1943	
闽清教区	教区主任	林景安	古田	1944-1949	
闽清教区	教区主任	刘亨汤	闽清	1950-1953	
闽清基督教两会	主席	刘亨汤	闽清	1954-1966.4	

^[1] 闽清县统战部编，《闽清县宗教志》，1988年

^[2] 表格数据参考闽清县基督教两会编，《闽清基督教志》，2000年11月内部刊行：第92-93页

闽清基督教两会	主席	詹焕珍	闽清	1980-1982.10	
闽清基督教两会	主席	张幼娥	闽清	1982.11-1986.12	
闽清基督教两会	主席	王玉卿	闽清	1987.1-1988.10	代理
闽清基督教两会	主席	刘扬基	闽清	1988.11-1993	兼会长
闽清基督教两会	主席	刘宜平	闽清	1993.12-1999.1	兼会长
闽清基督教两会	主席	林铿典	闽清	1999.1-	兼会长

(闽清基督教两会除了卫理公会,还包括聚会处、安息日会两个教派,目前三个教派之间互相尊重,逐步走向合而为一的道路)

5.2 闽清教堂史略

薛承恩初到闽清传教时,多租用民房,流动没有定所。清光绪八年(1882年),许则翰主理六都教务,与薛承恩一起募资兴建湖头福源堂,是为闽清建造最早的基督教总教堂。之后,随着教务发展,教会在县内各地陆续增建教堂,到1926年全县建有教堂24座。解放前,闽清县基督教会建造的房屋计有19座,建筑面积达9559平方米,其中供主日崇拜的有25座。文革中,全县教堂停止活动,教堂或被占用、或被拆除改作他用又或被改卖他人。宗教政策重新落实后,教会房产退还。其中;现在仍有活动的教堂计有18座。

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闽清教堂一览表¹¹⁾

教堂名称		坐落地址	建造时间	面积(m ²)	现状	备注
原名	现名					
福源堂	湖头堂	坂东镇湖头村	1882年	457	有活动	1984年重修
	巫岭堂	金沙镇巫岭村	1894年		无活动	1986年倒塌
真仁堂	凤山堂	雄江镇凤山村	1896年	146	有活动	1994年重建
天福堂	樟洋堂	梅溪镇樟洋村	1898年	207	有活动	1995年修缮
天源堂	池浦堂	白樟镇池浦村	1904年	220	有活动	1994年重建
崇真堂	溪坪堂	上莲乡溪坪村	1912年	201	无活动	借给当地群众用

¹¹⁾ 该表主要参考《闽清基督教志》和《闽清县志》中的教堂数据,教堂按建筑年代重新编排,表中教堂不包括20世纪90年代后新建的7处堂点。

积善堂	乾面堂	金沙乡乾面村	1913年	294	有活动	1984年重修
集福堂	省璜堂	省璜乡省汾村	1914年	234	有活动	1994年重修
天道堂	下炉堂	白樟镇下炉村	1914年	181	有活动	1986年修缮
一贯堂	莲宅堂	塔庄镇莲宅村	1918年	366	无活动	借给小学使用
唯一堂	九都堂	省璜乡建功村	1918年	280	无活动	1971年被拆开田
宣道堂	龙池堂	塔庄镇龙池村	1918年	709	有活动	1984年重修
基督堂	坂西堂	坂东镇坂西村	1921年	541	无活动	1969年被拆开田
保惠堂	白中堂	白中镇田中村	1922年	310	有活动	1988年对换新建
教士屋	牧师屋	坂东镇湖头村	1922年	357	无活动	1999年改建新堂
真神堂	池园堂	池园镇井后村	1923年	316	有活动	1997年另址重建
真源堂	城关堂	梅城镇山乾顶	1924年	460	有活动	1986年重修
台真堂	后垄堂	云龙乡后垄村	1924年	651	有活动	1984年重修
福音堂	三都堂	坂东镇楼下村	1924年	411	有活动	1988年修缮
昭仁堂	小园堂	白樟镇小园村	1924年	255	有活动	1987年修缮
福民堂	福斗堂	池园镇福斗村	1924年	132	无活动	危房处理
真福堂	际下堂	云龙乡际下村	1924年	144	无活动	1973年被拆开田
大仁堂	上莲堂	上莲乡莲埔村	1924年	429	无活动	1981年被拆让售乡政府建办公楼
救主堂	东桥堂	东桥镇过洋村	1926年	140	有活动	1984年修缮
永生堂	金沙堂	金沙镇三太村	1929年	497	有活动	1995年修缮
三一堂	大箬堂	东桥镇大箬村	1947年	142	有活动	1999年重建

从上表可以发现,从民国初年(1912年)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是美以美会在闽清迅速扩张的一个时期,统计中26个堂点有20个是在此时期创建的,特别是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形成一个井喷现象,这一年共创建了包括城关真源堂在内的7座教堂。此后,闽清基督教的发展进入一个稳定时期,从民国十三年(1926年)后至解放前,只创建了金沙永生堂和大箬三一堂两处教堂。解放后至文革前,教会处于一个历史变革的时期,同时,在实行“自养”之后,教会经济较为困难,

此时期没有新建教堂。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教会处于一个开始复苏的阶段，但由于各堂点在文革中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此时归还教会的很多教堂都需要修缮或者重建，教会亦无力进行扩张和建设新堂。直至20世纪90年代，教会工作已重新走上正轨，教徒人数增加，教会经济在教徒特别是海外华侨教徒的资助下有所增强，这个时期创建了白樟镇白南堂和塔庄镇坂茶堂在内的8处堂点。下面笔者将对表中所列26个堂点中比较重要的几个堂点做一简介。

福源堂现六都堂（地址坂东镇湖头村）^①

六都地处梅邑中心，人烟稠密，文物荟萃。1866年，薛承恩牧师在湖头黄明望厝设立祈祷所，首信者有黄福居、黄乃裳、陈大禄三人。逾年，福州年会派许扬美牧师主理教务，黄乃裳为助理。是时教会属福州天安堂循环。1882年，许则翰牧师（许扬美牧师之子）来主循环，鉴堂所之简陋，向布道部与会友提议建堂，以隆崇拜。于是由黄必宏献地、其他会友各自捐资，不敷部分由布道部拨补，大家公推黄茂坦为理事，负责建堂事宜，几经波折，迄1887年竣工。建立而层九间砖木结构，面积457平方米，含埕占地八分，定名：福源堂。为闽清最早建造的基督教总教堂。



图 5-2 福源堂旧貌

^① 闽清县基督教两会编，《闽清基督教志》，2000年11月内部刊行：第11—14页

继许牧之后，有余淑夫、丁大梁、黄治基诸牧师，承先启后，教务日见昌盛，湖峰、坂中、墩上里，车墩、鹿角等处，有池圣美于下杭，邱拱和于炉溪，黄庆荣于十都，范德顺于九都，王桂卿于八都，郭章美于十都，相继开属。闽清教会遂扩展为连环，而二都、十五都、七都、十一都等循环均由福源堂分衍而出。随后，福源堂创立培元书院、承恩医馆、妇女学校等事业，教务益见蓬勃，遂成为闽清教会之总枢。后继牧师，多为努力。有辛亥革命期间与许凯人等创立体育速成班，训练北伐人才；民国期间与黄炳武等努力去毒禁赌；复兴新仁会；1919年，许则翰牧师重修堂会，并增建钟楼；1921年谢善治牧师设立梅南模范小学等。

1934年，教会减政，坂西基督堂、三都福音堂并入福源堂，称“三六都牧区”，由刘我明主理会务，占月香为女执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教堂关闭，停止活动。复于1980年12月正式开放，为闽清“文革”后第一个开放的基督教堂，并成立了教堂管理委员会。教堂除主日聚会以外，每周星期三举行祷告会，共有信徒1156人。由于信徒的不断增长，原教堂渐显拥挤。1994年由六都堂管会提出申请，经县、市、省三级宗教主管部门批准，同意移址原湖头教士屋建新堂。1999年4月13日开始动工，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建筑面积1480平方米，总造价115万元，此项巨款主要由马籍主内华侨刘端源、刘会干奉献，新堂于2000年10月竣工。



图 5-3 福源堂新貌，新教堂建址在原湖头教士屋处

真源堂现城关堂（地址梅城山墩顶）^[1]

1864年，薛承恩牧师到闽清布道时，曾租县城浮头街萧姓民房为堂所。后改赁十字街万元银铺及街头徐姓民屋，为该堂创立的前期。此时期教务开展维艰。继之传道的黄大旺认为环境不佳，遂移堂所于大路村同安厝。此时期诸传道者都灵俗并重，教会渐有发展，于是布道会决定必要在县城设立堂所。后教务渐茂，信徒发展至梅埔、钟石等地，至闽清教会分设南北教区时，该堂成为北区的总枢。1924年，布道司葛树棠、教区长许伯卿、牧师刘我明等倡议筹建总堂，得布道部拨款与会友奉献，捐助款目达万元，于是设计绘图，爰兴砖木，越两年，礼堂与牧师堂先后落成，计26间460平方米，占地二亩七分八厘。式样新颖，气象巍峨，为梅邑各堂会首屈一指。堂踞山上，俯瞰全城，地处中心，风景秀丽，乃为该堂发达之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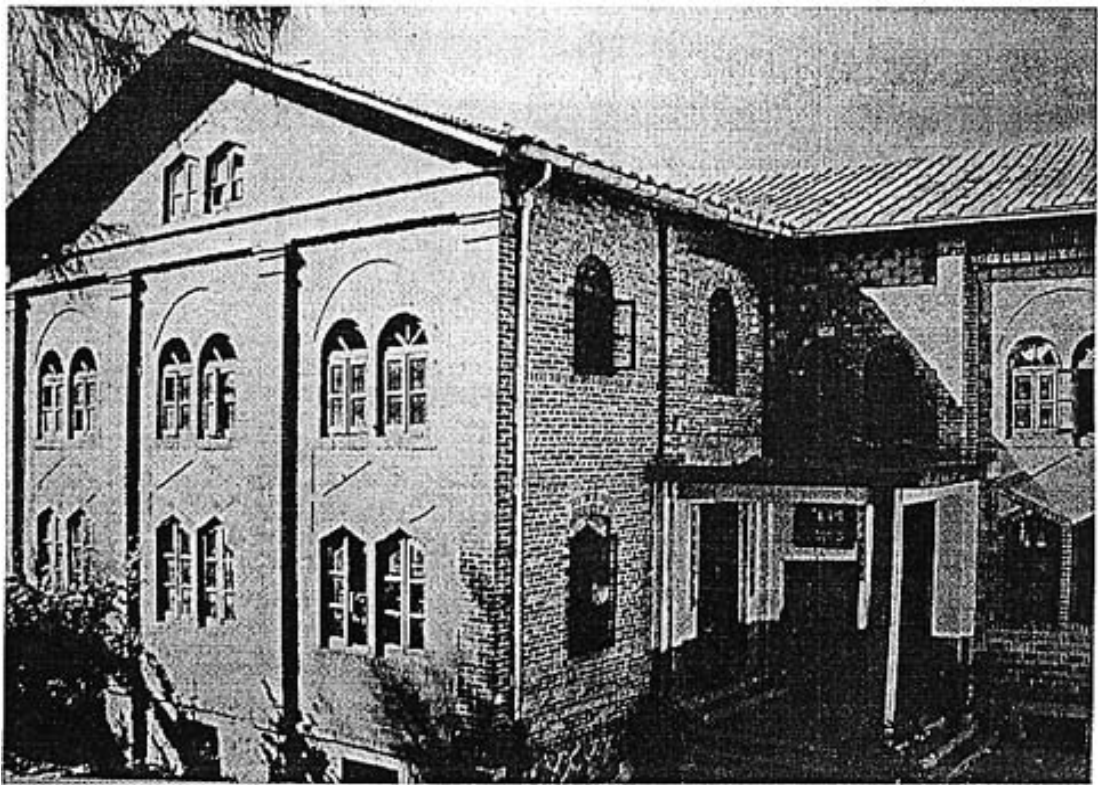


图5-4 城关真源堂现貌

“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堂关闭，教会活动停止。复于1981年4月19日正式开放，并成立堂务委员会，开展正常教务活动。溪口、安仁堂、大箬、小箬教徒也常来参加聚会。当时教徒254人，平时经常出席礼拜130人，节日参加者250多人。

^[1] 闽清县基督教两会编，《闽清基督教志》，2000年11月内部刊行：第14—16页

到 1999 年之时，该堂已已有信徒 1500 人，平常聚会人数有 600 多人，除主日聚会以外，每周星期三、五、六晚上举行不同形式的聚会。鉴于信徒增多，堂所已是容纳不下，相关人士已在积极筹款建设新堂，目前已有筹款 30 多万元。



图 5-5 真源堂英文名“WHITE TEMPLE”

真源堂各组组长值日表			
2005 年	地 区	组 长	值 日
7 3	榕院	曾兴梅、刘桂华	
7 10	北溪	陈国成、高碧华	
7 17	渡口	毛玉英、陈淑华	
7 24	渡口	陈淑华、刘宜庭	
7 31	建兴	陈世存、陈世敏	
8 7	街边	陈水英、赵美英	
8 14	前山	吴美珍、陈美香	
8 21	后山	林美芳	
8 28	后山	陈美珍、陈美华	
9 4	后山	陈美珍、陈美华	
9 11	后山	陈美珍、陈美华	
9 18	渡口	陈淑华、刘宜庭	
9 25	渡口	陈淑华、刘宜庭	
10 2	渡口	陈淑华、刘宜庭	
10 9	渡口	陈淑华、刘宜庭	
10 16	渡口	陈淑华、刘宜庭	
10 23	渡口	陈淑华、刘宜庭	
10 30	渡口	陈淑华、刘宜庭	
11 6	渡口	陈淑华、刘宜庭	
2005 年	地 区	组 长	值 日
11 13	北溪	陈国成、高碧华	
11 20	渡口	毛玉英、陈淑华	
11 27	渡口	陈淑华、刘宜庭	
12 4	建兴	陈世存、陈世敏	
12 11	街边	陈水英、赵美英	
12 18	前山	吴美珍、陈美香	
12 25	后山	林美芳	
2006 年	地 区	组 长	值 日
1 1	后山	陈美珍、陈美华	
1 8	后山	陈美珍、陈美华	
1 15	后山	陈美珍、陈美华	
1 22	渡口	陈淑华、刘宜庭	
1 29	渡口	陈淑华、刘宜庭	
2 5	渡口	陈淑华、刘宜庭	
2 12	渡口	陈淑华、刘宜庭	
2 19	渡口	陈淑华、刘宜庭	
2 26	渡口	陈淑华、刘宜庭	

图 5-6 真源堂各组组长值日表，可见其传教

范围

台真堂现云龙堂（地址云龙乡后垄村）^①

台真堂发起于黄传忠先生，时县城教会移设于大路村，黄以戚属往来，得闻基督教义，遂请牧师开属于二都台头，假陈庆林家为堂所，属六都循环。后教务发展，遂与六都会立循环。1924年，随信徒日益增多，圣日礼拜堂所容纳不下，堂所负责人与会友请求布道部助款，筹建堂所。建成土木结构，计26间，面积651平方米，占地一亩五分，定名为台真堂。



图 5-7 云龙堂

1927年，堂所中人在诗巫募集基金购置橡园，堂所有了产业基础。堂内附设有徐振南先生捐资所办的东月女校，校名以徐君夫人为名，以为纪念。1952年，教堂关闭，停止礼拜活动。1984年3月11日，教堂恢复宗教活动，成立堂务管委会。时参加礼拜70多人，节日崇拜有130多人。1994年，主内华侨黄广谋等捐资5万元修缮教士屋，县两会在该堂办起了福州市基督教爱心幼儿园，于1995年9月12日举行开学典礼，并得到南京爱德基金会资助，修建了卫生厕所、校操场以及购置了各种玩具设备，现有教师3人，学生80多人，分大中小三个班。同时，教堂还筹建了基金会，筹募捐款。至2000年，该教堂有教徒200多人，平常参加聚会有100多人。

^①闽清县基督教两会编，《闽清基督教志》，2000年11月内部刊行；第16—17页
闽清美以美会，七十年来之闽清美以美会，1935年内部刊行；第26页

5.3 闽清教堂分布态势及其促成因素分析

教堂分布态势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时间上，各个教堂创建时间有迟有早，而且在各个时间段上有多有少；另一种则是地理位置上的，主要是各个教堂的地理分布状况和地理分布趋向，以及各个地区教堂分布的多少对比、疏密对比。美以美会在闽清的教堂，其在时间轴分布上以及地理位置分布上，都呈现了自己的特点。下面笔者将对闽清教堂分布态势上的这些特点以及促成因素做一分析。

5.3.1 闽清教堂创建时间分布态势及促成因素

按照美以美会在闽清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笔者大体上将闽清基督教会史分成创业时期、成长时期、繁荣时期、维系时期、没落时期以及复苏时期。创业时期从薛承恩来梅传教开始，至清光绪八年（1882年）许则翰与薛承恩创建湖头福音堂；成长时期从建造最早教堂开始，至清王朝覆亡；繁荣时期从民国开始，至解放前夕；维系时期从解放前夕至1957年“左”倾浪潮前夕；没落时期从1957年的“左”倾错误思潮开始，至文革结束；复苏时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

闽清教堂各时期创建数统计表

时期	教堂创建数	备注
创业时期	0	有多处租赁民房而设立的祈祷所和传道、聚会点
成长时期	5	各堂所创建时间分别为1882年、1894年、1896年、1898年和1904年
繁荣时期	20	分别是1912年一座、1913一座、1914两座、1918年三座、1921年一座、1922年两座、1923年一座、1924年七座、1926年一座和1929年一座
维系时期	1	1947年一座
没落时期	0	
复苏时期	8	对旧堂修建的有：1984年重修5座，1986年重修2座，1987年重修1座，1988年重修1座、新建1座，1994年重修2座、重建1座，1995年修缮1座，1997年重建1座，1999年重建2座；创建新堂的有：1990年1座，1991年1座，

		1998年3座, 1999年2座, 另有一座时间不明。
--	--	-----------------------------

从上面表格可以看出, 闽清教堂创建数量在时间上的分布态势呈波浪型发展, 从创业时期的零到成长时期的5座, 再到繁荣时期的20座, 达到了闽清教会创建教堂数的最高峰; 之后, 开始回落到维系时期的1座, 再到没落时期的零座, 然后再到复苏时期的8座。这种分布态势说明了, 闽清教堂的创建, 与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背景以及教会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笔者认为, 推动着这种分布态势形成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5.3.1.1 民间对基督教态度的变化

民间对基督教的态度是教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尤其是对于教会租地租房、购地建堂以及教徒的发展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闽清民间民众对基督教的态度, 基本上有一个从排斥到逐步接受, 再到排斥, 再缓慢接受的过程。

基督教属于外来宗教, 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 加上基督教在鸦片战争后随着炮火, 握着不平等条约而来, 中国民间民众对基督教普遍抱着疑惧和敌对的态度。正如胡适所说: “一个有过光荣历史及固有文明的民族, 当着被生活需要的压迫, 而必须接受外来的文化时, 一定要很自然地很合理地发生疑惧的心理。”^[1] 当传教士薛承恩来到闽清时, “时值炎夏, 牧师身穿白衣, 头戴白冠, 装束奇异, 乡人不敢接近。”^[2] 两年后, 当他再次来到闽清, 计划设堂布道时, “遭耀扬侄等人阻挠, 有一绅士揭帖字条曰: ‘洋人说教, 其心叵测。’ 事遂中止, 牧师因离鹿角而至坂中, 一日于街上宣道曰: ‘余为代天宣道者。’ 绅士某, 以旱烟管扣其首曰: ‘尔何人? 竟敢自居孔夫子。’”^[3] 闽清民间对于基督教的疑惧和排斥, 对于美以美会初期在闽清的发展起到一定的阻挠作用。传教士在传教时碰到乡民或者士绅的排斥, 常常无功而返。

美以美会基于传教的需要, 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当地价值观融合。中国“虽然也有不少悟道的和尚与智信的居士, 而大多数的民众, 不能不说是一种多神崇拜的迷信。”^[4] 而“福建地方多以神力大小, ‘灵验’ 与否作为宗教选择的前提, 要求宗教能够解决现实的生活需要。”^[5] 美以美会大量运用“神迹”, 如福音解救被邪魔附身

[1] 胡适:《先秦名学史序》, 转引自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4: 第1页。

[2] 闽清县基督教两会编:《闽清基督教志》, 2000年11月内部刊行: 第2页。

[3] 闽清县基督教两会编:《闽清基督教志》, 2000年11月内部刊行: 第2页。

[4]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4月: 第13页。

[5] 朱峰:《基督教与中国东南的乡村社会——以近代福建美以美会为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3期。

的妇女、教会传道向上帝祈祷求雨灵验、牧师为妇人驱走狐狸精，甚至佛教菩萨让乡民请基督教传道为人治愈疾病等等。^[1]传教士用这些故事拉拢民心，扭转民间对他们不利的态度。加上美以美会传教中附带办学、办书局、做慈善事业，给闽清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许多民众对其态度逐渐转变成感激和接受。有地方士人谈及当地教会学校感叹，“我国自有教育，外人转以教育施我，我甚愧矣。”^[2]

闽清民间对于基督教态度至解放前后又有了一定的变化，先是“非基”思想的影响，到1957年的“左”倾错误思潮，再到“文化大革命”，民间对基督教的态度再次恶化，民众的反基督教浪潮也阵阵掀起。导致了教会活动受阻甚至停止，教堂被迫关闭，或者被占用、被买卖、被拆开田。这种态度直至文革结束后才有了新的变化。

5.3.1.2 官方态度及其政策的变化

鸦片战争带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在西方国家的逼迫下，清政府不断放宽对基督教的政策。但是，在美以美会初入闽清之时，当地官方对于教会大都是鄙视和不屑的。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美以美会在闽清的教徒，大多是当时社会底层民众，这一阶级的人与官员们身份差距巨大，教会由此难于得到官员们的认同感。

随着清政府的覆灭，民国的兴起，由于早前基督教对国民革命支持的态度，国民政府对基督教的政策大为有利。美以美会在闽清的发展也得以迎来了一个繁荣时期。

解放后，新政府制定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时要求教会独立自主，摆脱西方教会的控制。1950年7月，闽清全县教徒响应《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与外国教会切断联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方针。文革期间，宗教政策未能落实，教会活动被禁止，教堂关闭。这种状况同样持续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政策重新落实，才发生了改变。

5.3.1.3 教会经济能力

教堂的创建与教会经济能力有着直接的联系。闽清教会前期，由于教徒人数寡，捐赠很少，要以上面教会的资助来大量建筑教堂是不可能的；民国以后，随着教会教务发展，教徒人数激增，捐赠大大增多，或者捐钱物，或者捐地，或者出力，加上教徒增多引起建堂的需要，大量创建堂所的局面于是出现；教会维系时期，由于

^[1] Walter N. Lacy: A Hundred Years of China Methodism, [M] New York: Abingdon Press, 1911:P58

^[2] 杨宗彩:《闽清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146页。

教会本色化，开展“三自”运动，在摆脱西方教会控制的同时，失去了西方教会资金的支持；闽清教会复苏时期，教会房产退还，或者赔偿，教会经济有了一定的起色，并且主要有海外华侨教徒的捐赠，重新修建旧堂和创建新堂有了经济上的支持。

5.3.2 闽清教堂地理分布态势及其促成因素分析



图 5-8 闽清教堂所在位置示意图

从上面“闽清教堂所在位置示意图”可以发现以下几个地理分布特征：

5.3.2.1 教堂大多倚河流而建

如前面介绍闽清地理特点所说，闽清境内多山，不利于陆路交通，且其境内河流纵横，流域面积在30平方公里以上的共有17条，总长358.55公里。其中，几个主要河流流域遍及闽清大部分乡镇村落。

闽清境内主要河流一览表^[1]

河流名称	境内长度(公里)	流经的乡镇村落
闽江	29.5	流经雄江、东桥、梅溪、梅城等3乡1镇19村31个自然村。
梅溪	78.6	流经省璜、塔庄、坂东、白中、白樟、梅溪、梅城等7个乡镇的56个村，沿途纳岭寨溪、濂溪、文定溪、芝溪、金沙溪、下炉溪、县溪诸支流之水。
芝溪	40	流经上莲、池园、白中3个乡镇21个村，至白中珠汇入梅溪。
金沙溪	37.6	纳云际、林水、陶洋、石漏、矿坑、横坑诸小支流之水，流经金沙、白樟两乡的14个村，在白樟新庄洋汇入梅溪。
安仁溪	39	纳新桥、杉村小溪流之水，流经东桥乡的7个村，至安仁溪村注入闽江。
古田溪	16.6	于龙亭进入闽清桔林乡后洋村，纳潘宅溪、锡洋、温汤等诸小支流之水，流经桔林乡8个村，出水口镇汇入闽江。
麻坑溪	10.35	流经县内金沙的天洋村和美旗林场，为闽(清)尤(溪)两县界河，向北流经尤溪王宅，在古田县弯口汇入闽江。
马兰坑	16.6	在县东北下祝乡境内，集罗山西埔、前洋石步坑和渡塘等小溪流之水，流经后洋、邹洋，自北折东注入连江县敖江。
大雄溪	17	位于县境北部雄江乡境内，出大雄村汇入闽江。
石潭溪	12.6	位于县境北部，发源于白樟乡凤凰湖山麓，流经梅溪乡石郑、安下，出石潭溪口汇入闽江。

^[1] 表中数据参考自闽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闽清县志》，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12：第27—38页。

由上面这个表格可以看出，闽清境内河流不仅覆盖了闽清大部分乡镇村落，而且各河流间纵横交错，互相沟通。对于陆路不甚便利的闽清来说，水路可谓是其交通的一个有力补充。教堂建筑在各主要河流旁边，首先方便了教徒赶往教堂参加活动，其次方便了传教士外出传教并与其它乡镇的教堂联系。

5.3.2.2 众教堂以六都和城关两个点为基点辐射扩散

六都和城关两个循环是闽清最早的两个循环，是闽清基督教活动的开始。同样，六都福源堂和城关真源堂也是闽清教堂的两个中心点，其它教堂和堂点基本上都是由这两个教堂辐射出去的。从闽清各个教堂分布的地理位置来看，六都福源堂和城关真源堂这两个中心点所处的位置都是闽清的中心位置，人烟稠密，文物荟萃。而其它的堂点则多分散于这两个中心点周围各个乡镇的村落中。

5.3.2.3 在各个教堂点与点之间，不成文地出现划分范围各自发展教徒和组织信徒聚会的局面

这种局面的形成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闽清士绅和较大家族在教会和教堂创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闽清各堂点信徒中不乏该村落的士绅以及该村落较有影响力之人士，这些人在各个堂点的信徒中作为骨干力量而出现，他们在各堂点中起了吸引和团结其他信徒的作用。同时，他们也为创建教堂起了一定的有利的影响，比如带头乐捐，又比如为建堂购地消除地方的排挤力量等等。

而信徒家族化也对创建教堂起了一定的影响。就思想方面来说，一个家庭或者家族中有人信教，很容易就影响整个家庭和家族的人信教，而且，在进一步发展之后，就呈现出教徒子女通婚，相邻家庭、家族之间互相影响的现象；就物质方面来说，由于全家族信教，所以他们对于空出家中空余房子、租赁房屋或者厂房甚至是买地基等对建立教堂的物质奉献在思想上较容易统一，也较愿意付出。

各村落较有影响力之人士以及信徒化家族对于各个堂点的影响巨大。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各村落相对独立，加上士绅之间、家族之间相对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各个堂点之间划分范围各自发展教徒和组织信徒聚会局面的出现。

6.1.1 教牧人员和事工部门

花巷基督堂现共有陈立福、余玉云、张治忠、黄美莺、江桂英、吴霞 6 名教牧人员，他们承担了现在花巷基督堂的主要传道工作，从周一到周六教堂都有安排教牧人员值班。^[1]同时，教堂还有很多事工，这些事工的主要职责是承担起教堂的日常运行工作。事工的来源一般有自愿和邀请两种形式，而且事工一般都要求是教会中人，或者是信仰基督教的普通人。以该堂负责制作教会刊物的咨询部的事工邀请条件为例，要成为该部门事工必须得符合以下条件：

- 一、已重生得救；
- 二、具有写作能力（或版面设计）；
- 三、信仰纯正；
- 四、熟悉圣经；
- 五、愿意花时间为侍。^[2]

并且，根据不同工作的需要，教会针对性地分设有专门的事工部门。^[3]每个事工部门有专门的职能，分管不同的工作。主要有办公室、传道部、探访部、圣工部、圣乐部、招待部、资讯部、关爱部、总务部、财务部、主日学校和筹建部，职能从管理堂务、传道、后勤分工、编辑教会刊物到教育儿童等方方面面，可以说部门齐全，分工明确，并且具备了现代企事业单位职能分工的特征。

花巷基督堂教牧人员及其工作安排表

主任牧师	陈立福
牧师	余玉云、张治忠
传道	黄美莺、江桂英、吴霞
值班时间由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11:30
	下午：2:30—5:30
周一	陈立福、江桂英
周二	张治忠、黄美莺
周三	余玉云、吴霞

^[1] 参见“花巷基督堂教牧人员及其工作安排表”

^[2] 事工要求材料来自口述材料

^[3] 参见“花巷基督堂事工部门表”

周四	江桂英、陈立福
周五	黄美鸾、张治忠
周六	吴霞、余玉云

花巷基督堂事工部门表

部门名称	主要职能
办公室	主持堂会活动及管理堂务，日常通联，文档。
传道部	负责灵修、布道、牧养、讲坛信息
探访部	负责各医院片区及社区、家庭探访
圣工部	制圣餐饼、葡萄酒及登记受洗者
圣乐部	负责礼拜诗班活动及协助堂会筹备大型庆典活动
招待部	维持各场崇拜、聚会秩序及接待来宾
资讯部	编辑《周讯》、《百合花》等
关爱部	义诊、代写祷告单及爱心服务
总务部	负责教堂设施的维护及保管
财务部	负责本堂的各项收支帐目及资金使用安排
主日学校	带领儿童敬拜神
筹建部	负责筹建新堂

6.1.2 日常活动安排

教堂的日常活动有固定安排和特殊安排两种。固定安排的活动主要参照教堂制定的聚会时间表^[1]，基本上每周从周一到周日都安排有固定的聚会活动。聚会活动根据发起活动的团契部门的不同，活动内容也不尽相同。团契部门根据活动对象的差异分别建立，例如有儿童主日学、青少契、姐妹团契、常青团契以及青年团契，这些团契部门根据年龄的大小，从儿童到青年，分别有自己的团契组织，还根据性别差异区分出了姐妹团契，甚至还有针对商人对象的巴拿马团契。此外，团契部门还根据活动目的不同来区分，例如有主日崇拜、查经祈祷班、敬拜赞美小组、英文

^[1] 参见“花巷基督堂聚会时间表”

查经班以及晨祷会。特殊安排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突发性，以该堂的一次周讯为例：

【市两会】市基督教两会爱心服务中心定于2006年4月22日(星期六)上午九时在福州圣泉陵园基督教园内举行集体扫墓和追思礼拜。牧师将主持证道，并有唱诗班、乐队参加献唱活动。到时欢迎主内弟兄姐妹及有亲人已安葬于基督教园区内的亲朋好友参加。

届时请乘坐11、818、916路车到车站(终点站)下车，从早上7:30开始将有专人专车接送到圣泉陵园。^[1]

花巷基督堂聚会时间表

团契部门	聚会时间	内容
主日崇拜	每周日：上午7:00—8:30 9:30—11:00 晚上19:30—21:00	敬拜证道
儿童主日学(大)	每周日上午10:00—11:30	敬拜、喻道
儿童主日学(大)	每周日晚上19:00—20:30	耶稣生平(动画VCD)
儿童主日学(小)	每周日上午10:00—11:30	敬拜、喻道
青少契	每周日下午14:30—16:00	敬拜、祷告、分享
姐妹团契	每周二上午8:00—10:00	证道、分享
查经祷告会	每周三晚上19:30—21:00	查考希伯来书
敬拜赞美小组	每周四晚上19:30—21:00	查经祷告
常青团契	每次圣餐后 周五上午8:30—10:30	讲道培灵
英文查经班	每周五晚上19:30—21:00	查考马太福音
巴拿巴 (商人)团契	每月第一周晚19:30—21:00	见证、分享
青年团契	每周六晚上18:30—21:00	祷告、敬拜赞美
晨祷会	每日早上6:00—7:00	为教会祷告

从花巷基督堂的日常生活安排可以发现：首先，教堂活动安排密集，时间遍布

[1] 福州花巷基督堂周讯

每日；其次，教堂活动对象广泛，从儿童到少年到青年再到成人，从学生到普通劳动者到商人，基本网络了所有年龄层次和所有工作性质的对象。

6.1.3 教堂的舌喉——教会刊物和教堂网络论坛

花巷基督堂的刊物主要有周讯、《百合花》以及《百合花增刊》。周讯每周不定期整理，主要内容有活动通告，例如主日崇拜安排表、诗班献唱安排、本周团契安排等等；有圣徒格言，例如奥古斯丁的“我们能祈祷，这件事就是上帝的恩赐”；有圣经人物，这方面要求圣徒根据经文中圣徒的故事来设身处地理解圣经故事，如：

王子摩西：

经文：“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天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来 11: 24-28）

默想：很明显的，摩西充分把握了他的机会，接受了一流的教育（徒 7: 22）。所以，当他决定放弃自己辉煌的前程，去从事拯救同胞的工作时，那是何等大的危机。没有人以为他杀了那个埃及人是明智之举，反而很容易批评他轻举妄动。如果我们处在他的地位上，谁肯为了使神能拯救自己的同胞，而自愿舍弃王子的尊位，成为奴隶？他这样的牺牲有点像主耶稣，但他失败了。因为像基督的举动需要有基督那样的品格，这是当时的摩西所没有的！所以从那时起，神以新的方式在他身上动工，以塑造他，使他有这品格。我们不必担心自己太愚拙、太冲动；如果你肯将自己交托给神，并愿意服事，必负责使你成圣。^[1]

除此还有讲坛信息，讲坛信息为事工根据教堂教牧人员传道录音不定期整理。

《百合花》和《百合花增刊》是花巷基督堂的主要刊物。刊名是从圣经里摘录的，“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2]《百合花》为双月刊，至

^[1] 参见花巷基督堂周讯之圣经人物

^[2] 路加福音 12: 27

今已出到第48期(2006年11月),内容分有圣经学习、信徒感想分享、家庭婚姻、外语角等等。《百合花增刊》分有圣诞节增刊和复活节增刊,每年圣诞节和复活节各出一期,内容主要围绕圣诞节和复活节,栏目设置类似于《百合花》,但量比较少。

网络论坛是花巷基督堂教会宣传福音的一个新手段,论坛由教堂事工负责管理。分有事工见意(对花巷建堂事工的设计、构思等)、堂会专区(关于花巷堂会及各部门通知的发布,堂管会事务等)、分想经文和见证(分享认识,说出烦恼让大家代为祈祷)、资讯论坛(《百合花》投稿)、花巷团契(按对象工作性质和年龄、性别的差异有不同团契组织的版块)、赞美见证主(诗歌赞美、事件见证)等版块。现论坛共计有1115名注册会员,有1656篇主题和3791篇回复。^[1]网络论坛是教会根据时代变迁、社会变化以及传教宣道对象变化而做出的应变举措,这项举措为教堂带来了新鲜的信仰者。

6.2 调适与撞击——教堂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以发展的、联系的观点来看,任何个体和组织团体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它事物发生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基督教会及其教堂作为一个组织团体,从来都不是以避世和置身事外为追求。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与社会发生广泛的接触,并积极投身于社会事业,与当地社会和睦相处,是教会发展所应遵循的原则,也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作为教会传教据点和国家规定的宗教活动场所的教堂,在对新时期、新社会、新对象、新政策进行自身调适的时候,也对其周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6.2.1 对传统观念、传统习俗的冲击

这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破除封建迷信、改变传统丧葬观和改变传统婚礼观。

在破除封建迷信方面,主要是通过对教徒的规定约束,以及对迷信与信仰的区别、迷信的害处等等的宣传来实现,如《百合花》中一稿所言:“信仰不是迷信,迷信不是信仰。当我们看见我们同胞把迷信当作宗教,把宗教当作迷信,把宗教同救赎混淆在一起乱信一场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事太多了。”^[2]

在改变传统丧葬观方面,教会教徒摒弃传统丧葬时请神、请和尚、请道士以及

^[1] 数据统计截止至2007年4月7日。

^[2] 《百合花》投稿稿件《十字架福音与现代人》。

http://www.fzhxjt.com.cn/bbs/topic.asp?topic_id=2002&forum_id=10&cat_id=4

6.2.2 基督教节日的兴起

基督教的两个主要节日：圣诞节和复活节，已经越来越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所接受。特别是圣诞节，它是庆祝基督耶稣诞生的节日，是基督教最大的节日。在圣诞这一天，世界所有基督教会都举行特别的礼拜仪式。但是，有很多圣诞节的欢庆活动和宗教并没有关联，比如交换礼物、寄圣诞卡片等等，加上西方国家很重视这个节日，都把它连同新年一起过，于是圣诞节慢慢就成为了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如今在中国社会，这也变成普遍现象了。有一些教堂也会抓住人们喜欢过圣诞节的心理来发展新教徒，比如在这一天发出“圣诞邀请卡”，邀请普通人到教堂一起过圣诞节，并借机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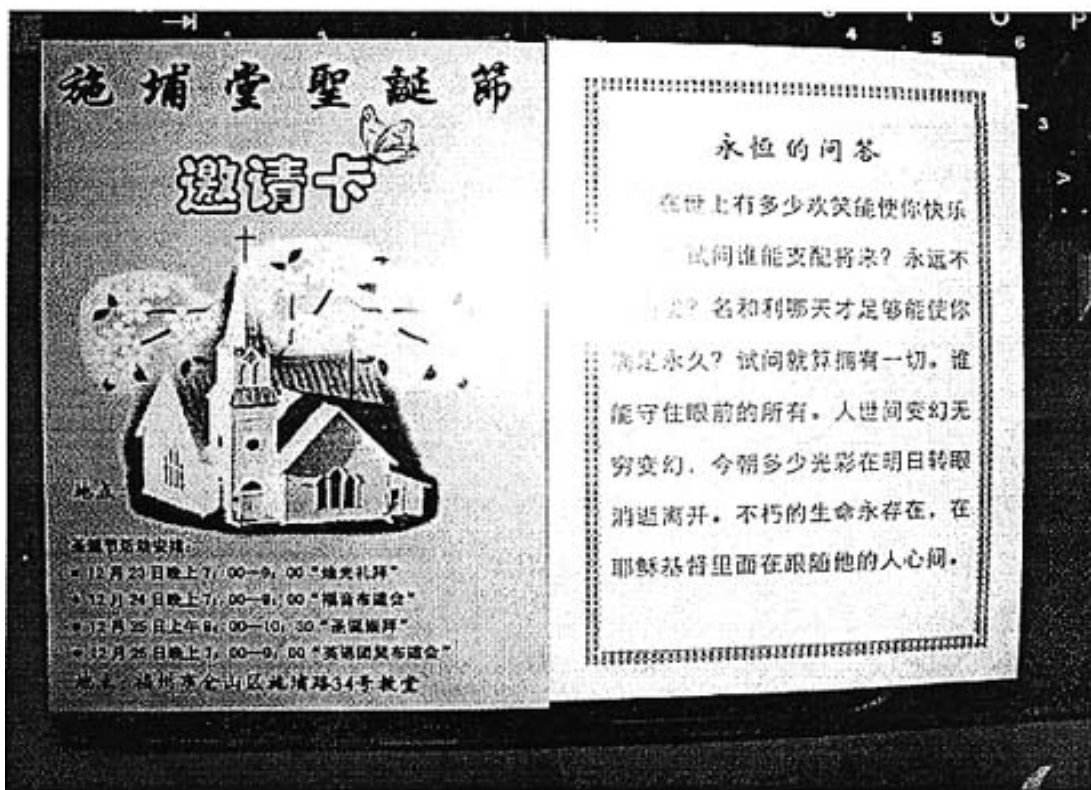


图 6-3 圣诞邀请卡

6.2.3 劝人为善并积极投身社会慈善事业

从道德和法制方面来看，基督教的教义、规训以及平常的宣道内容在劝人为善，维持地方社会和谐秩序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花巷基督堂信奉的一些圣徒的话：

“认罪是得教的开始。”——马丁路德

“独处——人独处时，绝不可无主。独处无主，乃是最危险之时，是故君子必

慎其独。人无论至何处，亦必须能有主同去方可，不能与主同去之地，绝不可去。”
——贾玉铭^[1]

同时，教会本身经常组织探访伤残、照料孤寡、扶贫救灾以及维护社区等善举。这些活动主要由教会和教堂组织，事工承担。像花巷基督堂本身就设有关爱部，其主要职能就是义诊、代写祈祷单等爱心服务。教堂的善举从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教堂的发展，受到帮助的民众较易于接受福音，并加入事工。如今，花巷基督堂的事工已有近千人。

^[1] 摘自福州花巷基督堂周讯的圣徒格言。

结论

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它记录着历史，也诉说着历史。本文对福州基督教教堂的考察与研究，不仅仅是对每个教堂的历史及现状的考察，而且是对所有堂点在创建时间和地理位置上的分布态势的考察，也是对教堂如何适应新时代并发挥功效的考察。本文写作还给了笔者一些新的思考：

首先，年代久远的旧教堂作为历史文物的保护问题。福州是一个历史悠久和文化璀璨的城市，它有着太多值得珍惜的文化遗迹，但它对自己所拥有的宝贵财产的爱惜却是一个问题。以福州圣公会的石厝堂为例，作为福州众多教堂中屈指可数的哥特式全石头建筑，典雅美丽，闻名遐尔，有“国际教堂”之称。但至今，它在文革中被破坏的屋顶钟阁一直没有修复，宗教活动也早已停止，目前仍为某部队印刷厂占用。对教堂本体的保护不够，对教堂附属建筑的保护也是个问题。天安堂旁的印书楼和播捷会馆早已破落不堪，泛船浦天主堂旁的神父楼得为新建楼盘让路。福州仓山历史上洋楼与教堂林立，甚至可以与厦门鼓浪屿比肩，但如今人们多知有鼓浪屿却不知有仓山。因此，保护知名教堂等历史遗迹刻不容缓，保护他们，不仅是保护了一笔文化遗产，而且是保护了现在和未来的旅游经济。

其次，新时期下教堂及其堂会的管理问题。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福州众多教堂及其堂会开始复苏，并在新时期下有了新的发展。以本文做为个案研究的福州花巷基督堂为例，它不仅根据职能的多样化完善发展了自身的组织部门，还根据信息社会的发展建立了网络传道的平台。对于教堂及其堂会来说，这是一种新趋势、新发展；对于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来说，这却是一种新变化、新挑战。根据我国宗教政策，宗教活动只能限于特定的宗教场所。网络平台的开发，在信息高速流通的今天，是一个机会，也是一种危险。有关部门应该正视这种新变化，并加强监督和管理，引导教堂及其堂会的发展走上正轨。

再者，关于教堂与周边社会的和谐问题。教堂与周边社会和谐，不是指建筑外观这种表面的和谐，而是指信徒与非信徒的和谐、堂会与其它社会组织的和谐、信仰与其它理念的和谐。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基督教信徒在很多传统习俗上与非信徒有着冲突，堂会的活动由于担心外人误解有时要遮遮掩掩，不能接受无神论或者其它与教义相悖的理念等等。如何达到与周边社会真正的和谐，一方面需要相关部门

管理者的引导，另一方面则需要教会本身做出调适，让教堂及其堂会与周边社会的和谐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部分。

历史是不可阻挡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个过程。基督教会及其教堂的未来走向会是怎样？相关部门管理者如何根据它的变化来制定相应的对策并加以引导？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附录

附录 1 清朝条约中关于基督教置产的条款表^[1]

主要条约名称	时间	款次	相关规定
《中英五口通商附 粘善后条款》	道光二十三年 (1843)	第七款	“在历年和约内言明允准英人携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不相欺侮，不加拘制。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其租价必照五港口之现在所值高低为准，务求平允。华民不许勒索，英商不许强租。英国管事官每年以英人或建屋若干间或租屋若干所通报地方官转报立案。惟房屋之增减视乎商人之多寡，视乎贸易之衰旺，难以预定数额。”
《中英五口贸易章 程》(《望厦条约》)	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	第十七款	“一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必须由中国地方官会同领事等官体察民情择定地基。听合众国人与内民公平议定租息，内民不得抬价掊勒远人，勿许强利硬占，务要各出情愿，以昭公允。倘坟墓或被中国民人毁掘，中国地方官严拿照例治罪。”
《中法五口通商章 程》(《黄埔条约》)	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	第二十二 款	“凡佛兰西人按照第二款至五口地方居住，无论人数多寡听其租赁房屋及行棧贮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地方官会同领事官酌议定佛兰西人宜居住宜建造之地。凡地租房租多寡之处彼此在事人务须按照地方价值定义。中国官阻止内地民人高抬租值，佛兰西领事官亦谨防本国入强压迫受租值，在五口地方凡佛兰西人房屋间地段宽广不必议立限制，俾佛兰西人相宜获益，倘由中国人将佛兰

^[1] 所录条款摘自田涛主编.《清朝条约全集》(影印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以及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9月第一版.1982年10月背景第二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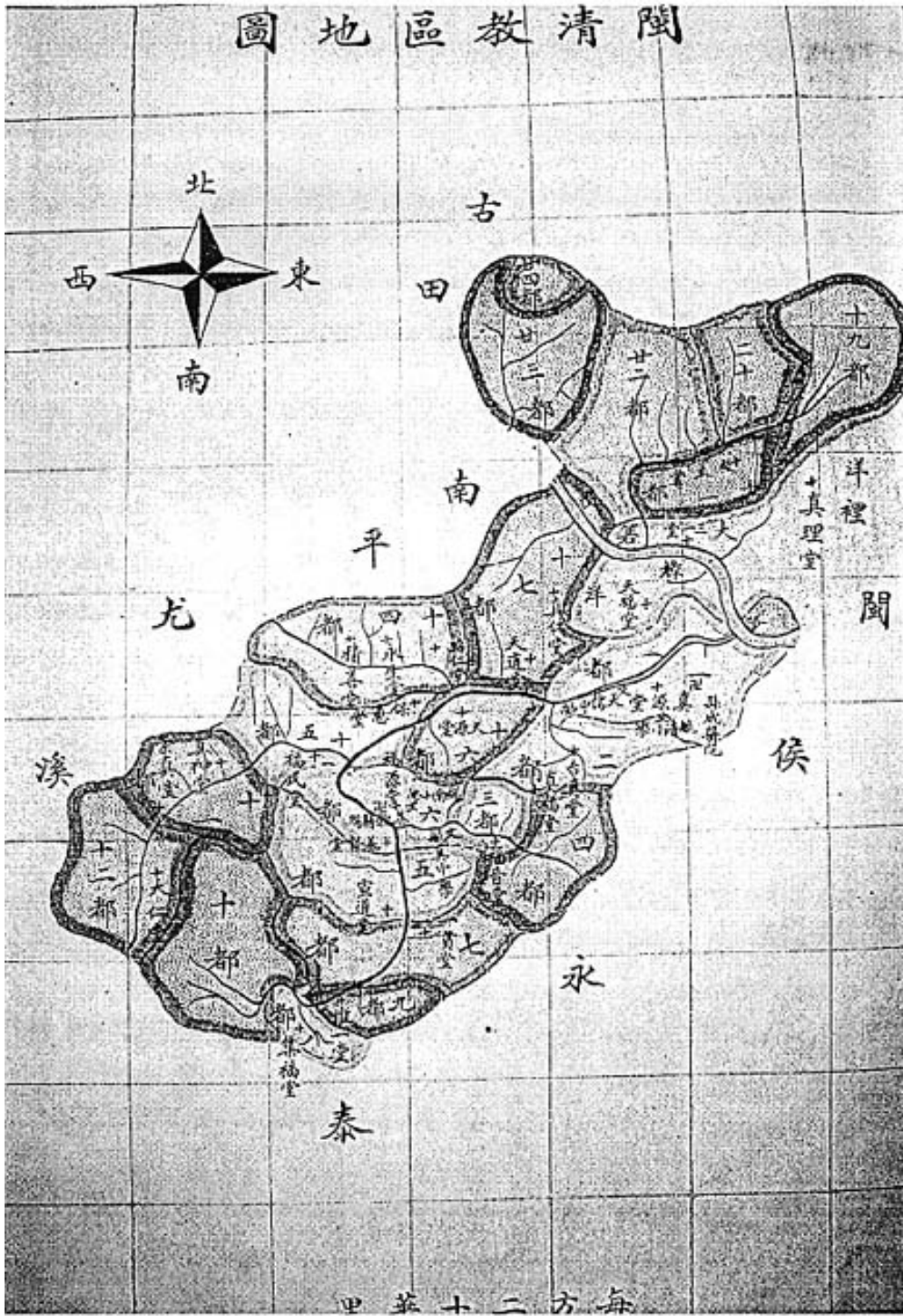
			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中瑞五口通商章程》	道光二十七年 (1847年)	第十七款	“瑞典那威国等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必须由中国地方官会同领事官体察民情择定地基。听瑞典那威国等人与内民公平议定租息，内民不得抬价指勒远人，不许强租硬占，务须各出情愿，以昭公允。倘坟墓或被中国民人毁掘，中国地方官严拿照例治罪”
《中美友好条约》	咸丰八年（1858年）	第十二款	“大合众国民人在通商各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听大合众国人与内民公平议定租息，内民不得抬价指勒，如无碍民居，不闾方向，照例税契用印外，地方官不得阻止。大合众国人勿许强租硬占，务须各出情愿，以昭公允。倘坟墓或被中国民人毁掘，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中俄续增条约》	咸丰十年（1860年）	第六条	“试行贸易喀什噶尔与伊犁塔尔巴哈台一律办理在喀什噶尔，中国给与可盖房建造堆房圣堂等地，以使俄罗斯国商人居住并给与设立坟茔之地，并照伊犁塔尔巴哈台给与空旷之地一块以便放牧牲畜，以应给务地数目，应行文喀什噶尔大臣酌核办理。”
《中法续增条款》	咸丰十年（1860年）	第六款	“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即颁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买田地建造自便。”
《中葡和好贸易条约》	同治元年（1862年）	第十三款	“大西洋国商民在通商各口地方租地盖房设立栈房、礼拜堂、医院、坟墓军按民价公平定议照给，不得互相勒指。至于内地各处并非通商口岸，均议定不得设立行栈，以防华商假冒影射之弊。”

附录

《中丹天津条约》	同治二年（1863年）	第十二款	“丹国民人准在通商各口一带地方，意欲租地盖屋设立栈屋，建造庙堂、医院、坟茔等事，均按民价照给，公平定议，不得互相勒索。”
《中和天津条约》	同治二年（1863年）	第二款	“广州潮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天津牛庄登州台湾淡水琼州登口和商皆准贸易船货任便往来，若欲租赁地亩房屋，设立栈房、礼拜堂、医院、坟茔等事，各听其便。租价公平定议，不得互相勒索。”
《中日和好贸易条约》	同治六年（1865年）	第五款	“各国议定通商口岸如牛庄天津烟台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台湾淡水广州汕头琼州及长江之汉口九江镇江江宁各口，日斯巴尼亚商民亦可任便出入通市，准与无论何人均得听意买卖所有赁房买屋租地起造建立庙堂、医院、坟茔等事，亦随其便。”
		第八款	“日斯巴尼亚商民在通商各口租地盖屋设立栈房、礼拜堂、医院、坟墓均按民价公平定议照给，不得互相勒索，至内地各处并非通商口岸，均议不得设立行栈。”
《中比通商条约》	同治五年（1864年）	第十二款	“凡比国人按照第十一款至通商各口地方居住无论人数多寡，听其租赁房屋及行栈存货租地，自行建屋、建行。比国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地方官会同领事官酌议定比国人宜居住宜建造之地。凡地租房租多寡之处，彼此在事务须按照地方价值定议，中国官阻止内地民人高抬租值，比国领事官亦谨防本国人强压迫受租值。”
《中义通商条约》	同治六年（1865年）	第十一款	“各国议定通商口岸如牛庄天津烟台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台湾淡水广州汕头琼州及长江之汉口镇江江宁各口义国商民任便出入通市，准与无论何人均得听意买卖，所有赁房买屋租地，起造建立庙堂医院坟茔等事亦随其便。”
《中奥通商条约》	同治十年（1869年）	第九款	“凡奥斯马加国人按照第八款至通商各口地方居住无论日期多寡听其租赁房屋及行栈存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奥斯马加国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

			坟地各项……”
《中葡条约》	光绪十四年(1887年)	第十六款	“大西洋国商民在通商各口地方买地租地或租房未建造房屋, 设立栈房、礼拜堂、医院、坟墓均按民价公平定议照给, 惟须由业主报明地方官查明, 无碍民居方向者方可交易, 不得互相勒索, 至于内地各处并非通商口岸, 均议定不得设立行栈。”
《中日通商行船条约》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第四款	“凡通商各口岸城镇, 无论现在已定及将来所定外国人居住地界之内均准赁买房屋租地, 起造礼拜堂、医院、坟莹, 其一切优例豁免利益均照现在及将来给予最优待之国臣民一律无异。”
《陆战规例条约之陆战规例条文》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第四十六条	“家族之名誉及权利个人之生命并私有财产及其信教礼拜之程式等皆应尊重之, 不得没收私有财产。”
		第五十六条	“城镇乡财产及属于宗教慈善失业教育技艺学校等营造物之财产虽属国有者, 应与私有财产一律处理。此等营造物历史上纪念营造物技艺及学术之制作品均禁止故意抑收或毁坏, 有违犯者依法处理。”
《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第十四款	“美国教会准在中国各处租赁及永租房屋地基作为教会公产以备传教之用, 地方官查明地契妥当盖印后, 该教士方能自行建造合宜房屋以行善事。”
《中葡通商条约》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第十七款	“葡国教会准在中国各处租赁及永租房屋地基作为教会公产以备传教之用, 俟地方官查明地契妥当盖印后, 该教士方能自行建造合宜房屋以行善事。”
《中瑞通商条约》	宣统元年(1909年)	第十二款	“瑞典教会准在中国各处租赁及永租房屋地基作为教会公产, 以备传教之用, 俟地方官查明地契妥当盖印后, 即准改教士自行建造合宜房屋以行善事。”

附录 2 闽清教区、教堂地理位置示意图^[1]



^[1] 《七十年来之闽清美以美会》.1935年.闽清美以美会成立70周年纪念刊。

参考文献

一、西文资料

1. 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4
2. 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with Characteristic Skectches and Incidengts of Missionary Operations and Prospects in China*. New York, 1861
3. The Anti-cobweb Club. *Fukien: A Study of a province in China*.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25
4. Edward Band.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5. Norman Goodall. *A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95—194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6. Floy Hurlbut. *The Fukienese : A Study in Human Geography*. The Graduate in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ha in Partial Fultillment of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Published Independent by the Author , 1939
7. Edwin Joshua Dukes. *Everyday life in China; or, scenes along river and road in Fuh-kien*.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s edition
8. Ryan Dunch.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9. Eugene Stock. *The Story of the Fuh-Kien Mission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2nd edition , 1882
10.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 1929
11. Bays. Daniel.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18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Univesity Press, 1996
12. Valentin H • Rabe. *The Home Base of American China Missions* . Published b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3. Macgowan John. *The story of the Amoy Mission*.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99
14. Rev. 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New York, 1867

15. Chinese Repository (中国丛报), 1832—1851
16.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教务杂志), 1869—1941
17. Recorder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1877年传教士大会记录)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18. Recorder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1890年传教士大会记录)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19. China Centu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held at Shanghai, April 26 to May, 1907 (1907年传教士大会记录). Shanghai. Century Conference Committee, 1907

二、中文资料

(一) 档案、会议录、资料汇编及期刊杂志

1. 中华基督教总会第二届常会纪念册, 1930年内部刊行
2. 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第三届常会议录, 1933年内部刊行
3. 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第四届常会议录, 1936年内部刊行
4.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五届年会议录, 1948年内部刊行
5. 福州美以美会. 中华基督教美以美会福州年议会录, 1876—1938年
6. 福州卫理公会. 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福州年议会录, 1939—1949年
7. 福建圣公会. 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辖境)议会报告书, 1883—1949年
8. 中华基督教续行委员会编.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4—1936年)(13册14本). 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联合出版, 1983年
9. 福建圣公会. 福建教区百年史略. 福建教区百周年纪念刊
10. 福州美以美会. 福州美以美会天安堂八十周年纪念刊, 民国二十五年
11. 金陵神学院. 中华基督教历史. 金陵神学志特刊20卷
12. 中华基督教历史. 甲编(特刊). 神学杂志. 第10卷第3号, 1924年
13. 蔡永春、文庸、杨周怀、段琦译.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年鉴 1958年—闽浙台河流水文资料. 第3、4册. 福建省水利电力厅刊印, 1959年
15. 福建圣公会. 福声. 月刊
16. 福建圣公会. 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月刊
17. 中华基督教会. 闽中会刊

18. 闽清美以美会. 七十年来之闽清美以美会. 1935 年内部刊行
19. 闽清县基督教两会编. 闽清基督教志. 2000 年 11 月内部刊行

(二) 地方志及文史资料:

1. 乾隆. 福州府志. 福州:海风出版社, 1988
2. 乾隆. 闽清县志. 清乾隆七年(1742 年)刊本
3.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福建省志. 交通志.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8
4.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福州市志.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8-2001
5.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福州市地名志. 福州.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4. 8
6. 福州市郊区志编委会编. 福州市郊区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9. 12
7. 福州市鼓楼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鼓楼区志.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1. 1
8. 闽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闽清县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3. 12
9. 台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台江区志.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7. 6
10. 仓山区志编纂委员会编. 仓山区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4. 11
11. 马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马尾区志.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2. 5
12. 姚午生主编. 福州市宗教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
13. 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编·基督教天主教编.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14. 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 福州基督教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1987. 3
15. 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 福州基督教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1987. 8
1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福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 福州文史资料. 第七辑. 福州, 1987. 12

(三) 中文著作:

1. 陈支平主编. 福建宗教史.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 11
2. 任继愈主编. 20 世纪中国学术大典. 宗教学.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2. 9
3.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编. 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1985. 10
4. 顾卫民. 中国天主教编年史.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9
5. (西班牙)门多萨著. 何高济译. 中华大帝国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7
6. 张国刚. 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7. (德)彼得. 克劳斯. 哈特曼著. 谷裕译. 耶稣会简史.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3
8. 利玛窦、金尼阁著. 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 利玛窦中国札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3
9. (法)费赖之著. 冯承钧译.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11

10. (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11
11. 田涛主编.清朝条约全集(影印本).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6
12.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上海.三联书店,1957.9
13. 圣经.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3年简体字版
14.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15. 孙尚扬.宗教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7.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增补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2
18.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9.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0.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在华南沿海早期传教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21. 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2
22. 约·罗伯茨编著,蒋重跃、刘林海译.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
23.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4. 汤朴威廉著,张伯怀译.基督教与社会秩序.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3
25. 查时杰.民国基督教史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4
26. 魏外扬.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台北.基督教宇宙光传播中心,1978
27. 陈增辉.福建基督教史稿(未刊稿).藏于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外关系史资料室
28. 林金水、谢必震.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
29. 陈支平.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30. 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1. 杨大春.晚清政府基督教政策初探.北京.金城出版社,2004
32. 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33. 陈支平、李少明.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34. (美)费正清著,张沛译.中国:传统与变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35. 熊怡等编著.中国的河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36. 吕变庭.中国南部古代科学文化史:第四卷—闽江流域部分.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
37. 郑剑顺.福州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38. 林国平、彭文宇.福建民间信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40. 林文慧.清季福建教案之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

④ 学术论文:

1. 林金水、张先清. 福建基督教史的研究回顾与展望. 基督宗教研究(第二辑).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
2. 姜嘉荣. 近代中国基督教区域研究述评——以中国及西方研究为个案. 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 1999年第2卷
3. 顾卫民. 近年大陆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概述.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 1993年第16期
4. 陶飞亚、刘冰冰. 近年国内基督教史(新教)研究简评. 朱维铮主编.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
5. 何桂春. 近十年来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综述. 世界宗教研究. 1991年第4期
6. 艾恺(Guy Alitto). 论目前在西方的中国地方研究的趋向.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983年第12期
7. 钟鸣旦. 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新趋势. 国际汉学. 第4期. 大象出版社, 1994
8. 李少明. 近代福建基督教的两大重要地位. 世界宗教研究. 2003年第4期
9. 林金水. 艾儒略与明末福建社会. 海交史研究. 1992年第2期
10. 谢必震. 两所福建教会大学历史文献资料述略. 吴梓明主编. 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研讨会论文集.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5年
11. 黄新宪. 从华南女子大学到女子文理学院——对旧中国一所著名教会女子大学的考察. 教育科学. 1990年第3期
12. 范正义. 基督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以福建为研究中心.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未刊载硕士论文. 2001. 5
13. 张金红. 福州地区基督教建筑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未刊载硕士论文. 2003. 5
14. 林金水. 中西礼仪之争在福建. 教育评论. 1995年第3期
15. 林金水. 艾儒略与福建士大夫的交游——东西文化的接触与对话, 兼论天学与儒学的相容与排斥. 朱维铮主编. 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12
16. 朱峰. 基督教与中国东南的乡村社会——以近代福建美以美会为例.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3期
17. 林立强. 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与晚清福建社会.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 2005. 5
18. 翁怀友. 福州公理会传教士. 圣教杂志. 第1期
19. 徐茂明. 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1期
20. 李莉. 近代福建外国教会契约文书之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未刊稿硕士论文. 2003. 5
21. 谭其骥. 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1年第1期
22. 王中茂. 西方教会在近代中国购置地产的活动及其特点. 洛阳师院学报. 2000年6期
23. 刘大可. 西风东渐与近代福建社会变迁.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3年2期
24. 李少明. 建国前福建基督教的社会活动. 南平师专学报. 1999年3期
25. 李玲. 谁是最早到达福州的基督教传教士. 福建史志. 1997年1期

26. 郑耀星. 福建省基督教地理的研究. 人文地理. 1997 年 4 期
27. 刘继同. 香港基督教会社会服务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功能. 卓新平、萨耶尔主编. 基督教与当代社会.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年
28. 赵广军. 自立之基: 中国基督教信徒捐输之研究. 谢必震主编. 闽台区域研究丛刊(第三辑). 海洋出版社, 2003
29. 杨念群. 边界的重设: 从清末有关“采生折割”的反教话语看中国人空间观念变化. 开放时代. 2001 年 12 期
30. 张鸣. 被潦倒的大胡子: 中国农民与基督教. 读书. 1999 年 6 期
31. 罗萍. 洋教征服·乡村社会秩序裂变·民教分化·冲突之源起.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2002
32. 常永青. 河南省农村基督教活动情况调查. 社会学研究. 1991 年第 3 期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本人于 2005—2006 学年承担社会历史学院的中国基督教史学科的助研工作；
2006—2007 学年承担中国基督教史学科的助教任务。

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关注的是福州基督教教堂的研究，同时发表了两篇
论文：

- 1、《关于阿美族的神话、宗教和祭仪》，发表于《闽台区域研究丛刊》（第五辑），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研究中心编，海洋出版社，2005 年 10 月；
- 2、《撞击与调适——福州近代基督教建筑初探》，发表于《大学时代》（第 11 期），
湖南报刊发行局，2006 年 11 月。

致谢

时光荏苒，蓦然回首，三年研究生的美好时光已经过去了。从开头的憧憬、激动，到过程中不时的迷茫、困惑。最后，我思量自己获取了什么的时侯，我不禁汗颜。诚如吴巍巍师兄评价，我不够努力。我能一路走来，与众位师友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首先，我要感谢社会历史学院的众位老师。他们学术严谨，待人和蔼可亲。我的导师，林金水教授，对我教诲有加，多方鼓励提携，是我在三年学海中遨游的方向灯；我的各位课任老师，林国平教授、谢必震教授、谢重光教授、陈寒老师、朱锋老师，在学业上给予我很大的帮助，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深深地感动了我；还有我们的辅导员王民老师，在生活上一直关心着我。老师们的恩情，学生我是难以忘怀的。

其次，我要感谢众位同门同专业的同学。我的师兄吴巍巍、崔军锋，给予我论文写作很大的帮助，我论文研究方向的定夺、资料的查找、民间的田野调查以及写作中的修改，每个前进的脚步中都有他们提携的痕迹；我的师姐张金红、郑衡泌、李双幼，她们在我论文写作方法和材料查找上给予了很多帮助；我的战友们，陈松青、蒋培锋、周志明、蔡明晶、许晓明、马海燕、肖郁哉、陈海平等，我们在共同的学习与探讨中形成了不错的学术氛围，给予互相不少的灵感；我的师弟赵凯，他作为福州人在我的田野调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感谢你们，有了你们，这一路走来，除了酸苦，还有甜蜜。

最后，我要感谢闽清城关堂的林恒珠牧师、泛船浦天主堂卞牧师、花巷堂的陈牧师等等给予我调查许多帮助的人们；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是她们在背后一直默默支持着我。

最后的最后，总之又总之，谢谢了。

个人简历



潘江滨，男，1981年6月出生於福建省厦门市。2000年9月考入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2004年7月获取历史学学士学位；2004年9月考取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宗教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近代中国社会史，已公开发表论文2篇。